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 主办

教育与考试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教育与考试

潘懋元：恢复高考 40 周年回顾与招生制度改革展望
瞿振元：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思考
刘海峰：读书是福：高考改变命运的深切感悟
李木洲 唐宇聪：科举制兴废的人学视角

教育与考试（双月刊）

2017 年第 4 期（2006 年创刊，总第 64 期）

主管单位：福建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福建省教育考试院考生服务部
主编：陈明庆
出版单位：教育与考试杂志社
出版日期：2017 年 7 月 28 日
地址：福州市北环中路 59 号
邮政编码：350003
电子邮箱：jyks1984@163.com
联系电话：0591-86215651
印刷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印中心
邮发代号：34-87
发行范围：国内发行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7865
国内统一刊号：CN35-1290/G4
定价：8.00 元



二
一
七
第
四
期

2017.4

201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平安顺利结束

2017年我省普通高考于6月7日—8日顺利举行。全省共有考生18.82万人，设87个考区、199个考点、6566个考场，约有2.2万名优秀教师参加监考工作。全省考试过程平稳顺利，没有出现因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情况；各地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为历年最好，没有发现失泄密和有组织的团伙舞弊现象，仅在2个设区市发现6例违纪作弊行为，违纪舞弊率为历年最低。

省委省政府和省招委会高度重视高考工作，于伟国省长对高考工作要求做到“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确保平安顺利”。6月1日，省招委会主任、副省长黄琪玉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福州检查考前准备工作，对高考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6月8日，省政府党组成员杨资金亲临省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检查指导各地市高考组织实施工作。



省领导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

考试期间，省教育厅厅长黄红武、省教育工委书记王建南、省教育纪工委书记巫文通在省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对各地高考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务必做到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并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巡查指导各地组织实施考试，随时处置各地突发考试情况。各级招委会、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坐镇当地教育考试视频指挥中心，指挥辖区内的高考组织实施工作。省招

委会成员单位通力协作、联防联控，落实职责任务，组织专项行动，扎实开展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全力确保高考平安顺利。

我省高考全部安排在与省级监控管理平台联网的标准化考点进行，考试全过程实行实时监控和录像，所有考点配足配齐了身份证识别仪、金属探测仪等防范作弊设备，充分发挥作弊防控系统、视频及网络监控系统的作用；省教育考试院制作诚信考试宣传视频、海报，提醒、引导考生诚信考试，营造良好考试氛围；组织专门人员通过视频网络监控系统，对所有考场、保密室等进行全程网上巡查；派出省级考风考纪巡视组和高考督考组，深入各考区开展巡视监督或突击检查，确保考试安全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

各地招生考试部门以生为本，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各考点设立候考区域、医疗室、饮水处，为候考考生提供遮阳避雨、医疗、饮水等服务，确保让所有考生顺利参加考试。设立“绿色通道”，为46名残疾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为7个因伤病等需要特殊照顾的考生启用7个备用考场。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开展爱心活动，积极为考生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

2017年福建省本科一批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完成

2017年我省文史、理工类本科一批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15日开始、7月25日结束，录取过程规范有序，招生信息及时公开，录取工作平稳顺利。本科一批招生院校共有276所，实际录取3.54万人，其中文史类录取0.54万人，理工类录取2.77万人，特殊类型招生共录取0.23万人。本批次录取工作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 常规志愿投档率与录取率创历史新高。今年我省本一批常规志愿投档率达99.4%，比去年提高2.4个百分点；常规志愿录取率高达96.1%，比去年提高0.5个百分点，较好满足了考生的升学志愿，这是我省大力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活动所取得的成效。

(二) 高水平大学在闽招生人数创新高。今年“211”高校在我省录取人数比去年增加近300人，“985”高校录取人数比去年增加100多人。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数“985”高校均增加了在闽招生人数，进一步满足了我省考生“上好学”的需求。



省招委会研究部署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三) 高校办学层次与录取分数的匹配程度较高。知名高校、热门专业和办学特色明显的高校生源充足，录取了大部分高分段考生。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次在闽招生，文史、理工类最低录取分分别为567分、558分，高出本一线78分、117分。

(四) 省内高校的生源质量总体较好。今年省内11所本一批招生院校共录取1.9万人，占本一批录取总数的58%。普通类招生计划均已顺利完成，仅有中外合作、闽台合作等少量计划未完成。

(五) 农村专项计划录取人数再创新高。今年高校农村专项计划录取249人，比去年增加33人；省属农村专项计划录取1411人，比去年增加209人，进一步增加了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机会。

教育与考试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潘懋元

学术顾问 刘海峰 杨学为 钟秉林 谈松华 瞿振元

主 任 黄红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

丁 毅 王夏州 田建荣 刘清华 李立峰

李 兵 李俊玮 吴根洲 余剑锋 张亚群

陈明庆 陈 峰 陈兴德 罗立祝 郑若玲

柏定国 覃红霞

主 编 陈明庆

副 主 编 郑若玲 罗立祝

主管 福建省教育厅

主办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目 录

2017年第4期
(总第64期)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3-7865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290/G4

2017.4

主 编:陈明庆
副 主 编:郑若玲
罗立祝
责任编辑:王伟宜
郑 芳
英文编辑:王伟宜

高考四十年 ——栏目主持:郑若玲

- 恢复高考 40 周年回顾与招生制度改革展望 潘懋元 5
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思考 瞿振元 7
读书是福:高考改变命运的深切感悟 刘海峰 11
温故知新 鉴往知来
——恢复高考 40 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 凌 磊 19

科举学从谈 ——栏目主持:刘海峰

- 科举制兴废的人学视角 李木洲 唐宇聪 23
宋代词科研究述评 刘 彦 30
“科举制度在台湾展览暨台湾进士后裔与专家座谈会”综述
..... 娄周阳 35
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 朱舒华 39

考试理论与实践 ——栏目主持:张亚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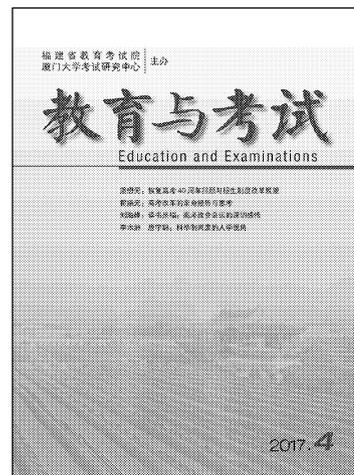
- 燕京大学学生学业评价的特点及其启示 靳培培 44
OBE视角下高等工程教育学业考试评价改革探究
..... 刘 巍 50
从考试的导向性谈音乐教师的选拔机制
——以厦门地区小学音乐教师招聘为例 高燕真 55

高等教育研究 ——栏目主持:覃红霞

- 省域民族农村地区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生态调查——以河北为例
..... 冯用军 59
大学场域内五种权力观的提出、阐释与意义 张 森 69
全人教育理念下理工类高校通识课程研究
..... 王艺霖 李俊鹏 75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观评析
..... 程 伟 80
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分析
——基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数据 童顺平 84

教育史研究 ——栏目主持:陈兴德

- 近代教育家盛宣怀师范教育思想探析
..... 吴洪成 王雪迪 90



封面图片:福州贡院,1911年摄

编辑出版:《教育与考试》杂志社
地 址:福州市北环中路59号
邮 编:350003
电 话:0591-86215651
传 真:0591-86215825
E-mail: jyks1984@163.com

声明:本刊许可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万方数据知识平台和超星数字图书馆在其网站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NO.4 Jul 2017 (Serial NO.64)

CONTENTS

1. Retrospec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sum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Prospecting the Reform of Admissions System Pan Maoyuan 5
2.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Qu Zhenyuan 7
3. Reading is a Blessing: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Destiny Changed by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iu Haifeng 11
4. Learning the New by Restudying the Old and Foreseeing the Future by Reviewing the Past: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sum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 D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 Ling Lei 19
5.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on the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i Muzhou Tang Yucong 23
6. A Review of Cike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Liu Yan 30
7. Summa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hibited in Taiwan and the Symposium of Taiwan Jinshi’s Descendants and Experts Lou Zhouyang 35
8. 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n Ancient Books in China Zhu Shuhua 39
9.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cademic Evaluation in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the Enlightenment Jin Peipei 44
10.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Academic Examination Evaluation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E Liu Cui 50
11. O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Music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mination Orientation — a Case Study of Music Teachers Recruit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Xiamen Gao Yanzhen 55
12. Investigation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logy of Female Graduates Returning Home in Ethnic Rural Regions in Hebei Province Feng Yongjun 59
13. The Proposal、Interpre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Views of Five Kinds of Power in University Zhang Sen 69
14. Research on Gener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Whole-person Education Wang Yilin Li Junpeng 75
15. Comments on Brubachers’ Philosophy Found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l Rational Existence Cheng Wei 80
16.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Academic Influence in 2016——Based on the Data of CNKI “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 Tong Shunping 84
17. An Analysis of Modern Educationist Sheng Xuanhuai’s Thoughts of Teacher Education Wu Hongcheng Wang Xuedi 90

● 高考四十年——郑若玲主持

恢复高考40周年回顾与招生制度改革展望*

潘懋元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对于40年前邓小平同志所主持的恢复高考这件国家大事,我没能像刘道玉高教司长、杨学为主任那样在上面操办,只是在一个基层单位——一所重点大学主持高考和招生,只能就当时亲历所知,回顾当时恢复高考招生的实际情况,反思当年恢复高考的意义。

我总的感觉是邓小平根据当时的新形势,开拓了新思路,做出了新决定:当时的新形势是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要推进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基本,没有科技现代化也就没有其它的三化。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科技的现状是很落后的。记得当时全国重点大学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科技成果展览会,把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陈列出来,但对于展品的说明,不是要求说明成果如何先进,而是要求说明对比发达国家同类成果落后多少年。记得大多数成果所标明的是落后20年以上,也就是说开了一个科技成果落后的展览会,激励人们奋起直追。而要推进科技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这就是当时摆在大学面前的形势与任务。面对这一新形势,不能等待没有好好读书的中学生来上大学。当时提倡学制要缩短,上完初中就可上大学,大多数中学生只是初中生,而且是

在“复课闹革命”中学习的初中生。如果按照老思路,至少要10年之后才可能有合格的大学毕业生。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新思路是招收上山下乡知青上大学。他们在“文革”初期已是高中毕业生,至少是高中肄业生,经过十几年的上山下乡或招工进城,都有十年左右的生活经验与生产经验,有的在事业上已有所成就。应当为他们开辟上大学的绿色通道。为此,当时在高考招生上做出新决定:第一,不限年龄。大家知道,原来招生报考限在25周岁以下,而上山下乡知青大多已30岁左右。其次,所在单位不得阻拦他们报考。这批知青,留在农村的不少已当了基层干部,招工进城的各有各的岗位,如果本人要报名参加考试,单位都得放行。考上大学读书,单位还要照发工资。我的儿子考上厦门大学,他所在的单位就工资照发四年。毕业后另行分配,不必回原单位。这就是邓小平基于当时的新形势,提出的新思路,做出的新决定。这些决策,形成了当年恢复高考重大的历史意义是:

第一,解放思想。1977年,有关部门开了很长时间恢复高考招生的会议,在一些多年形成的框框条条中转不出来,眼看已到年底,还未能拿出恢复高考招生方案。邓小平亲自过问,冲破了文革期间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虽然时间稍迟,还是于1977年底(11月份)恢复高考

作者简介:潘懋元,男,广东揭阳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厦门361005)

*本文根据潘懋元教授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的讲话整理,并经作者审定。

招生,1978年春入学。第二批于1978年秋正常招生入学。

第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就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77、78级现象。今天在座的朱校长、刘院长都是77、78级的大学生。还有许多院士、行政领导、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是人才荟萃的77、78级。其后的79、80级也有许多优秀人才,以后才有一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逐渐代替年纪大的上山下乡知青。

第三,缓解了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矛盾。文革之后,80年代的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专门人才,大多是1964年以前的大学生和少量留学生、研究生。1965年之后,运动不断,影响了教学和学习,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文革后还得“回炉”。到了上世纪80年代,64年之前的大学毕业生已经40-50岁以上,后继乏人。77、78级大学生于1982年之后毕业,多少缓解了当时青黄不接的矛盾。

因此,应该说,40年前恢复高考,不但有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事物的发展要在不断的创新改革中发展,才能与时俱进。停止了,就可能不进则退,甚至走向发展的反面。

我有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是一位有点知名度的诗人,出版过诗集,笔名“公丁”。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汽车夫”。其中有两句我一直记得:“人们为你修筑笔直的公路,而你却要学会拐弯”。40年来,我们一直沿着统一高考的公路笔直地行驶,由于没有学会拐弯,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制约了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教育。现在还制约了我们的大学本科,许多本科生的学习为了考研。应试教育不利于儿童、少年、青年的健康成长,不利于素质教育,违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它的危害不用我多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方面在批判应试教育,实际却在助长应试教育的漩涡之中。怎么办?

对此,我想提出一个简单而难办的办法。很简单,把高招和高考剥离;很难办,阻力很大。高招和

高考剥离,就是刚才瞿会长所说的招生就是招生,招生可以通过考试,但不一定要通过考试,尤其是不一定要跟全国统一高考捆绑在一起。要让高校招收知识、能力、素质适应的学生,让学生选择与自己的兴趣、能力、理想适应的高校和专业升学,这就是高招的目的与任务。考试只是招生的方法之一。多元化的高校要有多样化的生源,要用多元化的标准和多样化的方法来达到招生和升学的目的。在全国统一高考中,我们没有这种经验。但在招收专业博士生(Ed.D)采取的非考试的审查和面谈方法,更能招收到优秀的在职博士生。以前都要通过考试方法,把一些办学经验丰富,领导管理能力很强,亟需在理论上提高的在职领导管理干部都挡在门外,现在把考试和招生分开,为招生工作松绑,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在大学本科的招生上,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但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学招生就是不经考试的。你要去这些国家留学,并不需要先去参加高考,而是将有关资料寄到所申请的高校,高校审查有关资料和外语水平就决定录取与否。前不久,清华大学按国外通行办法,招收外国留学生,不经考试,审查资料之后就决定录取与否,寄发通知。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对外国学生特别“优惠”,不经考试就可以上清华。而中国学生上清华、北大是要通过统一高考,拿到顶尖的高分才能被录取的。但是,报考清华、北大的学生,大约10人能录取一名;而外国来清华留学的学生,是10多名才能录取一名,也就是说,更严格。为什么会产生误解,因为在人们脑袋里,已经把升学、招生和统考分数紧紧地绑在一起。因此,要从统一高考的捆绑中解放高校招生,解放学生身心。

道理很简单,但很难办。难办在于第一,思想难解放;第二,制度难改革。

思想上,存在中国的统一高考是最公平的迷信——人人在分数面前平等。实际上是表面的公平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结果公平掩盖了过程的不公平。为什么高考的高分者,大多数是城市中上层家庭的子女,为什么985高校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不得不用加分,规定名额等等办法照顾来自农村的学

(下转第10页)

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思考*

瞿振元

摘要:回顾了高考网上录取、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取消高考年龄限制等改革的决策过程,强调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材是考试招生制度的核心问题。当下,要重点研究考试招生工作如何更好体现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如何与高等教育现代化普及化进程相适应、如何更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问题,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

关键词:高考改革;经历;思考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积极支持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我结合自己在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工作经历,来谈谈对高考改革的体会和思考。

一、我所经历的高考改革与体会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专门研究科举和考试,包括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他在高考改革30年时专门写过一篇论文《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在这篇论文中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所有高考改革举措进行了梳理,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三十年来,高考在很多方面都实行了改革,高考科目、内容、次数、招生录取体制、命题方式以及技术环节等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是这些探索有的经受住了考验,有的则无疾而终。总体来看,与考试技术有关的改革总体上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历经反复比较曲折。”他具体讲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考所经历的23次变革,这中间能够留下来至今还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积淀下来可操作现在还在用的有9项。这9项分别是:第一项是80年代艺术类等特殊专业统考加单考;第

二项是1985年高考标准化考试改革;第三项是1994-1997年招生收费的并轨并开始实施缴费上学制度;第四项是1999年开始的网上录取,第五项是1999年的扩招;第六项是1999年开始探索3+X科目设置改革;第七项是1999年开始英语考试+听力考试;第八项是2000年开始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第九项是2003年高考时间由7月提前到6月。这9项改革大家都还会有印象。

我是在1998年开始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的。现在所列的9项改革中有6项是在我的任期里做的。我想,能够在我的任期内做成6项高考改革探索且长期延续下来,还是蛮不错的。当然,能在当时做成这些事情,一是由于长期探索的基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许多同志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二是由于当时以陈至立部长领导的教育部党组以及分管领导周远清副部长(他是在我们高等教育界深有影响的老部长)的正确领导。我只是作为一名“操作者”做具体工作。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期间的一些小故事,也说说我的体会。

先说网上录取。用当今流行的语言来说,网上

作者简介:瞿振元,男,江苏启东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书记(北京 100082)

*本文根据瞿振元先生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的讲话整理,并经作者审定。

录取可以叫“互联网+招生”。在1998年开始了试点，1999年正式立项。经过3年时间做到了全国铺开。这在当时的网络技术条件下确实非常艰难，但是做成功了。这件事情被大家称为“无争议改革”。现在，人们对这项改革的技术价值的肯定，讲得比较充分；对它的经济价值的肯定，也讲得比较充分；但却低估了这项改革的社会价值。回忆一下网上录取之前，我们的招生是怎么做的。各个学校都要派出招生工作组，3个人或5个人到一个省去进行录取工作，招生人员走的时候可能就带着一堆“条子”，说某某考生考多少分、是谁的什么亲戚，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请关照，等等。有的招生人员一下飞机、火车，很可能就被有钱有势有关系的人接走了。招生录取现场（至少我去过几个地方）门口是有警卫把着，不让外人进的。通过警卫送“条子”进去，也许这个“条子”里头是夹着钱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说明，在网上录取之前我们的招生过程中，“不正之风”是相当严重的。当时我们党内也只说“不正之风”，没用“腐败”这个词，但其实这里确实存在招生腐败的问题。我们的网上招生录取制度挡住了那个腐败、挡住了那个歪风，使得招生工作领域被老百姓称为“公平公正”“一方净土”。这就是网上录取所蕴含的重大的社会价值！如果那个时候听任“不正之风”蔓延，我们的招生发生的问题就会更多，受到社会的诟病会更加严重，人民群众就会丧失对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信任。所以我说，对网上录取的社会价值要有充分的估量。

再讲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的改革。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具体实施是在2003年。但是启动于2001年。此前，老百姓多有呼吁。大家知道7月天气炎热，被称为“黑色七月”。我到过一些考场，看到考场的过道中间放着冰块来降温。北京等地率先在考场里安装空调。但城区安装空调，郊区没安空调，郊区考生和家长意见很大，说考试环境不公平。安了空调的，教室是凉快了，但不能把考生安排在空调的出风口下坐，说吹感冒了谁负责？所以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还是考虑加快高考提前的改革进程。当时，我们收集了许多资料，特别是历年各地的气象资料，平均气温、最高最低温度、降雨情况等等，听取教育行

政部门和一些高校、高中的意见，认真论证以后报国务院。李岚清同志看了之后给了朱镕基总理。朱镕基总理在上面批示，是否充分征求了各地的意见。“充分”这两个字还是写在旁边画个圈拉进来，特别醒目。然后国务院办公厅转给我们。我们立刻向国务院报告说：“很充分，我们征求过各省市的意见，也征求过部分高校和中学的意见。”报国办后，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说：“老瞿，你这个充分不就只充分征求了教育部门的意见吗？你没有征求公安、交通、卫生和通信部门的意见。当然，你去跨部门征求意见也不方便，我来做吧！”于是，在2002年初，他召集各省市的政府副秘书长、教育部门和公安、交通、通讯、卫生等多个部门在一起开会，听取意见。这个过程说明，高考确实复杂、涉及面广。我做学生司司长也仅是从教育内部来考虑，没有想那么复杂、不够周全。座谈会上，各省市和相关部门都表示同意，但有两个中学校长提出意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复习计划，一旦提前，复习计划需要调整，因此能不能今年不动啊？当时我想，大家都一样提前，很公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提前一个月不是针对某一个学校提前的，全国是一样的，很公平，可以做。但是领导们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听一下家长意见。于是，我们到北京四中进行调研，在校门口随机问考生家长，高考提前一个月，凉快了，好不好？家长说：“好是好，但是你们拿别人的孩子试，别拿我的孩子试，行嘛？”群众的意见就是这样表达的。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汇报之后决定，晚一年就晚一年吧，我们先预告出去，2003年再开始实施。于是决定2003年开始提前高考。我说这件事情的决策过程，外界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在操作过程中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很有领导艺术的。

高考取消年龄限制是在2001年开始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是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阶段实施的。在精英教育阶段，我们确实有年龄限制，规定考生年龄在25岁以下。当然，潘懋元先生刚刚说了77、78年，年龄是放开的，那是因为特殊时期，后来规定25岁以下才可以报名。处于精英化教育阶段，又是以计划经济的思维考虑问题，认为国家投入要讲效率，不能随便放开年龄。比如，招收一

个20岁的青年上大学,24岁毕业,60岁退休,可以工作36年;但招收一个40岁的人上大学,44岁毕业,60岁退休,就只能工作16年了。所以,从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角度看,规定了年龄限制。当然也有学校管理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的还是从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角度考虑的,对教育的其他多方面的价值很少考虑。开始扩招后,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也开始有了放开年龄限制的基础条件了,于是决定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当时,也有担心一旦放开年龄限制,参加的人数一下子暴涨。我们也作了分析,认为也不会一下子增长很多,即使报名的考生多,真正上录取线的人不会太多。所以,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问题,这就是受教育权的问题。过去我们很少讲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人权,是基本的人权,而且是比基本人权中的劳动权等等是更重要、更基础的人权。接受了教育,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劳动权。但是以前很少讲“人权”。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的新闻一发布,受到社会的认可与欢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说:这个规定好,体现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讲这些故事,我的体会是: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要始终抓住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材这两个基本点。如果将考试招生工作比作椭圆运动的话,那么,椭圆运动的两个焦点就是“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材”,离开了这两个焦点做的改革往往是不能成功的。科学选材当然有很多问题要探索,我也呼吁过应当建立教育测量学,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又很需要。但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促进公平,在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社会矛盾很多很复杂。在复杂体系中,小小的事情通过蝴蝶效应可能放大百倍,衍生出很大的事端。所以,我们做招生考试工作要把促进社会公平这件事情作为重要社会责任,在现阶段尤其要加以注意。

关于公平问题,不仅要注意解决那些显性的不公平问题,如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还要注意解决隐性的不公平问题。比如在考试内容方面,有时候会从城里人的语境下命题,而没有考虑面向所有考生的问题。高考的作文题就有这种情况。有的题目看起来是很公平的,但实际上存在隐性的不公平。我记

得:2009年,有一个地方出的作文题目叫做“隐形的翅膀”,会唱流行歌曲的考生一听《隐形的翅膀》,会记得它的歌词,是很励志的!当年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学生新年联欢时唱了这首歌成为新闻,但是让乡下考生都知道“隐形的翅膀”,他就想不出来。这是一种城里人的语境。类似的情况还有,高考题目带有隐性不公平。现在,一些学校自主招生的题目,也明显的存在这个问题,脱离了考生的生活环境和这个年龄段的认知水平。例如,有一个学校的题目是:请您设计一下我国养老制度,这就超出了高中生的认知水平,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隐性不公平。

在刚才说的故事中间,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改革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做好事也要讲技巧,好事要会做才能做成好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群众意愿。比如,高考提前一个月那件事的决策过程,我特别体会到,工作不能凭领导的主观愿望做,而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二、关于高考改革的思考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决策,不仅该改变了一些人命运,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今天纪念恢复高考40年,缅怀伟人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做好当前的工作,迈好面向未来的步伐。当前考试招生工作,最重要的是把中央《关于深化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意见》认真地、全面地实施好,目标是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在当前工作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深入研究:

第一,考试招生制度如何更好体现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考试招生制度是教育中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如何体现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把“为什么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在考试招生环节中得到体现,发挥考试招生工作对育人的导向作用。我记得有一天《参考消息》的一篇文章说,美国教育考试如托福等,要体现美国的价值观,要把美国的宪法、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在托福考试中得到更多体现,并且说以此加大对中国青年的影响,这是典型的通过考试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那么,我们的考试是否

自觉地意识到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如何在考试命题、考试方法等方面体现出我们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进步的关键能力的新一代服务的正确导向？所以，不能说考试招生制度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没有关系，而是有紧密关系的，而且要把这种导向贯穿在考试招生制度的始终。

第二，考试招生制度如何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教育现代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正在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将迅速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大众化之所以能够划分两个阶段，是在教育的形态上，在考试招生上会有不一样的特殊表现。现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这是局部普及化，而且是初步普及化。根据预测，2018、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将实现普及化，这种普及化是国家整体性的普及化，今后还会走向全面普及化。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数量会进一步增加，学生的学习方式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信息化带来的许多变化，必然会深刻影响着学校的教学形态，学校一定会更分层次、分类型，学校的职能也会调整变化。考试招生制度如何与这种快速变化的高等教育相适应？上高水平大学的竞争在近期内还是激烈的，长远看，我们如何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我们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上一一般性的大学的竞争应当能够很快缓和下来，相应地，包括注册入学制度以及其他灵活的入学和学习制度应当加快建立、在更大

(上接第6页)

生？因为在城市重点中学上学的学生同农村一般中学上学的学生所享有的教育资源是不平等的。如果能在考试之外，采取或参考升学者的中学学习成绩、体育或艺术等等特长、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公益活动的表现，国外招生还很重视推荐者的意见。多样化的方法，更能适应多元化高校与专业的要求。

还有一个制度上的难题。全国统考，采用一把尺子，统一分配：一本、二本、三本，然后是高职，还有先公办校、后民办校等等规定。学校只能够在所分配的分数段上获得1:1.2的选择权。学校是培养学生

范围实行。

第三，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化技术来做好招生考试工作。不只是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等已经成熟的技术的更好应用，而且要把智能化的许多技术应用到考试招生工作中。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尤其要加以注意。

第四，如何抓紧关键技术研究，使高考这个很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一些。我们经常说复杂事情简单化，也是很高的领导艺术。比如，多次考试的等值问题、不同科目难度把握问题，等等，都需要研究；对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及与专业匹配问题也需要探索，让学生接受“适合的教育”。抓住若干关键技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种简单化也是科学化，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走得通，使制度设计更好服务于民众，使考试招生工作做得更好。

总之，总结过去，做好当下，面向未来，高校考试招生改革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这次“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有很多议题涉及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把国务院的文件贯彻好，把今后的高考改革工作做得更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考试招生制度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刘海峰. 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 教育研究, 2007(11).

(责任编辑: 王伟宜)

的主体，应当把选择学生的自主权还给培养单位。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放管服”的原则来管理招生，把招生权放给学校，按“高教法”来管学校招生，而不是用各种繁琐的规定来限制高校，要化消极的限制为积极地为高校招生服务。

总之，要解放招生思想，要改革招生制度。都很难办！但不是不可能办。这是我的意见，请大家批评。

(责任编辑: 王伟宜)

读书是福：高考改变命运的深切感悟

刘海峰

摘要：重温自己的中小学读书、上山下乡、参加高考到大学读书、研究高考的历程，从个体经历反映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转变，以及对高考的思考与读书感悟。在一定意义上，我的人生是高考人生，我的生涯是读书生涯。只有见过走后门盛行、有才有志者被压抑埋没的状况，才能深切感受到恢复高考是多么重要的决策。只有亲历过知识“荒漠时代”无书可读一书难求的人，才能深切体会为什么说“读书是福”。

关键词：高考；恢复高考；读书；高考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力量、高考改变命运，不仅曾经是响彻云霄的励志口号，而且是许多77级大学生人生转折的真实写照。长期压抑后的解放、久旱逢甘雨的渴望、复习备考时的紧张、高考过程中的神圣、金榜题名时的喜悦……凡是经历过恢复高考洗礼的大学生，回忆起1977年高考的往事，都是记忆犹新，仿佛如昨。恢复高考30周年似乎刚过去不久，一转眼又到了纪念恢复高考40年的时候。2007年，我曾在《教育与考试》发表过一篇《“三十功名尘与土”——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的回忆文章^①。时光飞逝，10年后再写本文，重温自己的中小学读书、上山下乡、参加高考到大学读书、研究高考的历程，从个体经历反映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转变，以及对高考的思考与读书感悟，作为对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少年时代喜欢读书

打开记忆的闸门，让时光倒流，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1966年停废高考，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整个中国社会走入混乱。我读中小学的时

候，1966—1976，正好是“文革”十年，那是知识荒漠的年代，很少书可读。我父母亲是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届的同班毕业生，母亲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龙岩三中，也就是龙岩郊区的东肖中学教书，我于1959年9月出生在东肖卫生院。父亲在龙岩师范任教，因此我就读于师范附近的龙岩最好的实验幼儿园。幼儿园最后一个学期，转到东肖溪连幼儿园大班。小学五年都在溪连小学就读。

父母亲作为当时还很少的大学毕业毕业生，按道理家中是有不少藏书的。可是，1967年底的大武斗中，东肖中学曾经是红字派的大本营，是红字派攻打的重要目标。在得知红字派即将攻打东肖的前夕，东肖中学的教职工纷纷离开学校躲避战火，我们家也赶紧逃离到永定湖雷石坑母亲的老家居住。那次红字派甚至从兵工厂风动厂开出坦克来攻打东肖，战斗过后，有好多天整个东肖中学空无一人。我们家也被附近民众破门而入，拿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包括比较好的书籍，后来听我父亲说，过去家里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经典小说全被拿光了。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试制度与科举学（厦门 361005）

因此，等我懂得看书的时候，家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书了。但我小学时代就喜欢读书，而当时小学是没有图书室的，东肖中学好像也没有，或者有的话，书也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封存起来不让外借的。记得我经常走到离东肖中学不远的公社老街，即白土街上的书店看书。那时候几乎所有商店都不开架，书店更是如此，你想买哪本书，就请店员给你从书架取出，拿给柜台外的你翻看，若不买就还回。我总是向卖书的阿姨借书，在店里站着看，因为书店面积很小，根本无处可坐。看完一本就再请阿姨换一本，那阿姨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取书。现在想来那阿姨对我真是很好，因为我在书店基本上没有买书，却不停地取书看，书店又不是图书馆，都这样借书看，书店怎么经营下去？当然那年头所有商店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可是作为店员，肯定是违反了规定，一直对我这个只借不买的小孩网开一面。估计在那时候很少人喜欢看书，那阿姨见我这个孩子这么喜欢看书，也就将自己变成图书馆员了。时隔近半个世纪，回忆起此事，心中都感到温暖，虽然早已不记得那剪短发的阿姨的名字，但内心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1971年2月，我开始读初中。因为母亲调到城里的龙岩一中任教，我在东肖中学只读了半年初中，就转到当时父亲任教的龙岩二中了。在东肖中学上学的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赵天麟老师曾经借给我一本小说看。作为老师，借书给学生看，应该说是对我非常好了。“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之后，中小学教育形式上是恢复了，但当时中小学教学则很不正规。记得我初中学的教材是《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后来才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的课程，但我们中小学没有学过历史、地理、生物课，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书籍匮乏、知识的“冰河时期”，可读的好书基本上没有。真正让我很感兴趣的是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印发出来的学习材料中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增广贤文》了，当时感觉其中许多句子实在是太好了，不仅对仗工整，而且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熟读细品，至今我还不时会引用《增广

贤文》。回想起来，这些少得可怜的传统文化经典读物，却是我中学时代的“荒漠甘泉”。

当年“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候，多数人根本不想学习或无心学习。记得高中教我们数学的曹柏龄老师，在课堂上看到学生都在讲话，不认真听课，深感失望，多次无可奈何地对同学们说：“大家不要自暴自弃啊！”他教的一节在户外测量地势高低的指导课，请同学们自愿参加，结果我们一个班50位左右同学，只去了5位，这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主要是多数同学都觉得学了没有什么用，因为当时人们都知道无论是招工或大学招生，走后门成风，“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我于1976年6月高中毕业。76届高中生是“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后各个年级中学习最不正规的一届，高中两年不是学农，就是学工，我们还有一个学期学医，从生理解剖、各种疾病到常见西药、中草药、针灸等什么都包括，培训的对象是乡村的全科医生，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认真读过作了许多标记的绿皮《赤脚医生手册》。高中毕业时大家都各自寻找上山下乡的所在，中学时代草草结束，我们班连一张毕业合影都没有留下。至今40年过去，也从来没有举办过班级同学聚会。

二、上山下乡渴望读书

经过母亲通过中学的同学联系，我上山下乡的地方安排到离龙岩城不算很远的江山公社铜砵大队，在大队的耕山队干农活。跟许多老知青相比，我下乡时间不长，吃的苦其实是不多的，只是干活种类也算是比较多的，不仅干过拔秧、插秧、耘田、劈田埂、割稻、打谷等基本的农活，什么累活脏活都做过。例如，还在修建村美水电站时当过养路工，打石头炮眼，扶钢钎、抡磅锤、点炸药都干过。甚至在临近我们江山公社的龙岩坑柄煤矿下到矿井中挑过煤炭。记得是我们耕山队为了增加收入，有几天全队的人都去坑柄的小煤窑里挑煤炭，我也算是当过几天的矿工了。那煤窑不是竖井，而是基本上水平掘进延伸的矿井，只用一些松木支撑着狭窄低矮的矿井，若是在今天，可能连正式的矿工都不敢进那样危险的矿井。

另外，我还一个人到江山公社所在地铜砵村大

街上为耕山队卖过李子,因此我还可以说当过两天的小贩。至于跟其他农民一起干过很脏的积肥的活,为了不影響您的阅读趣味,还是不具体写出来为好。1977年4-5月,我还参加了江山公社计划生育宣传队,我的节目是诗朗诵和用龙岩话讲相声。我们到江山公社的每个大队去演出过,其中有11个大队位于很高的山上,不通汽车,全靠步行登上去。

还有一件是现在不可能再做也绝不允许做的事,即到江山大峡谷清溪中用农药来毒鱼。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我们队毒鱼来溪里争着捡鱼,我们全体人员凌晨4点多便起床,走到清溪的上游时天刚蒙蒙亮,便将剧毒的农药放到溪水中。然而因为有许多细小的山泉汇入那溪中,鱼很难被毒死或毒晕,结果并没有抓到几条鱼。要是放到现在,这种靠下农药抓来的鱼,相信没有人敢食用。江山大峡谷的溪水非常清澈,碧绿的水潭呈现出一种非常美的玻璃色,夏天我还经常在那清溪的水潭中游泳。在我上山下乡40年后的2016年,我曾到江山镇铜钵村故地重游。回想那逝去的青春岁月,令人感慨。

与那些祖祖辈辈在农村的人相比,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干几年农活并不算什么。但是对我而言,有一点比农民更苦的是吃饭问题。因为最初我一个人住在一座楼下就是牛棚的楼上,又没有电,做饭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早餐和晚餐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煤油炉来煮稀饭或面条吃,午餐则用饭盒装好米寄到我住处后面很近的江山中学食堂蒸。青菜是自己种的,当时最基本的备用菜是酱油水,也就是回到城里的时候,在家里用猪油爆葱头,然后放进酱油中。这一瓶酱油水往往要作为半个月一个月的基本菜。半年多后,又来了另一个知青蔡建龙跟我同住一屋,我们才经常合伙煮饭。记得在村美建水电站时,几十个人睡在竹子搭的工棚的统铺,公社供应大锅饭吃,但菜要个人自带,主要还是靠酱油水,十天半个月没有吃到任何一点蔬菜,嘴角都有点烂了。

当年正处于青春年少,虽然很瘦,营养不够,不过身体却很好。下乡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常要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水田里劳动,尽管受过不少小的外伤,但没有病过一次,即使是遇到大雨全身淋湿,也不会感冒。当时电影《决裂》片段有一个说法流传很

广,谁手上老茧多谁就应该上大学。我下乡的时候,手上也磨出了老茧。从1977年考上大学,到现在40年过去了,可能很多人难以置信,我的右手掌上至今还顽强地存在着一个老茧。

跟我一起在铜钵大队耕山队下乡的其他几位知青都是龙岩汽车运输总站的子弟,坐车回城免费,很方便回家,也比较经常回家。当时从龙岩城坐汽车到铜钵的票价是5毛钱。为了节省路费,我曾经有两次坐1毛钱的公共汽车从龙岩城到赤坑,然后步行翻越山岭,到村美后再坐5分钱的汽车到铜钵,这样比从龙岩直接坐汽车去铜钵少了三毛五分钱。在当年,教师等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地位不如司机,因为经济收入就不如司机。就这一点而言,我比周围其他下乡知青更为艰苦。当然,我的精神世界还是比其他知青更丰富的。如果比体力活,我比不过多数农民和一些知青,但如果是脑力劳动,当时我自认为比周围多数人更强。那年冬天农业学大寨,发动大家平整土地,公社要写大标语,每个黑体字二米见方,各立一个标语牌,就找我这个会美术的人去写。

在同龄人中,我的家庭文化条件算是好的,毕竟父母是知识分子,家中后来还是有些图书,例如鲁迅的著作,还有如《一百三十五个世界文学家》之类的书,我也比一般人更方便到中学图书馆去借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最近重新翻阅当年下乡时的阅读笔记,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3月之间,至少在工余时间阅读了《法兰西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戏剧集《活尸》、罗兰《甘地》、格鲁兹吉夫《高尔基的青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莫泊桑《一生》、格罗斯曼《音乐的基础知识》、钱子衿《拿破仑》,以及《谈话术》等。现在想来,还真是“书非借不读”。在周遭人群都不读书的时候读书,要能守得住寂寞。自己在通宵守看周围没有人烟的瓜田的夜晚,就着油灯看《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的情形,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爱好美术,高中时我收集到一些“文革”前画报上的苏联油画,其中有一幅是格·萨维诺夫的《大学河岸街》,画中五六位男女大学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悠闲地在河岸边或坐或站,或阅读或交谈,男生英俊潇洒,女生美丽飘逸,衣着时髦得体,气质高雅,整幅画充满青春蓬勃的气息,非常美,令人赏心

悦目，勾起我对大学生活的羡慕和向往……这幅画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使我的大学梦有了具体的想象。尽管当时大学离自己其实非常遥远，但看这幅画，加上阅读阿克萨柯夫的自传《学生时代》，自然会让我憧憬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书……

三、大学时代狂热读书

在极少人能够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是一个非常美好而神圣的词语，也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地方。

当1977年10月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犹如“平地一声雷”，引起强烈的震动，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言，更是有如久旱逢甘雨，喜悦兴奋的情绪难以言表。过去，下乡知青想要上调回城，或者推荐上大学，基本上都得找关系走后门，前途命运操决于他人。恢复高考使得大家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不靠天地不求人，自然会激发起人们的发奋图强的意志。1977年的高考，是空前绝后的高考，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高考，是造就许多传奇的高考，是注定永留史册的高考。

1977年8月6日，在邓小平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将原来推荐上大学“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不必要“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应该说已经比原来推荐上大学好多了，但是，邓小平在座谈会上插话，主张将拟定的招生办法中“单位同意”一条去掉，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②确实也是，去掉“单位同意”这一条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这道隐形报考门槛，高考才算是真正的自由报考。就比如我来说，队长看我不爽，如果不同意我报考，我怎么办？是要去求他么？求的话还是要看领导脸色，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握。1977年恢复高考真正是自由报考，因此绝大多数下乡知青都回城里复习备考，生产队领导无权阻拦。

福建省1977年的招生简章是大学和中专合在一起于11月5日公布的，考试时间也同在12月16、17日。当时公布的招生学校除了本科就是中专，无论文理科都没有专科层次的高校，专科学校都是在1978年春以后为扩招而匆忙办起来的。1977年全国在福建

招生的高校总共只有20所，而有12所外省高校只招收外语或艺术、体育类，招收文史专业的外省高校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3所，招收的人数屈指可数。真正招收专业较多的就是福建本省的厦门大学 and 福建师范大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三个报考志愿，第一、第二志愿报福建师大中文、历史，第三志愿填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原因。

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我曾在随想录中写到：“一分钱压死几千人”、“也许只差一分，你的人生将完全是两样。”说明当时自己已经意识到，在这么多人参加的高考竞争中，分数的重要性。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复习备考，12月16、17日，大家带着期待的心情奔赴考场。我参加高考的考场是龙岩华侨中学，考场内外醒目的大红标语上写着：“响应华主席号召，听从祖国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树立革命理想，勇攀科学高峰”，按当时的说法，是“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当时有些地方的考场贴着“国家期待你们，人们期待你们”的标语。确实，不仅我们这些考生对高考抱有期待，国家和人民对这次高考更是抱着很高的期待，对第一届大学生抱着很高的期待，给了77年考上的大学生很好的机遇，后来77级大学生也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报效国家的愿望也特别强烈。

1978年1月，当接到体检通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望考上大学了，当时最大的期盼也就是考上福建师范大学。1977年福建省高考的文科体检线是210分，我后来知道自己考了302.1分，超过体检线近百分，算是比较高的了，这也是江山公社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尤其是当时的招生政策，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些倾斜，所以我的高考分数算是相当高的，才会被有优先录取权的第三志愿高校厦门大学录取。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令人喜出望外，真是春风又度玉门关，漫卷诗书喜欲狂！

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77级大学生体会最深。对于我个人而言，高考确实是人生中一件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大事。2017年5月4-6日，《新京报》三位记者专程来厦门对我作恢复高考40年的采访，之后要我写一句关于高考的话语到小黑板上拍照，我就写了这句话：“高考改变命运，人生天地为宽。”

从此我便彻底告别了铜砬这偏僻的山村,走出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走到天地更为广阔的厦门大学去发展了。我是江山公社唯一考上重点大学考生,估计可能会让一些上山下乡知青“羡慕妒忌恨”。

我高中同班50个同学,77年只有我一个人考上本科大学,还有一个扩招后进进了龙岩师范专科学校。78级以后还有两个同学考上本科,一两个考上专科,几个考上中专,总数大概也就是七八个人。相比没有考上大学或者中专的同龄人,我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40末、50后这代知识青年,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虽然招工回城在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作,但到90年代之后,多数同学的工作单位都破产或解散了,这时他们都已经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再找什么好工作已经比较困难,生活境况多不大好。因此考上大学与没有考上的同学相比,命运反差十分强烈。

查看当时的摘抄笔记便可以知道,我在等待录取和准备上大学的1978年1、2月份,我还阅读了弗雷德里克·凡·伊登的《小约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萨克雷的《名利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阿什曼的《基辛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时阅读的主要还是外国的文学著作。

到厦门大学报道后,印象最深的是大学实在很大,图书馆藏书实在很多。当时还继续贯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读大学期间,还参加过不少劳动,除拓展清理后山水库、挖掘芙蓉园中的水沟、在厦大防空洞中装载石头等以外,1978年秋天还到位于集美的厦大农场收割晚稻。下乡时我对幸福的理解非常简单:夏天只要不割稻子就是幸福。如果能够有机会读书,那更是真正的幸福。怎么没有想到我离开农村上厦门大学后,竟然又要割稻子!只不过在厦大农场割稻子只有两天,那劳动强度比上山下乡时轻许多,自己的心态也大为不同了。

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生有许多是“读书狂热分子”,我的大学四年如饥似渴地读书,基本上处于读书亢奋状态。现在翻看当时的阅读摘抄笔记,阅读量实在很大,仅1978年3-7月,也就是上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借阅了《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堂吉珂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热爱生命》《西厢记》

等文学作品,以及《托尔斯泰》《莫扎特传》《贝多芬》《卢梭》《罗曼罗兰传》《杰克伦敦传》等人物传记共55种。我觉得阅读经典确实很有收获,因为经典作品曾参与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塑造,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人类优秀文化的记录与保存。阅读经典,犹如与历史上的伟人对话,与孔子、司马迁、苏东坡、柏拉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许多文化巨人做朋友。

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不少老师期末闭卷考试就上课的内容,谁的笔记记得全、背得好,往往期末考就能得高分。我对这些课程多半是应付,因此期末成绩也就不高。我的主要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阅读自己兴趣的世界名著方面了。不过,对我这样广泛阅读的人来说,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发挥出优势来了。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没有哪门课程的笔记可以准备,而是考比较广博的知识,以及分析问题和展开论述的能力,这下我的专长就体现出来了。记得入学考试有一题名词解释是《太阳城》,这是我们学过的课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的,而我恰恰读过这本书,于是自然能够得分。同班有30多人报考研究生,考上的也就是10人,我还是其中最年轻的同学之一。

由于“文革”中即使喜欢读书的人,看书时间都不会很长,刚考上大学时,我们班上也比较少人戴眼镜,我一直到大二的时候视力还是1.5。不过大二下学期以后,因为阅读量很大,就开始近视了。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并不轻松,但却是很重要的一段经历。于今40年过去,再听当年大学中流行的英文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One Way Ticket等,颇有些许怀旧和感伤的成分。时光就像那单程车票那样,有去无回……

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对大学时代的感悟颇有道理:“在当时,明亮的心还没有被社会上的世故和家庭生活的琐屑小事所遮蔽;……这里的规则,是完全蔑视一切卑鄙和下贱;蔑视所有汲汲于名利的智慧和自私的目的,在另一面,却衷心地尊敬每一种高尚而光荣的理想,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空想。这样子度过的那几年的回忆,会一直伴随

着一个人的一生；尽管他没有感觉到，这种回忆却一直照亮着、而且指点着他走向终点的道路；尽管环境可能把他拖上溜滑的和泥泞的小径，这种回忆却会使他重新走上了真理和光荣的大道。”^③这是作者对大学时代的特点的概括。确实，有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不大一样，大学时代会影响人的一生。

77级大学生多数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炼过，经历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饥饿其体肤”的人，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在那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不少77级大学生有一种“为官须作相，及第早争先”的进取心，普遍有一种拼搏精神。“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的这首《攻城》诗为每个77级大学生所熟知。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成为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不少77级大学生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不仅想修身齐家，而且立志要治国平天下。

四、研究考试不断写书

我读硕士是跟随著名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攻读隋唐五代史。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对历史学的兴趣已开始逐渐培养出来。到硕士生阶段，通读《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隋唐五代部分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这些中国传统的正史写得很好，读来兴趣盎然。包括隋唐五代的笔记小说，也是专业必读书，更是有许多生动曲折的故事，我这才发现历史原来是这么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画卷。

1984年11月，我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工作之后不久，为了进一步深造，我打算报考博士生，而当时高教所还没有博士点，于是1986年初再度师从韩国磐先生，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高教所同意报考的前提就是要结合研究工作以教育史为选题，因此选了《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的题目，这篇博士论文最主要的研究内容还是唐代科举制度。后来跟随潘懋元先生给研究生上“中国高等教育史专题”课程，其中有一个专题便是科举考试制度，而科举是一个引人入胜且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专题，相对其他专题来讲，我觉得研究科举特别有意思，于是自己的研究方向就逐渐集中于

科举研究。

1990年以后，我参与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主任组织的以科举史为主的中国考试史研究。1991年11月，还参加了全国高考历史科命题。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两者有许多共通和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很自然的会将科举和高考结合起来研究。只是2005年以前是以科举研究为重，到后来，研究高考的比重逐渐增大。自2007年以后，近10年来，是我学术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我的研究重点逐渐从科举学转移到高考方面，对高考制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特别是2010年11月被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之后，开始变成以高考研究为主了。

自1992年开始研究高考并发表《选拔专才可另辟途径》一文以来，我已发表了篇幅长短不一的高考研究论文近百篇。有许多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其中还有多篇为《新华文摘》重点转载。当过唐代科举考官的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的许多高考研究文论文都是应时之需而作，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的论文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或在当时澄清了一些理论误解，或对当时的高考改革实际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高考改革是一个谁都说得上两句话，谁都不容易讲深讲透的问题。发表一两篇论文不难，要连续推陈出新发表系列论文却不易。有一些博士生曾问我，为什么我能思考一些高考改革中的规律性问题，能写出一些他们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文章。我的回答是，功夫在诗外，不能就高考论高考，重要的是将高考制度放到中国考试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论述，自然比就事论事看得更深更广。对高考改革这么一个影响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要有人文的和哲理的思考。科举研究与高考研究关系密切，古今时代虽变，但人性和许多道理并没有变，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所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类似，科举学研究使自己的高考研究具有历史深度和学术底蕴。另外，了解域外的高校招考制度也很重要。2000年，我曾在日本访学半年，了解日本的大学招考制度，并曾应邀到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访问和作过学术演讲，2005年还曾到马来西亚参加APEC组

织的关于考试的大型学术会议上作过主题报告。过去我对英美等国的访问,也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眼光。

学界对高考的看法往往趋于两极,观点向来相当对立。多年来,我一直与貌似理论“正确”、实则要颠覆高考的学者论战。在高考改革的激进派与稳健派、理想派与现实派、“独派”与“统派”的分野中,我明显地属于后者。我觉得,研究问题应该脚踏实地追求理想,不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否则,提出的所有设想都只是处于“应该”如何如何,却不考虑“怎样”变成行动,那么便可能变成“应该派”。我相信,在社会变革方面,渐进的改良往往要优于休克疗法的突变,对社会和学校造成的震荡较小。

有的基层教师读到我的高考研究论文后十分振奋。例如,2004至2005年间,河南省鲁山县第二中原校长王培中前后三次来信,认为拙文“说出了广大百姓尤其是高中教师郁结于心中想说而说不出的肺腑之言”,“您的研究很有价值,对中国教育的走向和人才选拔甚至国势的兴衰都具有战略意义。倘经您与同仁奋力鼓呼能挽救高考的‘命’,实中国百姓之福气也。”他还将论文复印数份,在该县一、二、三中广为传阅,“一时间,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读着这样的来信,增加了自己从事高考研究的使命感。我知道,占全体考生大多数的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师生,没有媒体资源可以利用,在高考改革的议论中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需要有学者为他们发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任何改革都必须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不能仅由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来主导。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高考“总体上符合国情”。看到这个提法,我深感高兴,多年来我一直主张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伴随着这份文件的出台,高考的必要性已无多大争议,目前不需要再论战,激进派至少暂时是偃旗息鼓了,学界讨论转向高考改革具体该怎样进行。

曾经有记者问我:你这么维护高考,是不是因为你1977年参加美术高考没被录取的经历对自己的观点有影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个人经历乃其次。我主张在中国这么一个人情社会和诚信体系不

完善的条件下,应该以刚性的分数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的真正原因,是基于对中国教育的深切了解、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对历史文化的深切了解、对人性弱点的深切了解。

2011年9月,在教育部南楼三楼会议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对调研的16个专题一一进行讨论。当讨论到艺术与体育类招生考试存在问题的时候,我曾举出了自己1977年报考福建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未被录取的例子。如果当年我被福建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录取的话,估计现在会更有钱,但肯定不会来研究高考制度了。在场好几位咨询委员和教育部司局长,都说幸好当时福建师大没有录取我,因为优秀的画家虽然也很难得,但对国家而言,有我这样系统深入研究高考制度的专家显然更为重要。

读本科时在书海中遨游,我当时一个愿望就是将来也要写一两本书,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近40年来,我不断写书,已经出版了31部著作,其中有22部是科举与高考研究方面的著作。我不仅是一个高考改革的参与者,而且差不多是一个“考试研究专业户”了。

2017年,由我主编的22本、约768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丛书基本上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构成。作为我国第一套全面、深入研究高考制度及其改革的丛书,系统展现了中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对高考制度从理论、政策、法治、内容、形式,到招生考试的区域公平、民族政策、效率和评价等方面进行的系统研究,还包括对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进行的专题探讨。今年,还要在浙江教育出版社主编出版“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8本。两套书合起来共30本,是一个成规模、成体系、成气候的书系,算是我这个77级大学生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国古人说过许多关于读书的好处。例如,据说是王安石的《劝学文》有云:“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

书贵。”在传统社会，读书的一个含义是指受教育。“要好儿孙须积德，欲高门第快读书”的格言，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读书可以改变命运。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以《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为题的报告，其实，“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理念。

现在读书已经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出现的问题是读不过来或有书不读。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4]这句话被后人不断引用，一直到清代，还有人认为“天下之欲读书而不能得书者之更多于有书不读者。”^[5]经历过“文革”书籍匮乏的时代，面对当今图书无比丰富的状况，就更能体会苏东坡这句话的深意。

古语云：“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晚清礼部尚书李端棻改造此联为：“无欲乃积寿，有福方读书。”有书读，能够读书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回顾我的读书历史，小学时代喜欢读书，下乡岁月渴望读书，大学时代狂热读书，学术职业需要读书，研究高考促进读书。在一定意义上，我的人生是高考人生，我的生涯是读书生涯。

总之，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我的感悟是：只有见过走后门盛行、有志者被压抑埋没的状况，才能深切感受到恢复高考是多么重要的决策。只有经历过需要看领导脸色、自己的命运操决于他人的时代的人，才会深切明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多么可贵。只有亲历过知识“荒漠时代”无书可读一书难求的人，才能深切体会为什么说“读书是福”。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三十功名尘与土”——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J].教育与考试,2007(04):9-1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6.
- [3] 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166.
- [4]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0.
- [5] 卢文绍.子史辑要诗赋题解[M].文大堂刻本,乾隆三十九年(1764):01.

(责任编辑:王伟宜)

温故知新 鉴往知来

——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凌 磊

2017年5月26至27日,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隆重召开。研讨会既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学术支持,也得到中国教育报、新浪教育、中国教育在线等单位的媒体支持。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共提交论文50余篇。

在开幕式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鞠勤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先后致辞。德高望重的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和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也发来贺信,深情回忆了40年前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热情洋溢地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郑冰冰书记、厦门大学考试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教授分别担任开幕式、主题报告会、大会报告和闭幕式主持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林荣日教授、南昌大学教育系吴根洲教授担任第一分会场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胡向东教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董秀华研究员担任第二分会场主持人;教育部考试研究中心评价处韩宁处长、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额尔敦吐教授担任第三分会场主持人。会议围绕“高考改革”这一主题,通过主题报告、大会报告和两场分论坛进行具体探讨,议题涉及“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和“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及其借鉴”等方面。

一、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温故可以知新,鉴往可以知来。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转折点,也是国家与时代命运的拐点。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也是全国各省市推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的重要年份,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汇聚各地专家、一同探讨高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刘道玉先生作为40年前恢复高考决策的重要亲历者,在《刍议恢复统一高考的得失与对策》一文中,自己阐述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历史功绩、评析了近二十年各项高考改革的利弊得失,并展望了未来大学考试与录取的体制与办法。他认为高考是关系到我国千家万户的大事,高考的改革不仅需要教育界认真研究,而且全国各界也要献计献策,最终以立

作者简介:凌磊,男,吉林延边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改革(厦门 361005)

法的形式,制定既符合国情又保证招生质量的考试与录取制度。潘懋元先生在主题报告《恢复高考40周年回顾与展望》中回顾了自己在基层单位亲历高考、亲历招生的情况,他认为40年前恢复高考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潘先生强调应试教育不利于儿童、少年、青年的健康成长,不利于素质教育,不利于我们现在大力提倡的核心素养教育,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把招生和高考剥离开,高考可以考但不是唯一的录取标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以深厚的学养和高屋建瓴的思想,洞察了高考这一重要的教育实践,并提出有高度与深度的见解,让与会者颇受启发。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在主题报告《高考招生改革的价值取向》中强调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中,应当兼顾教育的工具价值和理想价值,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科学与正义。同时,要增强对教育政策的理解力,对教育政策既要有批判性也要有建设性,从多元利益主体的平衡角度,从历史进程的视角,立足整个国家的利益来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稳妥地推进高考改革。

作为高考实践曾经的组织者、前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瞿振元先生在主题报告《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体会》中回忆了过去在教育部工作时组织高考改革工作经历,并指出恢复高考40年以来招生考试制度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思考和研究,包括如何体现立德树人,如何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使高考简单化,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走得通,真正让技术服务民众。另一位高考实践工作的领导者、前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先生,在主题报告《没有分数走不到今天,只有分数走不到明天——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中认为,40年前恢复高考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今天的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走向明天。我们要谋中华民族“一带一路”之全局,谋教育优先发展,打造软实力、人力资源强国之一遇,以招生考试为抓手,以人为本、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实现“中国梦”与“个人梦”的结合,全面提升教育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在主题

报告《中国特色高考改革之路》中总结了三个特点:一是高利害,中国上升通道仅此一条,所有上升功能、使命都压在高考身上,所以高考有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是高考改革千难万难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二是超负载,把学校里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在高考这最后一个阶段体现出来;三是正义性,高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安定、团结,是非常敏感的事情,理想的发展道路是走向多元。中国教育在线总编陈志文先生在主题报告《高考改革:科学与公平的艰难平衡》中谈到高考改革本身其实就是在做一道高考题,在做公平与科学的平衡,无论是高考加分还是“两参考一评价”,这些不仅仅是一个诚信制度和体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来。北京大学文东茅教授在《基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高考优惠政策探析》中指出,要打破过去民族加分的单因素机制,结合多元文化价值观,以及更加倾向于社群主义的公正观,加分政策对象要面向所有考生,淡化民族、强调文化。汉族学生如果会少数民族语言,应允许他们加分;反之,少数民族同学如果不会民族语言,就没有加分资格。河南大学副校长刘志军教授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评价新走向探析》中谈到如何使用综合素质评价问题,认为高中提供综合素质档案,是一个初筛过程,特别要注意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初筛的基础上,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挑选出适合高校培养的人才。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鞠勤院长在《江苏高考改革的实践与展望》中指出对于新一轮高考改革,江苏省结合省情和教育设计,在总结以往高考改革的经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力求体现国家要求、具有江苏特色,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科学选才、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刘海峰教授在《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中指出,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高考的政治意义与全局意义在1977年体现得特别明显,从恢复高考的历程便可以看出高考事关重大、影

响深远,因此高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对其改革既要积极推进,又要谨慎稳妥。张亚群教授的《高考40年发展趋势解析》,从历史视角论析高考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发展趋势,总结其利弊得失,指出统一考试作为高考制度的主要特征,在公平、高效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面临多元评价、阶层平等、区域公平等新的挑战。郑若玲教授的《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认为40年改革并未触及高考制度的根本问题,要发挥高考制度更大的功效,还需追根溯源,在减轻高考社会责任、回归高考教育功能和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践行高校招生自主权等两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实现重点突破。

吴根洲教授在《高校招生自主权40年: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的报告中指出,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我国的高校招生自主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扩大到落实的艰难过程,具体包括零星探索、政策推动、法律确认、单项突进、综合改革五个阶段,探索之路的艰难也反映了相关理论建设的不足乃至缺失。刘清华副教授在《恢复高考40年高校招生综合评价的新维度探索》的报告中指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年来,高校如何进行招生综合评价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重要政策问题,未来我国的普通高校需要从影响学生发展的认知与非认知因素以及学习环境条件出发,逐步完善招生综合评价政策。周剑清副教授在《渐变与突变:高考语文回归40年的考量》报告中指出,语文高考恢复40年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理性分析语文高考存在的问题,警醒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不断完善高考制度,实现语文高考的渐变与突变。刘恩贤副研究员在《顺应与进取:高考恢复40年的四次转机》中认为,真正推动高考改革前进的,是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实践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任何制度、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博士生朱沛沛在《我国高考录取政策40年变迁研究》中应用支持联盟框架理论,以高考录取标准政策子系统为分析单位来理解我国高考录取政策四十年的变迁历程,发现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博士生陈丽在《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40年来高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中谈到高考政策的“精英立场”与“草根情结”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形成二元悖论,在选拔国家建设所必须的社会精英的同时,应更加关注社会底层的诉求和夙愿,为草根群体搭建实现社会流动的公共通道。博士生许露在《恢复高考初期英语翻译题型特点探析》中分析了1977年至1981年间的英语翻译题型,总结出六个主要特点,从这些特点中反映出四十年前的那群知识青年,渴望读书的执着精神和披荆斩棘的无畏勇气。

二、高考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

每年一次的高考,吸引着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的目光;每到录取的季节,高考总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中心。高考改革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高考改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学者们对高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各抒己见。覃红霞副教授在《自主招生可以休矣?》中认为自主招生改革应该重新整理自主招生制度的基本定位与定性、探索自主招生改革对普通高考改革的整体性价值、处理招收“通才”与“偏才”的矛盾、加强高校自主与自律制度与精神建设,从而实现从技术改良到制度革新的变革。乐毅教授在《正确认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导向性作用》中指出,新高考改革有着“全人”培养目标的导向,改变过去文理分科培养“半人”的做法;更加注重综合素质评价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增加学生的可选择性,追求学生的个性发展;倡导高中和大学联动衔接,加强彼此的相互了解。陈兴德副教授在《“新高考”如何“倒逼”高考综合改革——重估“新高考”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地位》中认为,当下要重新审视“新高考”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地位,通过高校综合改革的持续深入,促进高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式转型,加强差异化竞争与特色化办学,从而确保新高考和高校综合改革稳步走出改革“深水区”。董秀华研究员在《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挑战》通过对浙江省、上海市试点推进情况进行分析,从高中学校的选考科目组合供给、教学安排、学科间不等值的质疑和对学生的心理影响等角度,梳理了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实际推进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战。刘希伟副教授在《浙江高考等级赋分制:学

生认可度的实证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探讨高中生群体对于浙江高考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的认可度,发现错位竞争行为、跨级赋分、选考科目两次考试制度设计的价值感知、限制与调整选考科目考试时间的反应意见等,对于选考科目等级赋分的学生认可度具有显著性影响。李木洲副教授在《高考文理不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蕴》中谈到新高考试点文理不分,并非是简单的历史回归,它既符合世界大学入学考试科目设置的基本范式,也符合国际创新型人才和拔尖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是基于时代变迁对人才选拔培养目标变化的适应性回归。范晔博士在《中国高考改革研究的核心及其演进——基于CSSCI数据库1998-2016年期刊文献的共被引计量分析》中,应用引文计量分析方法得出刘海峰、郑若玲、杨学为三位学者是我国高考改革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与重要影响;《教育与考试》《教育研究》与《考试研究》3个刊物是我国高考改革研究核心文献的重要载文期刊。吕慈仙副研究员在《异地高考政策在随迁子女家庭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入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基于国内若干个大中型城市的调查分析》中,应用实证方法对1436名八年级至十二年级在读的随迁子女进行研究,从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心理融入三个维度考察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现状,并探索了异地高考政策在随迁子女家庭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入关系上的调节作用。陈斌博士在《“异地高考”政策复杂性探微——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异地高考”方案的内容分析》中认为,要有效推进“异地高考”方案的实施,应努力构建多方参与决策机制,合理配置流入地教育资源,适时调整报考准入资格,逐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三、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及其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考改革需要理性把握国内教育全局,同样也需要借鉴域外高考改革的合理经验,以促进高考改革科学、高效、有序进行。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晓阳在《英美日招生制度及其对我国大学高考招生制度的启示》中重点介绍了美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他强调美国是非常注重个人主义的社会,所以个性品质、领袖品质显得尤为重

要,美国一流大学的录取标准,就是影响世界的人,或者有这种潜力的人。所以仅凭借考试成绩一定进不了哈佛,要让学生讲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故事是什么。刘额尔敦吐教授在《中澳高校招生民族政策比较分析》中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澳两国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制度、高校招生民族政策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实施的目的和内容等方面则存在不同之结论。胡永红博士在《“三位一体”思维下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新探》中指出,日本在2013年进行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以高大衔接为主线,关注人的生存能力,以思考力、批判力、表现力的“三力”培养贯穿教育全程,贯穿考试改革全程。这种全景式的新考试改革趋势遵循教育考试的内在逻辑,避免了市场逻辑的湮没性冲击。李雄鹰副教授等在《日本大学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研究》中通过对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历史沿革的梳理,归纳出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评价体系具有统一性与自主性、多样性与灵活性、综合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卞翠博士在《法国一流高校多样化考试招生探析》中以法国一流高校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对象,运用历史发展视角,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了解法国一流高校的人才选拔机制,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观察与反思。

陈为峰副研究员的《美国一流大学生源优化策略探析——基于36所院校的调查》一文,通过对美国36所样本院校的调查,探析其生源优化策略,对其拓展生源市场、构建多样的推介平台和信息发送渠道、多维度全方位有侧重的推介内容等方面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杨馥博士在《美国高校推行肯定性行动的动因探析》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实施肯定性行动是多方面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获取联邦资助是高校推行肯定性行动的重要目标,构建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则是高校实施肯定性行动的直接原因。凌磊博士生在《韩国一流大学弱势群体招生考试探析——以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为例》中,探讨了韩国一流大学在定时招生和随时招生中为弱势群体考生单列招生考试计划,对外公布招生计划人数、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和考试内容等,分析了韩国全力协调弱势群体接受高质量大学

(下转第29页)

科举制兴废的人学视角*

李木洲 唐宇聪

摘要: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举制的产生是我国古代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不断革故鼎新或继承创新的结果。但从人学视角来看,科举制的诞生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人我关系”不断转移的结果,即由人我的类属关系、绝对的“我我”关系、绝对的“敌我”关系、相对的“我我”关系、相对的“敌我”关系再到“唯我”关系正式成型的发展产物。这种人我关系的不断转移,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人的需求层次的不递升与变换。而科举制的终结,也是因其变革不及导致唯我关系的内部消解与自我实现的彻底崩塌的结果。

关键词:科举制;兴废;人我关系;需求层次

传统的观点认为,科举制的诞生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力量与人才选拔客观发展规律等内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认识,无疑是将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客体来考察,而忽视了科举制产生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人的需求,即从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来探讨。因此,科学认识科举制,除应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与制度发展自身规律等因素外,还应注重考察制度的创造者——人自身的因素,只有兼顾“环境、规律、人”三维视角,才能系统揭示科举制诞生及其兴废的多重原因。

一、制度产生的人学视界

人学是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1]它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存在物进行考察,试图发现人的属性、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2]制度之所以诞生,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在根本上是源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自身根本属性的清晰

把握,这一点古今中外有共同的认识。在中国,《说文解字》讲:“制,裁也。度,法制也。”“制”与“度”合二为一即制度,是指“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尺度”^[3]。在西方,制度产生于对人性的先验假设。早在17世纪中叶,曼德维尔就对制度的产生及作用作出了基于人性的解释,他指出“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会使坏人也可大众的福祉服务;而制约自私行为肆意妄为的大多数制度是在人类实践中自然生成的。”^[4]至20世纪初,诺斯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理念的自我维护系统”^[5]。这些不仅表明了制度产生的内生性、客观性及发展性,也指明了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人性的客观认识,或可说,制度在本质上是人对自身善恶的一种体察与控制的需要。

作者简介:李木洲,男,湖北广水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湖北大学院校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试制度及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武汉 430062);唐宇聪,男,湖北荆州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楚才学院联合培养(武汉 43006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教育青年项目“转型与构建:高考制度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CAA140117)研究成果。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东西方都有各具特色的见解。在西方,对人性论述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圣经》,其创世纪篇中记载了上帝在第七日造人后,亚当和夏娃在恶魔的怂恿下偷食“知善恶树”的禁果,最终被赶出伊甸园的故事。人类的祖先至此开始被打上恶的印记。《新约·马可福音》借托耶稣之口,宣称“从人里面出来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随着基督教对现实世界影响的不断加强,为了保持人对上帝的纯洁信仰,一大批神学人员走入人性恶的命题。奥古斯丁提出决定论式的“原罪”和“救赎”理论,认为上帝是善的化身,人有罪的原因在于滥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自愿的背离善之本体(上帝)。在西方世界的统治权由宗教转向世俗后,原罪理论并没有消解,相反为了加强君主对社会的专制,政治家有意识地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如,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面对有限的财富,人与人之间就是狼与狼的关系。”^[6]这为西方君主立宪政体的形成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而这些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导,性恶论也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一种普遍认识。

在中国,先贤们对人性的判断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大致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告子为代表的人性中立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之分,皆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其譬喻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墨子提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丝染说”也是基于此理念。二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孟子反驳告子“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据此,孟子提出人有仁、义、礼、智四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三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故而教育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伪”。其弟子韩非也持这一理论。四是以周代世硕为代表的兼善恶说。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7]西汉董仲舒也倾向其说,提出了“性三品”

理论,认为“性如于禾,善如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8]

通过比较发现,西方对于人性的判断更为果断和坚决。这主要是由东西文化发源的差异所致。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岛屿的星罗棋布、物资的有限让西方人出于生存的需要很早就非常注重探索“我”之外的世界。那么在探索外部世界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将“我”之世界和“我”之外的世界进行界限分明的划分。而直接承认人的恶有助于将内生的道德世界与外生的自然世界相区分。人的原罪意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既然恶出于己,那么人就必须加强对善的努力。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导善”实现对内部恶世界的赎罪和净化。放眼东方,中国文化发源于大江大河之间,物质资源的丰富让中国人不必向外探索便可以轻易获得生存所需,故而中国文化自源生之初就存在着“我”与“非我”之间边界模糊的问题。因此,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更偏向于消解善与恶的界限,让其处于一种模糊的“非善非恶”、“既善又恶”、“可善可恶”的状态。但是无论是西方明确的善恶观还是东方模糊的善恶观,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承认了“恶”的存在。而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则会让其想方设法“避恶”或“克制恶”。最初这种克制是野蛮的、血腥的和难以被人接受的。而后来为了规范克制恶的方法,增强人的幸福感,就诞生了一套群体公认的法则,即“准制度”或制度。最早的制度以刑法的身份出现,代表伤害与威慑,主要用于惩恶。例如西方汉莫拉比法典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同态复仇原则,中国商朝的炮烙之刑、西周制《吕刑》等,伴随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类意识的觉醒,制度又逐渐文明化、多样化,其功能由惩恶走向扬善。因此,制度的产生实则是人本性的外部投射。或者说制度产生的初衷是人希望通过物化一个“非我”的存在来加强对自身的管制和规范,内中蕴含着人最原始的自尊自觉意识。科举制作为制度的一种,其兴起符合制度产生的基本逻辑,只是其在表现人的自尊意识方面有其独特性。

二、科举制诞生的人学观点

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举制的产生是我国古代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不断革故鼎新或继承创新

的结果。但从人学视角来看,科举制的诞生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人我关系”不断转移的必然结果,即由人我的类属关系、绝对的“我我”关系、绝对的“敌我”关系、相对的“我我”关系、相对的“敌我”关系再到“唯我”关系正式成型的发展产物。

(一)推举制:人我的类属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关系的变化反映着人自身的现实生存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才选拔制度的演变实则是人我关系转移的结果。在古代中国,人才选拔主要有五种形态。第一种是产生于原始部落的推举(选)制。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部落成员间形成了初级劳动分工。通过选贤与能和实践考察,部落成员以民主的方式选出部落首领。恰如孟子所言:“舜发于畎亩之中”。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初是“类”的关系。群居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人原始的动物性对同类天然的亲昵,推举首领是为了维护类属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是在残酷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中,群体的力量远比个人力量更具竞争力。但是,由于此时人理智未开,仍具有极强的动物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将此状态下的人我关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稳定的“关系”来看待,只能说它处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有中的无”的状态。

(二)世卿世禄制:绝对的“我我”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社会中人人关系的蒙昧状态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得以改变。自然给人的受动性逼迫人实现自觉,而人们率先觉醒的就是基于繁衍而带来的生命意识和血缘意识。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社会开始形成新的人我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中表现为奴隶制国家的成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增加。这也促使人才选拔制度进入第二个阶段——世卿世禄制。西周时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策略迅速的改变了自殷商以来的方国联盟的政治格局。政治身份依据血缘的亲疏进行代际传承。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纽带,用血缘宗法关系打破家国的壁垒,实现了家国同构。此时的人我关系

是一种绝对的“我我”关系,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异性。其特征主要有二:一是统治阶级内部以血缘关系淡化人与人的个体差异性。在宗法制下,公侯伯子男往往也是叔伯甥舅。既然是一家人,那就不存在“我他”的区别。二是被统治阶级由于缺乏知识,无法产生对“我他”的认识。西周“学在官府”的文教政策让知识仅在统治阶级内流动。因此,下层人民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状况有一种天然的承认,或者说是动物性的跟随。他们没有进入政治世界的权利,只能长期生活在自然世界之中。而在自然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极小,因此“我我”的观念也就长期的盘踞了下来。

(三)军功制:绝对的“敌我”关系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西周的覆灭,一股新的力量——士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打破了知识仅在上层流动的僵局,使普通民众开始觉醒自己的意志。在认识到人与我在身份、权力、地位、财富的不同后,人们开始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阶层差异,获得自己应享受的权益。而统治阶级间也因为血缘的淡化而不复团结,企图重构属于自己的小家国体系。如此种种,让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绝对“我我”关系无法继续维系,这就产生了第三种人才选拔制度——军功制。公元前356年,商鞅于秦国变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将野蛮的杀戮以功利的形式合法化,黥武主义走向巅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绝对的“敌我”关系。其特征在于阶级内部因国别的差异而互相仇视,攻伐不断,而阶级间因公平意识的觉醒而充满矛盾与冲突。

(四)察举制:相对的“我我”关系

伴随大一统国家的成型以及平民政治对贵族政治的胜利,人与人之间的绝对敌我关系由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开始向新的方向转化。这就促成了第四种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的诞生。汉高祖时期,察举制初具雏形,至汉武帝时发展趋近完备。选拔人才主要分为自上而下的征辟和自下而上的荐举。察举分岁科与特科,岁科最重孝廉,而特科则最重贤良方正。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将人才阶层流动的

方式文明化,其反映的人我关系是一种相对的“我我”关系,即人与他人之间虽然仍具有无差性,但是这种无差却可以被人打破。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看似是低区分度的关系,但却由于学识的高低存在着超越原有“我我”关系的可能。《史记》载:“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就是典型的例证。二是从公民身份到政治身份的阶级跨越建立在被“察举”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五)九品中正制:相对的“敌我”关系

由于公民身份的转化被察举者操纵,“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成为汉末人才市场的常态。阶级上升的可能性被无限降低,人们开始主动撕裂相对“我我”关系的伪善面纱,人才选拔由此走向九品中正制。公元220年,曹丕采纳尚书陈群的意见,实行通过朝廷委任中正官,由中正官根据家世及行状两个维度对地方人才进行三类三层共九品的品级评定,然后以给定的品级对人才委以官职的政策。但随着中正官权力的膨胀及门阀的逐渐成型,庶族与士族成为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士族以光鲜亮丽的姿态“世袭地以俸禄形式分取租调剥削和世袭地成为政权组织中的上层统治者。”^[9]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相对的“敌我”关系,充满较强的斗争性和对抗性。由于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人民流离失所,民族斗争胜过阶级内外部斗争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但是一旦政权稳定,阶级内外部斗争势力又将抬头。因此,此时的人我关系可称为“相对的‘敌我’关系”。这种关系由于潜藏着剥夺彼此生命的可能,所以注定它不能被长久的维持下去。

(六)科举制:唯我关系的正式成型

科举制的产生,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我关系再次发生转变的结果。一方面,政治上,社会由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另一方面,士族领主经济形态转变为庶族地主经济形态。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开科取士,将阶级的升降以考试的形式予以规范。科举成为一种“人本化的反身评价活动”^[10],集育才、选才、用才于一身。它不仅弥合了阶级间剑拔弩张的分裂状态,而且让阶级内部以一种更科学、标准与规范的形式完成对

社会资源和政治身份的分配。在科举时代,除倡、优、皂、隶等不能报考的特殊群体外,总体上人与人之间的既有差别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即“学而优则仕”)而逐渐消除甚至超越。因此,科举制的诞生意味着“唯我”关系的正式成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阶级内以个人才能得升迁,阶级间以个人程文定高下。由于近世以来科举制对世界制度文明的巨大贡献,其又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1]。

三、科举制诞生的人学逻辑

人的存在就意味着需要^[12]。如果我们将人作为科举的主体与客体,就必须考虑人的需要对科举制产生的重要作用。马斯洛指出,人的基本需要有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首先得满足自身的低级需要才能向高级需要迈进,而当多种需要并存时,又必须先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不难发现,科举制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遵循着人的需求发展的逻辑主线。原始社会,由于人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残酷的自然考验,与天争命、与兽夺食的过程往往是生死一线。因此,如何才能获得更有保障地生存是原始人类思考的主要问题。随着生存、生活实践经验的增加,人们发现只有贤者才能充分发挥族群的力量,使部落获得相对安全地生存与繁衍空间。据史籍记载,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都是由选举产生,大多具有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优良品德和尊贤容众的民主作风。如帝喾能够“普施利物,不守其身”,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慢)”,帝舜能够根据“八元”、“八恺”的具体能力而各尽其用^[13]。因此,原始的民主推选制实则是人出于生理、生存的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

进入奴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有效地解决了人的“温饱”问题。但是如何让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发挥更大效益,如何让政权变得更加稳定成为摆在统治阶级面前的难题。此时原始社会虽然已结束,但人自原始社会遗传而来的对血缘天然的亲密和无比的信任并没有完全消失。《诗经·小雅》载:“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便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血缘关系选拔人才进而

实现对既得利益的天然继承成为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世卿世禄制即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制度产物。但是随着血缘关系的淡薄、周天子权威的沦丧,封国间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中国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人们不复享有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太平盛世,相反要饱受战乱之苦,人身安全受到致命威胁,而等级制度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底层“人命如草芥”,而“千金之子则不坐垂堂”。因此,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乃至个人,出于对家国“安全”的考虑,一种既能满足国家争霸需要,又能激励个人勇于献身和实现阶级流动的制度——军功制,得以催生。可以说,军功制是符合战争年代“国、家、人”需要的一种强力机制。

随着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人们在安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便开始主动的去探索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社交,即爱与归属的需要。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归根结底都是兴起于地缘间,特别强调宗望、郡望和人望,强调人在群体中的归属。因此清人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群望》载:“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自唐时又有“五族七姓”之说,言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门第最为清高。这都是人对社交的需求在制度中的反映。但是,这种制度由于在满足人社交需求的同时,又通过等级限制了人的社交圈的扩大,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它又压抑了人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一种新的替代制度——科举制呼之欲出。正如有研究指出:“隋所创之科举制,至少具有其他选才制度难以企及的三大优点,即客观性强、公平性好、效率性高”^[14]。也正因如此,科举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以一种最理性的方式给予人取得尊严的途径和追求尊严的自由,通过读书——考试的形式让士阶级看到了自身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可能。这种在根本上对人性的满足,既是科举制产生的诱因,也是其在历史的风云诡谲中始终充满生命力,绵延1300年的主要原因。

四、科举制遽废的人学解构

清末,科举制被废止,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

因,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各类弊病以及封建皇权的腐朽严重压抑人性,致使士人举子再也无法通过科举找到家国前途与个人荣光,从而在思想上率先打翻了科举考试的神坛。可以说,科举制的遽废是晚清国人在变迁与动乱中丧失精神支持、民族自尊与国家自信的必然结果。

(一)唯我关系的内部消解

其一,传统人文精神衰亡导致自信力的倒退。有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以传统经学教育为载体的”^[15]。但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第二波西学东渐高潮的来临,经学在面对西方的冲击时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首先是经学教育的荒废,有名无实。《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当时教育的情景言道:“天下教官多昏耄,滥竿恋栈。虽定例六年甄别,长官每以闲曹,多放宽假。”^[16]而作为官学代表的国子监,其“坐监”制也逐渐废弛,儒家传统人文精神也因失去了载体而无处安放。其次是西学地位的抬升。当天朝上国的骄傲被列强的铁蹄打碎,中国人开始怀疑中学的有用性,故而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愈发重视西学的作用。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虽非主体,但摆脱了“夷学”的称谓,在政治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901年,清廷上谕废八股、以策论试士。西学热潮再次在基层教育组织机构兴起。塾师的知识结构也在由传统中学向西学发生转变。^[17]在民间,教会学校的兴起、留学教育的发展也表明中学对人们的吸引力已不复从前,或者说,伴随国家主权完整的破坏,国人对中学的自信在逐渐衰退,对自身接受中学教育后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

其二,国家政治社会动乱致使自尊感的失落。首先,尊严失落表现为列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控制日益加深。自《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列强对中国的蚕食从沿海推向内陆。在传统教育中被灌输的强国形象与现实中国家的羸弱不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国人心理的颠覆是无法想象的。恰如李鸿章所感叹“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而封建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毫无底线的妥协更让国人失掉了最后的尊严,激起了立宪派和改革派重构政体的坚定决心。而作为专制主义

之护符的科举制,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改制必须破除的桎梏。其次,尊严失落还表现为科举人才选拔功能的弱化。晚清科举弊病丛生。偏难怪题的出现、八股文风的空疏以及层出不穷的舞弊现象让举子成为人才选拔制度的奴仆,没有人的尊严。科举制度也因此丧失了对人才的甄别功能,失掉了士人阶级对科举的基本期待。

(二)自我实现的彻底崩塌

其一,专制统治压抑人性。清朝对人性的压制,在其创立之初就已现端倪。为迅速完成全国的统一,满人高喊“留发不留头”的口号,以最血腥的方式强迫人在历史与当下作出取舍,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然人性的放逐。而清朝在确立统治地位后,便开始着手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对人的控制,其范围之广、禁锢之深放眼历朝历代都是空前的。其中最严酷的表现就是文字狱。据统计,“顺治兴文字狱7次,康熙兴文字狱12次,雍正兴文字狱17次,乾隆兴文字狱130余次”。每一次文字狱的兴起都是一场腥风血雨。因此,清代国人在高压之下,难以进一步去寻求思想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人对思想自由和解放的近乎本能的渴望又迫使其去追求。在此矛盾之下,人的本性被扭曲,转而寻找到考据学这一条折中之路。这又进一步加强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文风,加速了科举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其二,科举断废士人自我实现之路。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科举的功能弱化。这一点从晚清的普通读书人——朱峙三对科举的态度变化可窥一斑。1893至1900年间,朱峙三刻苦攻读的最大动力源于其父,称“我家两代住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有靠汝读书寻出路耳。城内之张、涂非世家,皆奋起之寒士,汝当细思之,并效法焉。”至1902年,科举在士人眼中已不再神圣,朱峙三言道科举的功用在于“舍此不能脱贫,至于做官则在第二步”。但是就连脱贫的目标,在朱峙三中秀才后也未能实现。中秀才后接踵而至的各种应酬花销不仅远远超过了他预期的“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而且从此使家庭背上了新的债务。故而他哀叹:“今年入学金称为幸事、喜事,予则视为受累不少之事也。”^[18]可见,晚清科举做官——富家——耀祖的潜在功能已经逐渐丧

失,普通士子对科举的热情也不复存在。二是科举制自身的先天局限。科举制在设立之初是通过相对标准化的形式选拔多样化的人才。但是,随着维护封建皇权的需要,科举对人才出路的给定日益窄化。做官成为读书的最大目的,不参与科举,就无法获得生存的空间。这就迫使士阶级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诸如蒲松龄等在文学创作上有天赋的人因屡试不第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终生穷困潦倒,难以实现抱负。三是特殊的历史背景。晚清国门洞开,西方先进思想纷纷涌入中国,世人价值观开始出现多元化。与此相反,科举制不仅阻碍了新式人才的培养,还阻碍了人民救亡图存的梦想。孙中山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建议要“人尽其才”,使“天无枉生之才,野无郁抑之士”,以求“人能自奋,士不虚生”。这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科举制已经是令人徒生抑郁的存在了。对人正常需求的压制如此之深,焉能不亡?在1905年,科举制终于交卸其承担了1300年的抡才重任,成为中华民族一段辉煌而又令人难以言说的历史。

结 语

一部中国考试史,是一部人我关系的变化史,也是一部国人需求层次递升与变换的发展史。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源于类属的亲昵及生存的需要,让部落推选成为人才选拔的主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政治形势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由我我、他我转向唯我,需求也由低级发展至高级。在这一流变中,科举制得以成型,成长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人才选拔制度。它不仅让阶级流动的方式得以规范化,有效地解决了自魏晋以降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而且给予底层人民改变生活的希望,进而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但是,由于晚清政局的糜烂,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绵延近千年的天朝上国的骄傲在冰冷的现实中被无情的击碎,国家的自信、民族的自尊丧失殆尽,也基于此,在救亡图存的思潮中,西学取代中学成为国人新的精神支柱。科举制赖以维系的唯我关系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消解。与此同时,伴随封建皇权的强大,科举制蕴含的统治工具性质越来越强,而人才选拔功能却日益弱化。在士阶级的自我实现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科举制又丧失了其最为忠实的阶级

基础。总之,在内外因的双重挤压之下,科举制的遽废既在意料之外,又也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 [1]韩庆祥,邹诗鹏.人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
- [2]陶富源.哲学、人学与人[J].哲学研究,2003(11):22.
- [3]谢志龙.“制度”是什么?——探索“制度”一词的含义变迁[J].文史博览:理论,2015(10):22.
- [4]杨春学.个人利益,社会经济繁荣与制度之形成:客观确定的善[J].管理世界,2002(7):152.
- [5]青木昌彦,周黎安,王珊珊.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6):33.
- [6]张忠利.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268.
- [7]陈瑛,林桂榛.“人性”新探[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26.
- [8]董仲舒.春秋繁露[M].中华书局,1991.167.
- [9]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8):4.

[10]廖平胜.科举考试的人本视角[J].湖北招生考试,2005(16):12.

[11]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J].探索与争鸣,1995(8):41.

[12]扈中平,蔡春.教育人学论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3):4.

[13]王国良.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荐制度的发展[J].文史哲,2013(3):24.

[14]李木洲.科举制兴起的深层逻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09.

[15]但昭彬.科举制之遽废与传统人文精神之消退[J].湖北招生考试,2005(16):20.

[16]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26.

[17][18]田正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J].教育研究,2012(11):130,131.

(责任编辑:王伟宜)

(上接第22页)

教育机会的具体做法。张飞彦讲师在《从世界高考制度发展改革趋势看中国新高考政策变革的利益诉求》中,通过分析美英日三个发达国家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现状,归纳出世界高考改革共同发展的三大新趋势和价值取向。万圆博士生在《美国一流大学本科招生综合评价的多重逻辑研究》中,以美国不同类型的七所高选拔性机构为案例,对53位招生专业人员及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文本进行分析,剖析美国一流大学本科综合评价中使用的考量因素,得出美国一流大学本科招生使用的综合评价是学术逻辑、文化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实践逻辑、伦理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上述学者对国外招生考试制度经验的介绍,为我国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

和借鉴。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在闭幕式的致辞对我国高考研究现状做了精炼的归纳、对本次研讨会做了精辟的点评,认为我国的高考研究具有“三多三少”的特点,即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少,一般议论多、深入研究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少;此次学术研讨会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具有长远的现实价值,整体而言,也可归纳为三大特点,一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二是理论与现实交互研讨,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展望未来,期待高考恢复50周年时,大家能够再聚一堂、再论高见。

(责任编辑:王伟宜)

宋代词科研究述评

刘彦

摘要:通过全面检索、分析学界对宋代词科的研究著述,根据清及清代以前、近现代、当代三个时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以理清宋代词科研究的脉络及得失,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宋代词科相关问题提供借鉴。总体来说,学术界对宋代词科的关注点在制度研究上,而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渐次展开,但相比制度而言,仍然比较薄弱,还有待于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键词:宋代;词科;述评;借鉴

词科是宋代重要的科举类别之一,是“为了弥补王安石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所造成的四六应用文写作人才的匮乏”^①而特设的科举考试科目。其设立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延至南宋末年,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和词学科等四科。相比于唐代科举、明清科举,甚至宋代其他科举科目,有关宋代词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目前,学界对于宋代词科研究成果缺乏系统且客观地梳理与评论,这不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宋代词科的整体风貌和学术价值,也不利于日后对宋代词科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鉴于此,我们以时间为序,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对历代有关宋代词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清及清代以前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宋代词科文章的整理与研究。这里所说的宋代词科文章主要指词科举业文。词科举业文包括词科举文和词科业文两部分。词科举文是指词科中选者在考场上所作的文章。词科业文,也叫词科行卷,是词科中选者试前投送给礼部的以获取考试

资格的习作。在宋代词科的考试中,只有博学宏词科有“行卷”规定。这些作品是非常宝贵的原始数据,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已经散佚了。对词科文章加以整理与研究的主要是宋人。宋代词科中选者中不少是有宋一代的通儒硕学、著名学者,他们大都有文集传世,这些文集中保留了一部分词科文章。如南宋洪适有《盘洲文集》传世,该文集保存了洪适二十三篇词科举业文,其中宏词所业二十一篇,举文两篇。又周必大有《文忠集》传世,该文集完整保存了其三十篇词科举业文,其中宏词所业二十四篇,举文六篇。宋代的编著活动十分活跃,当时的崇文阁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典籍,官方经常组织人员对各种典籍进行整理编辑,从而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总集。这些总集对于保存文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宋及以后,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供举子备考。官方为了示范,时常将优秀程文汇编成册,书坊则大量翻刻。这些总集中也保留了一部分优秀的词科文章。如宋代建昌军学曾刻《宏词总类》四集九十五卷,搜辑保存了大部分宏词科举业文,可惜已经亡

作者简介:刘彦,女,山东济宁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汉语词汇、修辞 (武汉430072)

佚了。又有吴焕然编的《圣宋千家名贤表启翰墨大全》一百四十卷,魏齐贤、叶棻编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五十卷,佚名编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三百卷,等等。

另外,在一些总结四六文写作经验的专著中也保存了一部分词科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应麟的《词学指南》。《词学指南》共四卷,是专为士子应博学宏词科而作的。王应麟在书中除了指示法则,记述轶事外,还对一些优秀的程文加以品评,如在《制》体下,列举评论孙觌、洪遵、王壁、莫冲等人的制文,将经验、理论与实际作品相结合,给士子们以最直观的启发。

其次是对宋代词科考试制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散见于正史、会要、政书、诗话、类书、笔记和别集中,主要是对词科制度的记载、考述和评价。如《宋史·选举志》《宋会要辑稿·选举》《文献通考》《四朝闻见录》《容斋随笔》《词学指南》《水心别集》,等等。它们对宋代词科考试制度都有十分详细地记载和评价,为我们研究宋代词科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例如,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中书省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故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今来既复旧法,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之类,凡诸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设科。诏:别立宏词一科。”^[2]这则材料记录了哲宗朝设置宏词科的初衷。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0《词学科目》记载:绍兴法规定,考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3]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记载了宋代词科考试的“试卷式”^[4]:

本贯云云。应博学宏词。具官。姓某。年若干。

一、习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

一、出身。

一、无过犯。

一、三代。

一、合家口。

一、今试。如曾试亦开具年分

奉

试博学宏词二首

第一首

题

限字以上

第二首

同前

涂注乙

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限二百字以上。记、序。限三百字以上。凡言祖宗及上字,并别行。言圣恩之类,并空字。箴、铭、赞、颂,逐句空字。

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宋代词科的试卷形式和具体答题要求。南宋叶适在其《水心别集》卷一三《宏词》一文中对词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5]笔锋犀利,直击词科要害。词科在宋末的衰落,与叶适等人的批评是分不开的。

从学术层面来看,这些评价和论述比较简单,缺乏系统性,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有关宋代词科的学术研究。

第三是对宋代词科文体的研究。宋代词科共试十二种文体:制、诰、诏、表、檄、露布、箴、铭、记、赞、颂、序,清以前学者对这些文体的研究,最早最详尽地还要数王应麟《词学指南》。《词学指南》是唯一一部词科研究专书,卷一“编题”“作文”“语忌”等篇从整体上谈论了词科所试十二体的写作要领及取材、取法等问题,卷二至卷四依次详述十二种文体的格式、演变、种类及写作方法,有些文体后面还附有优秀的词科程文。王应麟在书中谈论词科各文体时并未有意识地讨论修辞问题,但他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及相关程文的点评多是从修辞角度进行的。例如,王应麟提出了词科修辞的一般原则。在《辞学指南·语忌》篇中,他引刘勰《文心雕龙》语:“风骨乏采,则

鸢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鸣凤也。”^[6]认为好的词科文章既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又要讲究文辞的修饰。又引李德裕《文箴》语：“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7]反对为修辞而修辞，过分追求雕刻藻饰。又如，王应麟主张词科作文要“明法式”，各体文字必须严格符合体式。在《作文法》中，他引真德秀语：“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8]在《语忌》中，引汪藻对傅自得语：“今世缀文之士虽多，往往昧于体制，独吾子为得之，不懈则古人可及也。”^[9]在《制》中，引倪思语：“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10]在《表》中，引真德秀语：“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累举程文，自可概见。”^[11]真德秀、倪思、汪藻等人都谈到了作文必须要明体式，其中，尤以倪思“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王应麟引述他们的言论，说明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

二、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学界对宋代词科的研究较少，最值得一提的是聂崇岐先生1939年在《燕京学报》第25期上发表的《宋词科考》一文。该文可谓是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开山之作，主要侧重于制度的研究，对宋代词科的沿革、应试资格、考试程序、录取规模、中选者的待遇及官职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另外，聂崇岐先生1938年在《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宋代制科考略》一文，在该文第二小节《书判拔萃博学宏词皆非制科》中对博学宏词科的性质进行了考辨，他的论点很明确：博学宏词科非制科。这一观点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专著谈到了宋代词科与四六的关系问题。1936年初版的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宋代博学宏词科与四六的密切关系，认为四六发展之盛，应用之广，以及四六之弊所由来，皆与词科有关。1941年初版的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一书则认为南宋四六分期的主要依据即是词科的设置。这些观点对后人进一步研究

词科与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当代时期

当代时期，学界对宋代词科的研究渐次展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对宋代词科考试制度的研究。这是目前学界着力最多的一个方面，研究成果也最多。最有代表性的是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该书中对宋代词科进行了详细考察。第一章第四节专讲词科的设置，主要讨论了词科设置的历史背景、词科科名的变迁、词科的盛衰、词学科、博学宏词科的性质等问题。关于博学宏词科的性质，祝尚书先生认为宋代的博学宏词科，难以用“常科”“制科”范围之，可以看作是制科的变种，是宋代特有的一个科目。他的观点与聂崇岐先生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第三章又辟专节讲词科的考试，探讨了词科的考试流程、词科的录取与待遇、词科考试的得失。祝尚书先生重点论述了词科制度的利与弊，他认为利在于直接导致四六文在南宋的复兴，在不小的幅度上改变了南宋文学的面貌，使得文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弊则在于对当时文风的不良影响，士子耽于排比为文，藻绘为能，重蹈偶俪雕镂之覆辙。同时，因词科所习为官方文书的写作，所以内容不离颂美，使得南宋文士缺乏北宋面折廷争的骨气，而多谄媚小人。

祝尚书之后，亦有学人不断从各个角度对宋代词科制度作出不同程度的进一步研究。如，徐红、郭应彪《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一文，对词科中选者加以考察，认为两宋时期留下姓名的词科中选者为121人，其中107人有确切的中选词科时间。将制度条文与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结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制度史片断。王水照先生的《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曹家欣《从〈辞学指南〉看宋代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两文则将词科与《辞学指南》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王应麟的《词学指南》是现存保留词科史料最多和最翔实的著述，祝尚书在谈及《词学指南》在宋代词科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时说：“如果将上述各科、各年份考题以及各榜中第人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宋代词科编年史的精确框架。较之宋代科举其他科目因史料散亡难以完整复原

来,这是独一无二的。”^[11]所以从《词学指南》角度切入,无疑能更好地剖析词科的特色和时代意义。张骁飞的《王应麟文集研究》一书第六章第二节《由〈辞学指南〉看博学宏词科》亦是从《词学指南》的角度对博学宏词科的沿革、考试形态等问题进行叙述。张骁飞将宋代词科考试年份、题目、中选人制作成表,这对于我们整理研究词科举业文非常便利。

另外,目前出版的不少通代性的科举史、教育史专著,其中都有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考察,也都提及宋代词科考试制度。如,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卷2《宋辽金元》)一书第七章第二节就是专门讲宋代词科考试的,它按照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词学科四部分进行知识性介绍。

二是宋代词科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科举与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科举本就“以文章取士”,它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早在唐宋时代,就有学者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以现代理论和方法对科举与文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经过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是其中的力作。在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方面,代表著作则是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

而有关宋代词科与文学的研究,目前学界亦取得不少成果。就研究成果的形式而言,有公开发表的单篇学术论文或博士论文,如,曹丽萍《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2008),管琴《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2012),施懿超《〈辞学指南〉所见之宋代骈文思想》(2013),钱志熙《试论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2014),刘珺珺《王应麟的词科学与文学》(2009),曹家欣博士论文《王应麟〈词学指南〉研究》,等等。这些论文,或讨论词科与骈文的关系。如,曹丽萍《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一文分析了在南宋骈文的发展过程中,词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施懿超《〈辞学指南〉所见之宋代骈文思想》则从《辞学指南》角度阐述南宋词科与南宋骈文的关系。或讨论词科制度与某一文体的关系。如,管琴《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一文

论述了词科与内外制的关系。她认为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二是应试词科要求谙习典故、熟悉制度、遵循制文体式,词科人等者在后来的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的这些要求。或是从人物着手,阐述词科与文学的关系。如,钱志熙《试论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刘珺珺《王应麟的词科学与文学》两文则是以王应麟为个案,结合其《词学指南》,阐述词科与文学的关系。曹家欣博士论文《王应麟〈词学指南〉研究》则力图借助《词学指南》一书,还原南宋博学宏词科的全貌,还原宋代公文的情况;并着力从《词学指南》入手,剖析宋代文坛的写作风气以及宋代文章的写作技巧。

除学术论文外,还有一些专著,亦有关于宋代词科与文学的研究。祝尚书先生在其《宋代科举与文学》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词科的考试》中,详细论述了词科与四六文的关系。他认为词科造就词臣,词臣又受到朝廷较高的礼遇,使得四六文的地位大为飙升,这对当时文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四六文在南宋的复兴。四六复兴,使骈文不至在古文运动胜利后彻底衰落,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又使士子耽于排比为文、藻绘为能,重蹈早先古文运动领袖们所极力振拔的偶俪雕镂之覆辙。祝尚书先生另一著作《宋元文章学》,在谈论宋代四六、韵语、记序文时也多次提到了宋代词科在其中的影响。沈如泉《传统与个人才能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第二章《博学宏词科与洪家四六文》,将词科与具体作家群结合起来,分析在词科背景下洪氏家族主要成员的诗文写作活动及其特点,并特别分析了洪氏家族在宋体骈文方面的写作特点。

三是对宋代词科文章的整理与研究。目前学界对一些个人文集重新搜辑整理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完整可靠的词科文章数据。如由黄灵庚等人编辑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祖谦全集》;由张骁飞点校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四明文献集》(外二种)等。《吕祖谦全集》收集了今人所能见到的所有吕氏著作,约九百万字,其中第一册是吕祖谦文集《东莱吕太史集》。吕祖谦宏词所业二十四篇文章、

程试六篇文章全部保留在其中。《四明文献集》(外二种)是王应麟文集的第三次辑佚,其宏词所业和程试文章也全部收录在集中。

对宋代词科文章搜罗最富的是曾枣庄、刘琳等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全宋文》。该书包含了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是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词科文章大多被囊括在内。但该书是以作者系作品的方式编纂的,所有词科文章都分散在各作者名下,并没有进行专门整理。

四是对宋代词科文体的研究。当代学者对此研究多是在王应麟《词学指南》的基础上展开的。如,祝尚书先生《宋代科举与文学》在《词科的考试》一节中,只略举制、表两种文体的体式作法。张骁飞《王应麟文集研究》在《由〈词学指南〉看博学宏词科》一节中,专门研究了《词学指南》中的文章学,他对词科所试的十二种文体进行了分类叙述:王言之体—制、诰、诏;敷奏之体—表;军书之体—露布、檄;鉴戒颂德之体—箴、铭、赞、颂;叙事之文—记、序。

另外,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其中的某一种文体,如,祝尚书《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一文,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宋代文章学家对记、序文的“变体”及其体式、作法与写作技巧等的探究。徐燕斌、袁丽华《历代露布考》,主要考察露布这一文体发展演变历史。张海鸥《宋代谢表文化和谢表文体形态研究》,则主要考察谢、表的文体源流及文体形态。

以上仅是学术界对宋代词科相关问题研究情况的粗略概括,由于受客观条件和本人学识的限制,挂一漏万之处甚多,有待日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宋代词科的关注点在制度研究上,而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渐次展开,但相比制度而言,仍然比较薄弱。目前,关于宋代词科文章本体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宋代词科文章的具体内容、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方面的研究还鲜少涉及。这些现状反映出宋代词科研究尚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细致地研究,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参考文献:

- [1]祝尚书.宋元文章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7.
-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稿本。
- [3]宋·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539.
- [4][6][7][8][9][10][11][12]宋·王应麟.词学指南(卷三《王应麟著作集成·四明文献》附)[M].北京:中华书局,2010.514-515,514-515,398,397-398,394,398-399,425,452
- [5]宋·叶适.《水心集》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前集,四部丛刊景明刻黑口本。
- [13]聂崇岐.宋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伟宜)

“科举制度在台湾展览暨台湾进士后裔与专家座谈会”综述

姜周阳

2017年6月17-18日,“文脉流长——科举制度在台湾展”暨台湾进士后裔与专家座谈会在厦门隆重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指导,福建省档案局、北京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联合主办。作为2017年海峡论坛的重要子活动之一,充分体现了科举制度及科第人物在两岸交流、融合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活动的成功举办,表明了科举制度的深远影响及其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受到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活动由两部分组成。17日下午,“文脉流长——科举制度在台湾”展览在厦门市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雷春美、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江荣全、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郑大、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主任陈益源,以及两岸台湾进士后裔、专业学者和部分参加海峡论坛的人士120多人共同参加了开幕式。18日下午,海峡两岸的进士后裔及专家学者30余人举行座谈,深入细致的探讨台湾科举制度对文教事业的发展、两岸文化认同的影响,科第人物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科举文物遗迹保护等诸多问题。现将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整理并综述如下。

一、“科举制度在台湾”展览——台湾科举历史的图文展现

自隋迄清,科举制度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施行了

1300年。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受到纳入中国版图的时间、文化水平的差异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实施科举制度的时间有所差异。台湾地区最晚至宋元时期已经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并陆续有大批的大陆居民渡海入台进行开发、生活,但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93)清政府消灭郑氏割据政权,置府设县,方正式实施科举制度。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后,“文武乡闾,援照安徽赴江南汇考之例,仍归福建应试”。至光绪二十一年日本侵占台湾,台湾科举考试历史也至此终结。因此台湾实行科举制度有212年(1895年后仍有台湾士子内渡参加考试,并中式举人、进士),中式进士33名,举人305名,贡生近千。该次展览即是对这一历史进程及其影响进行图文展现。

“文脉流长——科举制度在台湾”展览,以大小金榜、奏折、图绘、碑拓、照片等近300份珍贵科举文物图片,配以文字说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简单明了同时又生动的呈现台湾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科第人物及历史影响。展览共分“文教发展,制度施行”、“文昌武隆,佳话流传”、“一脉相承,家国情深”等三大部分九个单元(不包括前言与结束语)。

第一部分“文教发展,制度施行”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简明介绍台湾科举制度实施前后传统文化的传播,侧重重要历史人物如郑成功、陈永华以及渡海入台任学官的闽籍科第人物如蓝鼎元等的重要作用。此外,强调台湾官学、书院特别是省级的鳌峰书

院等教育机关在台湾文化传播、两岸文化交流中的平台作用。第二单元介绍台湾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简要说明台湾士子童试、乡试、会试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朱墨卷、大小金榜等内容。第三单元主要是介绍由于台湾文教水平及其他现实因素,为鼓励台湾士子参加科举,清政府所采取的保障措施。如台湾士子在乡、会试中另编字号,设立保障名额;官送考生渡海参加科举考试;在北京与福州设立会馆等。

第二部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举人、进士名录,介绍清代台湾文武举人、文武进士总体概况。如对台湾33位文进士,分别列入了其姓名、中式时间科次、名次与籍贯;详细统计台湾文武举人自康熙至光绪八朝的中式人数分别为305人与284人。第二单元分别介绍陈梦球、郑用锡、曾维楨、蔡廷兰等文进士事迹。第三单元则介绍台湾父子进士、进士四翰林、舅甥进士、翁婿进士、师生同榜、一门六举等科举佳话。

第三部分三个单元主要阐述科举制度在台湾的实施,对台湾社会发展及两岸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一单元通过台湾的书院制度、诗文团体及现存文物古迹说明科举制度在台湾的实施,传承了中华文化。第二单元“难忘家国情怀”,通过科第人物反对外国侵略的事迹,展现了科第人物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第三单元介绍祭孔大典、诗钟兴盛、科举民俗、科举名人烙印等当代科举制度留存的印记。

二、科举制度、科第人物——维系两岸交流的纽带

陈锦谷在《福州与台湾的文化渊源》一文中讲到“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有着一条谁也无法割断的纽带,这条纽带是血脉相承和历史文化遗产、凝结而成的”,那么科举制度无疑是形成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一条考试纽带。科举考试作为一项以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为主要特点的人才选拔制度,几乎是封建时代平民实现向上流动的惟一渠道,自然成为读书人争相追捧的对象。加之清政府针对台湾所实施的特殊优惠政策,更激发了台湾士子渡海到大陆参加乡、会试的热情,从而打破了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相对隔绝的状态。而每逢三年大比,省城福州更成为全省士子交流观摩的场域,为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提

供了难得的机会。正如刘海峰教授在为《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清代福建乡试研究》一书所作序中讲到“科举是清代闽台交流的重要纽带,是融合两地文化教育的关键制度”。总之,科举制度的强大向心力、科第人物的积极进取精神使闽台之间乃至整个海峡两岸的交流与融合日益紧密。

在进士后裔与专家学者的座谈会中,与会的各位代表纷纷发表自己见解,从不同的角度阐明科举制度在闽台交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1. 科举制度与两岸文化认同。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台湾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从而构建了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了两岸不可分割的文化基础。福建省档案局丁志隆局长认为:“一项制度的顺利施行往往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它所产生的影响也会超越该制度的存在期限。因此,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100多年,不复存在了,但施行科举制度的基础——中华文化却在台湾得到了绵延不断的传承和发展,由此奠定了两岸关系共同的文化根基。”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从清代福建乡试实施的角度考察海峡两岸的交流互动。他认为福建的科举考试,在大部分时间包含台湾,即便台湾独立建省以后,闽台科举仍然同闹。三年大比是全省士子的大聚会,闽台各地举子共聚省城参加乡试,甚至会居留一两月之久,成为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场域。同时大陆尤其是福建的进士、举人和台湾往来也特别密切,很多赴台担任学官,促进了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两者的纽带是非常紧密的,是两岸、两地政府间的交往的重要渠道。北京大学卢咸池教授《中华文化、儒学教育、科举与台湾——兼谈闽台文缘》一文从科举制度与儒家文化的经联互动出发,认为明郑时期到清代,在台湾全面推行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表明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同时科举制度加强了两岸士子的往来,从而刺激了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台湾台南大学林登顺教授则从台湾学官所作的试录序中对台湾士子科举考试文章的评价着眼,考察科举制度的推行对台湾儒学发展、文化水平提高的作用。他认为陈宾、夏之芳、徐宗干等大陆入台官员,对台湾士子科举文章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说明了台湾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儒家文化在

台湾的传承。台湾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以后,返回台湾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一过程建构了两岸共同的儒家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对抗日本侵略和奴化教育的思想基础。

2.科第人物与两岸文化交流。科第人物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群体,包括生员、贡监、举人、进士等,他们构成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地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科第人物取得功名的过程,及其获得功名后积极参与地方文教、管理事务,是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以及促进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以台湾进士为主体,对科第人物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宏观的概述了台湾进士与大陆的紧密联系,认为“清代台湾33位进士的祖先,都来自大陆和金门,这些台湾进士只有少数回归台湾故里,绝大多数都留在大陆各地当官,他们的后人 also 分居海峡两岸,因此这些进士的先贤早就为两岸铺下了紧密相连的各层关系”。丁志隆持相同观点,认为“在33名台湾文进士中,大部分祖籍地为福建。而且台湾进士们都经历了一次或数次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的过程,他们在福州应试期间广泛交友游历,可以说福建是许多台湾进士的故乡。同时又是台湾进士们十年寒窗苦读后,参加乡试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的地点,是他们人生理想的重要起航点”。卢咸池教授从台湾社会发展与两岸文化互动的角度考察,认为清代台湾出现的33进士,人数不多,但说明了在中华文化熏陶下,台湾的政治、文化、社会状况跟上了国家的发展步伐。主要由进士、举人、贡生和秀才等组成的台湾士绅阶层,在台湾的社会进步、文化传承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在民族危亡、抵御外敌的时刻不懈斗争,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而台湾科第人物赴大陆任官、两岸士子共同组成诗文团体,都体现了两岸的文化互动。同时他认为不能忽视大陆特别是福建科第人物在两岸交流的重要作用。清代从福建各地前往台湾任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的科第人物多达300余人,这批选调自福建内地的教育官员及内地书院名师为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儒学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进士的整体研究以外,对进士个体的讨论也是此次座谈会的重点。丘秀芷女士是台湾进士丘逢甲后裔,她以丘逢甲渡海参加乡、会试的经历说明了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艰辛,并介绍了丘逢甲在乙未割台后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台湾文献馆的林文龙研究员则重点考察丘逢甲的文学成就,认为其在文章、诗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得到了大陆文人的认可。进士许南英后裔许沛则重点介绍了自己先祖在科举考试特别是反抗日本侵占台湾中的事迹,认为许南英“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同国家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的立场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此外汪春源后裔汪一帆、曾维楨后裔曾应霖等相继介绍了自己进士先祖在两岸文化交流、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就多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由于解读、分析角度不同,因此既有共鸣也有争鸣。如关于“开台进士”的问题,丘秀芷女士认为通过对诸进士籍贯的仔细分析,“开台进士”应是道光三年(1823)中式进士的郑用锡。郑虽生于金门,但少年即来台,相继中秀才、举人、进士,是在台湾养成。而之前的进士陈梦球、王克捷、庄文进都只是借籍台湾应试,并不能算是“开台进士”。对此,卢咸池教授认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的陈梦球虽以正白旗籍中式,但有资料证实其启蒙地在台湾,只是后来被编入旗籍,是实质意义上的“开台进士”,而郑用锡应为台湾“钦定中额下考取进士的第一人”。就丘秀芷女士所提出了清代金门科举的衰落,自郑用锡之后金门无进士的现象,来自金门县的黄振良委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原因在于清政府于康熙二年(1663)厉行迁界,严令金门所有居民迁往大陆,复界后金门人口锐减,且生活无着,无力进行举业。

三、台湾科举史料、文物——台湾科举制度的当代遗存

傅斯年认为“史学即史料学”,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谁占有史料,谁就更有发言权。对于台湾科举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自然不能脱离台湾科举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特

别是新史料的挖掘及应用。在此次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就台湾科举史料的搜集整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提出台湾科举历史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进士,要进一步搜集关于台湾305位举人的资料。资料的搜集也不能仅限于台湾和北京。由于台湾举人在乡试期间都曾在福州及其周边地区活动,因此特别强调该地区在台湾科举史料搜集上的重要性。汪一帆副教授从自身搜集汪春源资料的实践出发,强调两岸科举资料共享的意义。他认为台湾很多进士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台湾,赶考、游历、为官使他们活跃于大陆各地,很多进士后裔也分居两岸,导致台湾进士的史料比较分散,因此两岸的资源共享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观点得到黄正良委员的支持。黄正良从金门科第人物特别是进士的角度考察,认为历史上金门很多进士在大陆各地为官,甚至远至陕西、四川、云南等省,资料搜集十分不便,实现两岸资源共享可以大大便利台湾科举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曾维桢后人曾应霖认为部分进士没有留下文字资料,有些资料则由于文革的破坏而消失,只剩下一些口耳相传的东西,这些资料需要进行记录、整理,否则也会随着时间而湮灭。

科举文物是科举历史与文化在当代的直观表现之一。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社会,无数的科第人物,科举文物的遗存相当丰富。虽然台湾地区实行科举制度的时间只有两百余年,但在海峡两岸也有大量的科举的文物存在,成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历史见证。因此,台湾科举文物的遗存与保护现状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科举文物的调查、保护、修缮、开发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台湾会馆的研究、修缮与开发。台湾会馆是在北京的台湾同胞的活动中心,是两岸交流的重要见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此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台湾会馆经过1994年、2009年两次修缮而再现辉煌。保护、修缮之外,台湾会馆还积极寻求开发、应用,相继承办了台湾同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谈会暨图片展、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展、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等多项大型的

两岸交流活动,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此外进士的宗祠、家庙等由于家族的共同维护、修缮,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如郑用锡的郑氏宗祠、陈望曾的陈氏家庙、福建泉州丁寿泉的进士第等文物。但是仍有大量的关于台湾科举制度的文物没有得到保护,甚至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例如黄登瀛的进士第几乎处于坍塌的边缘,屋内所藏黄登瀛的官服画像、便服画像等也有多处损坏,一些精美的文物被盗窃、破坏。其与会的后裔黄荣国认为自己已经无力进行修缮。郑用锡进士第、蔡寿星故居、施之东故居等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此外,散居各地的碑刻、墓地、牌楼等文物都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北京市台联的郑大副会长认为科举文物的保护确实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位于城市中的许多科举建筑,在城市建设中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面临被拆迁的风险。更多的科举文物散居在乡下各地,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台湾科举文物的保护、修缮,必须扩大宣传,引起社会的广泛共识,增加文物保护意识,群策群力;要推动各地方政府充分履行文物保护、修缮的职责;此外,科举文物不能仅仅停留于保护、修缮,更要推动开发、应用,以便形成良性循环。

四、新的展望——台湾科举制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科举制度在台湾展览暨台湾进士后裔与学者座谈会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使该项活动继续成功举行,深化和拓展台湾科举制度研究,与会代表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认为,福建乡试及台湾305位举人是台湾科举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清代乡试录取率极低,因此举人的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素养都非常高,对台湾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及海峡两岸交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台湾举人群体的研究非常有意义。福建乡试是闽台合闱,乡试之年大量台湾科举生员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是闽台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两者之间的纽带非常紧密,不能忽视。闽江学院毛晓阳教授认为科举制度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不能局限于进士的研究,

(下转第 49 页)

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

朱舒华

摘要: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之一,因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全面、系统地影响了对我国古代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科举制促进了图书出版数量、种类的增加,推动了图书的发行与流通,影响了人们的藏书、用书心态,一定程度上推动图书事业的发展,对古代图书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文从图书出版、图书典藏与利用两个角度出发,探讨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以期对当今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及图书管理和利用工作有所启发。

关键词:科举制;古代图书事业;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设立专门科目进行考试、用以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肇始于隋,形成于唐,中经宋辽金元明,一直持续到清末,1905年废止。在1300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科举制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倡导读书和分科取士,决定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了图书出版的内容与类型、图书出版与发行、图书的典藏与利用;另一方面,民间对科举制做出的积极响应,求学求仕的人数增加,对书籍的需求又催生了图书出版市场的兴起,官私刻书机构的发展。本文以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为出发点,从图书出版事业角度探讨科举制度对推动了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出版、图书典藏与利用等方面的影响。

一、科举制决定古代图书出版内容和类型

(一) 科举制决定图书出版内容

科举制的实质,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之人并授予官职,从选官取士角度看,它是一种政治制

度,从考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它更多的是一种教育制度。科举成了教育的指挥棒,学校教育和民间读书都是围绕科举而进行。因此,科举制指导和操纵着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科举制度下,官府考什么,读书人就学什么,图书出版就出什么书。一般来说,儒家经典是历朝历代科举取士的必修必考内容。因此我国儒家书籍的出版、发行是古代图书中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大的图书。从早期的孔孟经典,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经典出版的兴起,再到宋明理学,清代八股取士,儒家经典及其注释文献出版如火如荼。该类图书内容涵盖范围从儒学经典到对儒学经典书籍的校注与解释。

儒学是我国封建时期的治国之本。儒家历来强调以德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以文制武。受其影响,科举考试虽然文武并举,但二者的地位与作用却无法相提并论。宋明之后,无论在国家的军事制度还是社会心理和职业选择上,武官都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宋明以后,关于军事技术的书籍很少出版,除民间武术之书流行之外,没有形成完整的军事理论

和军事著作。即使是武举取士,考试内容也渗透了儒学精神。

儒家文化的人文性特征,决定了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形成了重视人文政务,轻视物理自然,抑制生产技艺的价值取向。因此,图书出版方面,那些与人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科学书籍出版数量少,甚至逐渐消失。宋元时期,算学、天文、医学还偶尔被列入考试科目,到了明代,这些自然科学科目陆续退出科举舞台,直接导致出版市场这类书籍的日渐衰退。

科举考试的内容也直接影响了其它图书类型的出版。如科举考试要求考生还应掌握相当的文学和史学知识,代之而起的是诗文、辞赋、历史等相关内容的图书的出版。如唐代首创进士科,提倡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集的发展和繁荣;清末开始重视武备,据现有策略和对策完整的殿试卷资料显示,在110多次科举考试中,策问有关军事的近30次,约占1/4,^[1]相关内容的书籍也随之增多。科举考试的内容直接促进了市场图书内容变化,科举制带动了社会编书、写书的热情,推动了诗词散文、传奇小说等新型图书内容的出现。

(二) 科举制决定图书出版的数量与类型

科举取士推动了国家教育的发展,为图书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图书出版。唐代时政府大力兴办教育,设置各类官学机构,并对校舍进行增加与扩建、扩大招生数量,官学发展迅速,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书学、算学和律学,学生最多时达8000人。^[2]同时,社会对于科举取士的重视刺激了民间教育的发展。民间私塾数量增加,书院产生并发展。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产生大量图书需求,传统的手抄方式费时费力,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图书复印方法和复印技术。在唐代提倡诗赋取士,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促使很多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作品成册献给当时的权贵,期望得到推荐以获得知名度。这些社会需求是推动图书出版数量激增的内在动力。

科举使读书的人数增加,市场对图书数量需求扩大,推动图书出版数量增长。《太平广记》中记录了天宝年间李娃在长安“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捡而市之,计费百金,

尽载以归”^[3],反映了当时所出版图书的数量之多。科举带动购买书籍人数增加,师生群体、文人学士、备考的生徒成为书坊的主要读者对象,书肆也随之增多,必然影响到图书出版数量。

科举考试的专业性决定了图书出版类型与范围。包括小学、字书、韵书、字帖等童蒙读物;考试所需的模拟试题和辅导用书,如《场屋文字》《时文》《兔园册府》等^[4];儒家经典教材,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五经》;文史选集,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文学读物,如唐代的科举士子创造出的足以“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文言小说^[5];科举时文选本也是备考所需重要书籍。除掌握必读之书,考试还应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如宋代的策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经学、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古今治道、天道人极、当世急务、礼乐刑政、史学、刑罚、吏治、民生、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等,^[6]带动图书出版种类增加。

但是,科举制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自然科学类图书的出版,导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科举制限制了图书出版的内容,侧重于文学、史学等考试内容的图书广受青睐,技术性、应用性的图书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尽管科考中存在技术或应用性科目,但这些科目的考试与做官和入仕的关系并不大,容易造成图书出版发展不平衡。

二、科举制制约了我国古代图书印刷与发行

(一) 科举制对图书出版机构的影响

以科举考试对图书的需求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官刻和私刻机构,推动刻书机构的发展与演变。

对于官刻来说,考试和教育提供刻书需求,读书活动增加为其输送了人才,推动官方刻书机构功能的完善。儒家经典和科举官方教材的刻印是官刻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如宋代的国子监,刻书的内容极广,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经、史、医书最多,^[7]可见与科考有关书籍在刻书工作中占较大比重。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学生与应试人的数量增加,人们对这些书籍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促进官方刻书机构往多层次和系统化方向发展。

坊刻在刻书事业中占据很大的地位,书坊由民间人士出资筹办,以盈利为目的,以普通市民对服务

对象,刻书活动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定。坊刻图书数量多,种类丰富,是民间普通市民获取图书的重要来源。经史之书自是许多刻坊必刻书,科举用书逐渐从官刻走向坊刻,成为坊刻的重要盈利部分,社会用书需求扩大使坊刻机构数量增加并逐渐发展出许多大型刻坊。但也应注意到许多书坊为盈利进行书籍翻版、盗刻、假冒伪劣等,如宋时科场应用时文、应试捷径之书,是科举时代书房竞相翻刻的热门选题,但书坊广多,投机风靡,就有了违背经义、舍本逐末以迎合举子心理者^[8],不利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科举对书院刻书的发展影响深远。科举制是推动书院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书院除教学、研究之外还兼具刻书的任务,许多书院都会自行刊刻图书以配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其次,科举影响了书院数量的变化从而带动书院刻书的变化。元代时书院总数为406所^[9],到了清代书院数量就达到了4365所^[10],书院数量的增加使得书院刻书机构数量增加、规模增大。但明清时期书院官学化、科举化后,许多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必然使书院刻书发展受限,缺少发展活力。

(二) 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发行与流通的影响

科举制影响图书市场供需变化,形成了独特的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图书发行机构、发行者和图书流通市场。

隋唐时期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的结合,从图书流通角度看,这种结合意味着学校内外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加,图书流通以各级官学机构为依托,形成了一种比较可靠的渠道,这是对图书流通的一大促进。^[11]书肆、书坊利用租借和买卖等商业方式成为民间图书重要流通渠道,如清代时出现的“考市”,每逢乡试、府试,大量的书商云集考场周围,开设临时店铺,或搭建简易书棚,或就地摆放书摊,久之便形成一个繁荣的图书市场,“考市”成为当时较重要的图书发行销售渠道之一,所卖图书多为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图书及考试模拟试卷。^[12]科举带动私学的发展和兴盛,私学相当于某个地区或中心的学校,进行聚徒讲授以及学术研究活动,授课和研究必然需要大量书籍,因此出现私人讲学为平台的私学流通渠道。科举带动了投谒名流、文人之间相互赠书、借书

等书籍流通渠道的扩大,对图书流通有着间接推动作用。另外,道教书籍成为科举考试内容,带动道教图书的流通,推动图书在寺院的流通。

图书发行者利用科举考试谋利,创造和发明了科举图书发行与流通新方法。科举制带来的用书需求带动图书发行手段的变化。官方出版图书可利用行政命令进行图书推广,地方的学校和书院常得到中央通过行政部门颁发的书籍;有些图书向官学或书院的学生售卖,促进官营图书发行行业的出现和发展。科举制影响了民间书坊的图书发行的广告宣传,如邀请学术名人或中举士子做序或点评,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销售数量。但广告内容和手段的复杂性同时也带来弄虚作假、欺蒙读者的情况,书商为谋取利益利用中举的人名进行署名,使伪托名人和冒名顶替情况较多。如明清时期白话小说作者和书商利用进士、举人、山人等身份进行署名,这种现象侵害了读者利益,不利于图书市场良性发展。

科举制推动图书发行与流通的范围的扩大。科举制使贫寒子弟通过读书应试获取功名,需要用书的读者群大大扩大,准备应试的生徒遍布全国,扩大了图书流通范围,书籍不仅在城镇流通,流通范围也涉及了穷乡僻壤。科举还推动了图书的对外流通。尤其是唐代时期国家繁荣、对外开放程度高,周边地区或其他国家派遣许多学生到长安学习,其中有些学生参加唐朝科考,获得入仕资格在朝廷为官,这些人重视书籍的文化交流作用,因自身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权利,有能力将中国的书籍带往自己的国家,图书流通范围扩大境外和国外。

三、科举制对我国图书出版的潜在影响

科举制从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影响了古代藏书的发展。国家重视藏书建设,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对藏书和藏书机构进行管理与控制;社会上形成“唯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民间出现许多爱书、藏书之士;书籍作为科考不可缺少的工具,社会地位提高,加之书籍生产技术成熟、成本降低,书籍获得渠道多样化,使藏书变得容易,民间藏书数量和类型增加。藏书的发展,产生相关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以及多样化的利用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图书的管理、保存和利用。

(一) 科举制影响图书的典藏

1. 科举制度导致中国特色的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和民间藏书机构的产生,影响藏书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科举制强化了书院的藏书职能,推动书院藏书成为我国古代重要藏书机构之一。科举制带动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发展,书院作为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被创建并不断发展,大多数书院以培养国家人才为任务,教育和考试相挂钩使学生数量增加,各学派竞相开设书院,书院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书院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风传承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学习需要一定的书籍,藏书作为书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书院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书院数量的增加,书院藏书机构出现并且数量增长。

科举制培养了一大批仕宦官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私人藏书楼”,推动了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家的兴起。私人藏书不仅是一种雅趣,成为文人审美价值的体现,也是财富的象征和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科举使读书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技术的普及让书籍获取变得容易,藏书家们的藏书意识逐渐进步,原本的藏书家族对藏书更加重视,新兴的家庭家族也加入了藏书事业的大军,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13]。科举打破了世家大族的政治文化垄断,并成为世家大族继续保持社会地位和官场优势的重要途径,藏书成为家庭教育的必备工具,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家族藏书传统使藏书可世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和完善。普通官宦阶层大部分是依靠读书进入仕途,本身也是藏书家,他们重视教育,希望依靠科举壮大家族,收集书籍来教育子孙、提高社会地位,如从隋唐到清朝山西藏书家120人中有二分之一为进士,^[14]这些中小官宦也是私人藏书的重要力量。科举形成的社会氛围使读书做学问的人成为受尊重的群体,普通百姓为求取功名尽己之力进行藏书,藏书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

2. 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藏书的类型和范围,过分注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藏书,制约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藏书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科举制发展一定程度上利于促进藏书数量和藏书类型的增加。科考内容范围扩大、科目增加、录取名额增加等

因素推动了藏书数量和类型的增长;科举制推动学生数量增加,提高了读书人、教育机构的社会地位,藏书数量和类型也得到发展。书院作为授徒育才和学术研讨之所,根据实际需要收藏各类书籍以供师生所用,这些书籍不仅仅包括科考用书,其他类型书籍也得到重视。相对于个人来说,书院获得书籍的途径更加多样、来源更广、数量更大,朝廷赏赐、民众捐赠、自行刊印和购置,以及向私人藏书家购求等方式极大丰富了书院的典藏。

同时,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藏书数量和类型。这一点对书院藏书的影响尤为明显。宋元之后,书院许多民办书院改为官办书院,官学化程度逐渐加深,受官府的控制严重。官府办学目的为分科取士,书院逐渐沦为只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机构,政府为进行思想控制而鼓励藏书,尤其到明清科举考试推行八股文,学习内容狭窄,禁锢考生的思想,导致学术僵化,缺少深入、扎实的学问研究。清代各级州、府、县、宗祠,凡有实力的都办书院,普及教育。原本书院在文化学术上,具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但在书院纳入政府的科举教育以后,便成了苍蝇竞血的地方,毫无朝气蓬勃的学术风气了。^[15]这种学术氛围和社会风气对书院藏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书院藏书发展活力不足,政府为进行思想控制而鼓励藏书,所藏之书主要围绕科举考试,使得藏书类型产生变化。

3. 科举制影响了对藏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科举带来图书借阅和使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书机构图书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分类体系的发展。科举制带动教育发展,士人阶层人数增加,社会用书需求扩大,一些无力购买书籍的学生需要到相应的藏书机构借书,一些私人藏书家也对一些读书人开放藏书,借阅需求的扩大促使图书借阅制度和流通制度完善与发展,如《宋会要稿·崇儒》中记录了当时馆阁书库借书情况,建议将“借本书库原书籍添入经史子集,书数备足及准备阅监”,这些相应的流通规定和处罚条文用以保证借出的图书得以归还。此外,随着藏书规模的扩大,为更好实现图书管理和借阅,需要对图书进行合理、详尽地分类,分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必然,在没有统一分类体系

标准的情况下,官府藏书机构以及各书院不断探索新的分类方法以适应书籍管理需要,私人藏书家也建立了自己的分类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二) 科举制影响图书的利用

1. 科举制推动图书编目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发展。在理论方面,目录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考试内容之一,使目录学相关知识在社会上得到关注并得到普及,目录学理论的传播日渐深入,使目录学成为一门显学,有利于培养出目录学人才。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考据学家凭借自身的扎实经史功底,登科高中,进入礼部和翰林院这两大部门^[16]。在目录学被应用到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又相应产生新的目录学理论和思想。

在实践工作方面,科举使藏书工作受到重视。对于大型官修目录来说,科举制还提供了许多编目人才,如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邵晋涵、擅长金石目录学的孙星衍等人都是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的。民间许多藏书家和书坊、书肆对其拥有的图书进行编目整理,民间的私修书目得以发展,从而推动新的目录形式、叙录体例和编目方法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实践成果,有利于目录学的长远发展。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目录学得到继承和创新,编目工作不断完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2. 科举制推动图书的整理与编修。对于官修机构来说,一方面,为保证学术正统和科举考试质量,官方修书机构需要颁布教材用书,势必要对相关用书进行注疏和编修,这些书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如明代翰林院编撰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孟子节文》等经书,以及《圣学心法》、《性理大全》等子书。另一方面,科举为大型类书的整理和编修提供了人才保证。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振兴了教育,士人阶层的扩大,为国家培养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人才。而大型类书的编修工作需要大量人才,覆盖范围从负责编修活动的学士、主事、顾问到民间征集的整理、抄写、校对人员,如《永乐大典》保存了明代以前有关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史哲、宗教等各方面的资料,编修时为保证内容质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两千多人编修此书。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为

大型图书的系统性编撰和修订提供了人才条件。

科举制度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影响,自然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和图书文化的发展,在研究古代图书事业发展时不能也不应忽略这一重要因素。在研究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时,不能只看到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更应以史为鉴,从这些得与失得到启示和思考,以促进当今时代图书出版、图书馆管理、图书利用等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和

参考文献:

- [1] 邓洪波,王胜军.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
- [2][8] 吴永贵,李明杰主编.中国出版史:上册·古代卷[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104,368.
- [3] 李昉.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八十四.杂传记一.李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1.39,85.
- [4] 张雨晗.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影响[J].中国出版,2011,(16).
- [5] 鱼钢.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J].中华文史论丛,2009,(02).
- [6] 刘海峰,张亚群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27.
- [7]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48.
- [9]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39.
- [10]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405.
- [11]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4.
- [12] 孙文杰.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论略[J].图书与情报,2012,(06).
- [13] 车凯龙,任伟.从我国图书流通方式的变迁看我国图书流通业的发展[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3,(01).
- [14] 王欣欣.山西进士与藏书[J].晋阳学刊,2005,(02).
- [15] 桑良至.中国藏书文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82.
- [16] 冯建民,赵静.清代目录学兴盛原因新探——以科举考试为视角[J].教育与考试,2015(02).

(责任编辑:王伟宜)

燕京大学学生学业评价的特点及其启示*

靳培培

摘要:注重学生日常学业评价、高标准的学业要求与淘汰制相结合、凸显教师在学业评价中的自主性、以能力评价为导向,是燕京大学学生学业评价的重要特征。此特征与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及“质量至上”的精英教育理念相一致。燕京大学的学业评价理念、学业评价方式和经验,为当前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燕京大学;教会大学;学业评价;考试

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实践中,燕京大学致力于构建科学且完善的学生学业评价制度。教师在学生学业评价中表现出极大的自主性与责任感,注重学生日常学业评价,建立全程学业质量监控机制,凸显学业评价的严格性与以人为本的评价理念,对于燕京大学在办学33年中取得斐然的办学成效功不可没。反观当前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完善的学生学业评价制度的缺失已成为增强大学教育教学效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瓶颈,许多大学以期末考试作为学业评价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方式,学业评价中的管理色彩浓厚,而促进学生学业发展的意识淡薄,大量教师也将学生学业评价视为期末考试而进行符合学校考试制度的“例行公事”,缺乏洞察学生日常学业发展状况及促进学生学业发展的积极性与责任感。本文以燕京大学的学生学业评价为例,探究其学业评价的特点与启示,为当前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提供经验与启示。

一、注重学生日常学业评价,构建全程性学业评价机制

注重学生平时学业水平的考核与评价、对学生

学业进行全程性质量监控,是燕京大学造就卓越人才的重要举措。燕京大学不仅通过严格的招生录取制度以保证入学新生的整体质量,更加重视在修业过程对学生学业质量的持续监控和评价。

(一) 新生入学试读生制度

燕京大学通过严格的招生考试,招收符合学校标准的合格新生入校就读,但刚入学的新生只能作为试读生进行一年的试读,考核成绩过关才能成为学校正式学生继续留在学校继续学业。《燕京大学文理科简章》(1928-1929)中规定,新生入学后,其第一学期为试读期,学期终试验成绩不及格者,得令退学。后来,学校将新生试读的期限从一学期改为一学年,1937年规定,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为试读期,如果成绩不及格,学校可随时令其退学。

(二) 基于学业水平的升级制度

早在1920年,燕京大学就对学生升级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定。例如,1920年《燕京大学章程》以单个(unit)和功次作为衡量学生学业的两个指标,“单个”表示学生学业的量,“攻次”代表学生学业程度的优劣。学生只有修够每学年规定的学分单个数才能

作者简介:靳培培,女,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郑州450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郑州大学2016年优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7/51099269)的阶段性成果。

升入相应的年级。同时,依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允许成绩优秀者多修学分。“学生在第一、第二年级,每学期应修18单个;在第三、第四年级,应修16单个。但如果前学年或前学期成绩在5.8以上者,每学期可多修1学分,前学年成绩在7.0以上者,每学期可多修2学分。”^[1]学校对学生学业进行统一要求的同时,还注意到不同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并为其提供弹性的学业发展空间。

1934年之后,燕京大学对学生编级、升级的规定更加详细。根据学生所修学分数将学生编入相应的年级,不但设有一般的一年级生、二年级生、三年级生和四年级生,还在两个年级之间加设各年级附级生,根据学生已修学分数的多少将学生编入7个不同层次的年级,体现出学分编级制度的严格性与人本化两大特点。学生修毕一定的学分数,但未达到升为高一年级正式生的学分要求,只能被编为高一年的附级生,代表学生的学分完成数处于留级与升级之间的水平,必须经过更加勤奋地学习才能转为所升年级的正式生。为了使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要过分延长学习年限,学校还采取了如下两项措施:一是将毕业论文的写作规定为二至6个学分,学生可以利用这一伸缩性的安排来补足不及格的学分;二是利用暑期为补课学生开设暑期课程(不需要补课的学生也可以选读)。^[2]学校对学生每学年和每学期学分数目的进展做出统一规定,同时为没有达到学分要求的学生提供补足的方法。

(三)注重日常学业考核

燕京大学将学生日常上课表现、班级平时测验和学期考试作为核算学生学业成绩的三个主要依据。在学校统一要求的制度性规定层面,燕京大学的学业考试制度主要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等。学生在大四一年或半年需要撰写一篇毕业论文,理学院除了要求学生提交毕业论文之外,还要进行四年的主科统一考试,以考核学生在整个修业期间对主要课程的掌握程度。

教师在学生日常学业评价中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以教师为评价主体的日常测验是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每一阶段学业学习状况的重要考核方式。教师在遵守学校学业考评制度的基础上,依据具体课程

的性质与特点,自主设计多样化的学业评价方案,主要方式有短期小考、课前小测验(quiz)、书面报告、小作业、口头问答等。

二、制定高标准的学业要求,实行贯穿于修业过程的淘汰制度

高标准的学业要求与淘汰制度的结合促使学生自觉重视学业发展,养成勤学上进的学习态度,是燕京大学促进学生学业,提高学生学业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

(一)符合学业标准方可转为正式生的试读制度

前文提到的试读生制度是燕京大学新生入学后面临的具有淘汰性质的第一次学业考核,在经历严格的招生录取后仍然需要努力学习,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厄运,获得正式生的就读资格,防止了学生成为新生之后产生漠视学业发展与学业倦怠的态度。

(二)达到中等及以上学业水平方可继续就读及毕业的退学制度

燕京大学规定,学生通过试读考核成为学校正式生之后,每一学年都要参加中期末和期末考试,依据学校制定的学业成绩核算标准,不合格者令其退学。燕京大学办学初期,学校规定学生总平均成绩不及格者应退学。后来该规定更加严格,及格水平并不能作为继续留校修读学业和毕业的条件,必须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才能继续就读及毕业。1934年之后,燕京大学从最初的5分制变为更为严格的10分制,将学生的学业成绩分为十一等级。学生平均成绩的计算方法是,将学生各门课程的等级乘以相应学分数,所得乘积作为该门课程的绩点,再将所有课程取得绩点的总数除以课程学分的总数,其结果即是学生的平均成绩。根据这种计算方式,可得出学生的学期平均成绩、学年平均成绩和累积平均成绩,学生的平均成绩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学业考评的重要依据,譬如,学校规定,学生成绩在“三”或“三”以上者才可获得学分,全年平均成绩为“五”以上者方为及格;若平均成绩不足“四.二”绩点者,或连续有两年平均成绩不足“五”者,必须退学^[3]。以上规定说明,学生成绩在60分以上才算及格可以获得学分,但是及格水平并不能作为继续留校修读学业和毕业的条件,若平均成绩连续两年达到不到70分就必须退学。

1937年以后,燕京大学在学业成绩考评中增加了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文字性描述,对其进行质性评价。燕京大学对学生学业考试成绩的评定具有很详细的等级系统,并对各个等级的成绩进行学业优劣程度的描述,学业成绩采取为0到10的10分制,在层次上分为11个等级,对应的成绩描述分别为成绩低劣毫无可取、微有成绩但不及格、成绩质量方面可疑应予复试或补足、本课及格仅予学分、成绩平庸不与准其毕业、成绩较平均水平略低、成绩较平均成绩略高、成绩良好、成绩甚佳、成绩优异和成绩卓越。^[4]淘汰制度的实行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态度,燕大校友王佩玉回忆,“入学不久,我就听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不及格的,就得‘挨刷’,思想压力很大。期中考试后,确实有些新同学不见了!‘淘汰制’何只是针对新生啊!无论新老同学,都是课堂上全神听课、答问、记笔记,课下忙于预习、复习。图书馆里,阅览参考资料者白天多,晚上更多。宿舍里,尽管准时熄灯,而坚持继续学习‘开夜车’者不少!”^[5]

三、教师重视学生学业发展,凸显学业评价中的教师主体性

燕京大学除了在学校层面对学生学业评价进行制度性规定,还极其重视给予教师充分的教学自由,鼓励教师充分发挥其在学业评价中的主体性作用。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表现出极强的育人意识和职业责任感,自主采用灵活且多样的学业评价方式,促进学生学业的发展,与学校层面的制度性规定相得益彰。

(一)自主设计多样化的评价方式

燕京大学教学活动中,日常化的平时测验是教师及时了解和考核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上文提到的短期小考、课前临时测验(quiz)、书面报告、小作业、口头问答等。燕京大学校友梁植权回忆说:“在燕大读书时,功课是很紧的,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门主课的小考。”^[6]校友阎隆飞回忆说:“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他(张子高)第二次上课时总要用几分钟进行一次小考,发给每人一张小纸条,出一个问题叫学生笔答,这样使学生对上次讲的内容印象更深刻。”^[7]燕京大学校友回忆说:“课堂上经常举行Quiz(小测验)。上课后,发给每人一张白纸,在黑板上出几道测验题,让学生在10分钟后交卷。

然后打分给学生。这种做法很好,我在以后教学中也经常学习这种方法来了解检查学生打分子学习情况,效果是好的。”^[8]燕大校友胡亚美回忆说:“尤其不能忘记化学老师张子高先生,他每次讲课前都先进行10分钟的测验,以促进学生的自学能力,那一张张测验用的小纸片无不凝结着老师的心血”。^[9]

(二)深入了解和考评学生学业状况

燕京大学十分强调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教师经常和学生一起参加活动,邀请学生到家里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和记录学生学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身心发展的状况。比如,燕大校友卢乐山在回忆录中说:“雷洁琼就是我们班的导师。雷洁琼走了,快毕业时,由谢冰心负责。雷洁琼对每个学生选课都个别谈话,对每个学生都了解。”^[10]冰心在《当教师的快乐》中也提到她和学生在自由的交流中进行学业的考查、评价与指导,她在教授燕大本科一年级国文课时,要求学生以自传为作文题目,以此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看到学生作文,对每个学生进行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交互交流思想和看法。同时,冰心非常注重通过频繁的课外接触来了解学生的发展,如常常在未名湖划船或在湖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是对学生作个别谈话等等^[11]。曾任职于燕大的钱穆也曾说道:“燕大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多。北大最少,师生间仅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清华又居两校间,此亦东西文化相异一象征也。”^[12]

四、反对知识的机械记诵,重视学业评价的能力导向

燕京大学借鉴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极力反对偏重知识记诵的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注重对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评价。

(一)精心设计和分配学习任务,注重学生独立学习能力评价

燕京大学对学生学业的考核并不仅限于教科书,很少直接呈现教科书内容,通过布置课外学习任务考核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燕大校友冯传汉也回忆说:“当时自然科学总的水平燕京不如清华,但燕京在自然科学教学方面是有其特点的,总起来说,则

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与严肃认真、勤奋负责的科学精神。”^[13]燕大校友侯仁之回忆道：“在课堂教学中，煨莲师的独出心裁相严格要求，更使我深受教益。例如我还在二年级的时候，从他学习‘初级史学方法’一课，主要内容之一是科学论文写作的训练，他的要求十分具体，例如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写成论文。课堂讲授时间只用了半个学期。然后分配给每一位学生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分门别类写成卡片，进行研究整理，写成学期论文，作为学习成绩。”^[14]

（二）实行严格的学生实习制度，重视学生实践能力评价

制定和实施学生实习制度，培养和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是燕京大学评价学生学业的重要内容。以新闻系为例，梁士纯上任后，再次加强并严格了有关学生实习的规定，在学系的“学则”中规定：“本系课程理论与实习并重。实习共有三方面：一、本学系之刊物；二、报纸杂志之投稿；三、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凡修满本学系课程四十四学分，而其毕业时总平均成绩在六·二以上；且读满本大学文学院规定之学分一百五十学分以上；并在报界或其他有关系之事业服务至少一年且有优良之成绩者，除由本大学照章发给毕业证书外，并由本学系发给甲种职业证书，证明该生之新闻学识及实习经验。”^[15]

（三）学业考试答案“不拘一格”，重视学生创新能力评价

从燕京大学学业评价的内容与方式来看，大多反对学生对教科书知识的机械记忆，而主要通过精心设计的考试内容，并不设定唯一答案，鼓励学生自由发挥，依据学生回答问题的逻辑性、科学性、独创性等给予分数或评语。例如，燕大校友金建中在上大一物理时，所得成绩是满分。这在燕京大学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他不仅物理得“10”（十分制中最高分），而且生物学得了“9”。医预系学生都传说系主任博爱理女士(Miss Alice Boring)认为学生的最好成绩只能到“8”，只有上帝才能得“10”。为什么金建中

能够得“10”呢？据说有几个原因：一是他独自推导出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学公式，他曾查阅过文献，没有见过前人发表过类似的文章，更没有见于通用的教材。经过教师审查认为，公式推导合理，结论正确，意义重大。^[16]再如，燕大校友潘国宗曾回忆说：“回忆燕京对我的教育，有两方面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一是燕京注重科学思维和智能的培养。记得一次生物课考试，虽然我有的题答错了，可是老师还给了我高分，系主任博爱理老师在考卷上批了‘Original arrangement very good’的评语。她说：‘这主要是看答题的方法对不对，是否有系统性和科学性，至于知识了解多少是第二位的’。”^[17]

五、启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主题词，而学生的学业水平是体现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与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虽然人才观、知识观和质量观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促进学生学业发展，提高学生学业水平是大学发挥其人才培养基本职能的永恒使命与追求。反思历史，燕京大学注重平时、重视能力、关注学生个体、严格质量监控的学业评价理念与方式，为当前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留下诸多有价值的经验与启示。

（一）关注学生学业的日常考核，构建全程学业评价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对学生学业的评价主要依赖于学校统一规定的期末考试以及任课教师的个人主动性，没有制度性规定的日常测试或月考等考核方式，导致学生学习倦怠，而在临近期末考试时进行突击性复习，由此而形成的学业质量与学业水平可想而知。燕京大学不仅通过严格的招生录取制度来保证入学新生质量，更加注重以频繁且严格的学业评价来监控和考核学生在修业期间的学业水平，这种贯穿于整个修业过程的学业评价能够使师生及时发现教学问题，调整教学策略，激励学生在修业期间持续性地努力学习，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鉴于此，淡化学业评价单纯服务于教学管理的意识，强化学业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关注学生日常学业发展与评价，构建基于日常学业评价的学业评价制度，

是当前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的重要路径。

(二) 加强教师职业责任意识, 提高教师学业评价素养

学校对学生学业评价的制度性规定是教师进行学生学业评价的基础, 但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和人才培养活动的直接实践者, 在学业评价中具有更重要的责任与作用。一些大学教师缺乏职业责任意识, 学业评价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明显不足, 同时, 由于自身学业评价技能与素养的低下, 教师在学业评价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角色责任与素养的缺失使教师对作为学业评价主要手段的学业考试也持敷衍了事的态度, 仅视其为“例行公事”, 完成向学校报送学生考试成绩的要求, 没有将评价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过程和环节来进行, 更是很少想过采用诸如学生自我评价、开卷考试、口试、小论文、答辩、社会实践等形式, 使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指标多元化和评价方式多元化^[18]。燕京大学切实践行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 教师在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表现出极强的职业责任感, 以为社会输送卓越的人才为最大荣誉, 依据课程性质与特点, 制定相应的学业评价方案, 专注于学生学业水平的持续提高。为此, 当前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应该采取系列措施加强教师的职业责任意识, 填补教师在学生学业评价中的角色缺失, 同时, 提高教师学业评价技能与素养, 保证学业评价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三) 改革学业评价内容, 加强学业评价的能力导向

燕京大学自办学之始, 就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偏重培养和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机械记忆, 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极为欠缺。燕京大学冲破了传统教育局限, 借鉴西方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 采用多样化的学业评价方式, 注重学生各种能力的养成与考核, 这也正是燕京大学在33年的办学历程中, 能够为社会培养一大批卓越人才, 获得斐然办学成效的重要法宝。以此为鉴, 当前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应该构建能力为主导的评价模式, 发挥学业评价的能力导向功能, 进而引导大学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 这是我国大学构建科学学生学业评价制度、提高学生整体学业水

平、有效推行素质教育的改革突破口与必然选择。

(四) 增强师生交流, 深入了解和评价学生学业发展水平

燕京大学倡导教师深入学生学习与生活, 关注和指导学生成长与发展, 教师通过组织师生集体讨论会、课外活动、单独约谈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 甚至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 这是燕京大学学生学业评价的重要特点, 也是中国近代众多国立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未能践行的优秀传统。当今, 我国大学师生交流仅限于短暂的课堂教学, 对课外的交流、指导与评价态度淡漠, 部分大学实行本科导师制用以解决这一问题, 但由于师生主动性不足与制度保障缺失而流于形式。鉴于此, 大学应该从理念宣传与制度构建两方面激励教师在学业评价中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意识, 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在交流中对洞察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 并对其进行非制度性评价。

(五) 提高学业评价标准, 实行淘汰制度

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是燕京大学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和提高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手段, 是切实践行“质量至上”办学理念的重要制度保障。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当前我国许多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并没有实行淘汰制度, 或者制定极低的淘汰率而使淘汰制度流于形式, 同时, 淘汰制度的缺失或淘汰率的偏低必然与低水平的学生学业标准相呼应, 严重影响了学业评价的权威性及其受重视度。为此, 在我国大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过程中, 尤其是部分研究型大学与高水平大学必须勇于突破传统文化障碍, 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 以保障学生学业的整体水平。需要注意的是, 淘汰制的实行一方面要制定与学校定位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学业标准, 保证淘汰制度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 淘汰制度贯穿于学生学业评价的整个过程, 对学生修业全过程的学业水平进行持续地监控、评定与淘汰。从国际上看, 淘汰制度一直是大学激励学生学习, 端正学生学习态度, 构建人才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手段,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燕京大学本科教育通则(1937)[Z].国家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藏.
- [2]郑林庄.燕京大学的学分制和选课制[A].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02-503.
- [3]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4)[Z].国家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藏.
- [4]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41)[Z].国家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藏.
- [5]王佩玉.燕京·光采[A].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92.
- [6][7][9][12][14][16] 燕京研究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1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1,81,86,219,2,79.
- [8]李欧.忆燕大数学系[A].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燕大

文史资料(第6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0.

- [10]燕京大学校友会,燕大校史筹备组.燕京大学史料选编(第2期)[Z].北京:燕京大学校友会,1996.8.
- [11]冰心.当教师的快乐[A].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6-177.
- [13]戴樾,冯传汉.教授深情话预医[A].燕大文史资料(第8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4.153.
- [15]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课程一览[C].北平:燕京大学,1936.2.
- [17]燕京研究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2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77.
- [18]田建荣,王楠.信息化时代高校学业评价的偏误与对策[J].教育与考试,2011(6).

(责任编辑:郑芳)

(上接第38页)

尚有举人、贡生、贡院、试馆、宾兴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地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他提出了以台湾科举制度研究为主题申请国家课题,海峡两岸专家学者与进士后裔共同参与,争取出版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以便更好的持续的深化和拓展台湾科举制度研究。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吴志友馆长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台湾科举制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一定的机构,研究者也不能只局限在大学中的专家学者。今后科举文化的研究需要带领、带动进士的后人,通过整合众筹的力量来进行。建议以成功大学、孔庙国子监或者台联等机构主导编制研究计划,向国家申请课题经费,由进士后人、专家学者及其他人士广泛参与,将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以及普及性方面推进。在研究内容的拓展方面,他提出科举制度的研究不能在殿试终结,殿试后的诣孔庙行释菜礼、释褐、拜祭酒司业、簪花以及国子监立碑题名等活动都应该纳入研究中。台湾师范大学林保淳教授认为台湾科举文化是闽台文化的组成部分,要从阐释中国科举文化的内涵出发,扭转社会对科举制度的片面认识。在研究内容拓展方面,他认为进士、举人、贡生等构成中

国古代的士绅阶层,在社会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因此研究不能局限于进士,也应该关注下第举人、贡生乃至生员的活动。针对展览,他希望做一个更加全面的、生活化的展览,要积极创新表现形式,突出故事性和趣味性以便吸引年轻人。闽南师范大学林晓峰书记认为科举制度在台湾,展示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在台湾的发展,虽然首先要进行学术研究,但同时必须要把研究成果应用起来,使更多两岸青少年了解科举制度,进而认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

科举制度在台湾暨台湾进士后裔与专家座谈会系列活动已经在台南(2013年)、厦门(2017年)成功举办两届,并于2016年在金门举办了科举制度在金门学术研讨会暨金门历代进士文物展,相继走入高雄、重庆等两岸城市,台湾辅仁大学、淡江大学、成功大学、金门大学等高校进行巡展,在两岸学术界和民间的引起了强烈反响。未来将会走进更多的两岸城市与高校,充分展现科举制度、科第人物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以及对台湾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王伟宜)

OBE视角下高等工程教育学业考试评价改革探究*

刘 磊

摘 要: 学业考试改革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OBE工程教育模式的持续研究与探索,高等工科教育的课程考核方式也应有系统性的变革。OBE理念下的高等工程教育学业考试应以检验学生能力提升为考试目标,依据“以生为本”的理念强化考试设计,以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促进考后反馈与持续改进。探索全过程、多元化的OBE课程考核模式的策略及制度保障,对高等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OBE; 学业考试; 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 课程目标达成度

2016年我国正式成为“华盛顿协议”成员国,这标志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与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先进理念和质量标准接轨,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工科专业的教学改革。众多工科高校以“华盛顿协议”工程教育标准认证体系所认可的“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Outcomes-Based Education, 缩写为OBE)为指导理念,展开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机制等一系列改革。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学业考试对教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探索基于OBE工程教育理念的学业考试与评价模式,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工程教育学业考试改革缘起

OBE教育模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而后形成了完整的OBE教育理论体系引入高等工程教育领域,并由

此延伸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要标准,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广泛重视和应用。OBE以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为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强调教学过程的反向设计、以学生中心和持续改进,有学者概括了其与传统教育对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如,成果决定而不是进程决定、扩大机会而不是限制机会、成果为准而不是证书为准、包容性成功而不是分等成功、达成性评价而不是比较性评价等,^[1]可以说,OBE模式为高等工程教育提供了范式革新,被认为是追求卓越教育的正确方向。

评估学习产出是OBE教育模式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从本质上讲,OBE教育模式就是围绕“定义预期学习产出-实现预期学习产出-评估学习产出”这条主线而展开,学生产出评估构成了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闭环。^[2]而评估学习产出的任务中有很大部分将由学业考试来承担。OBE所谓的学习产出,重点

作者简介:刘磊,女,辽宁葫芦岛人,燕山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教学管理(秦皇岛066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阻力因素与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B17JY040)、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6年工程教育专项课题“《华盛顿协议》视域下高校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难点探析”(项目编号:2016GCZD09)的研究成果。

在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成效,在于学习结束后学生真正获得的能力提升。没有科学、有效地评价体系,很难检验预期的学习成果是否达成。如沿用传统的学业考试方式重点考查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即学生知道什么,而OBE所看重的知识习得之外的能力提升难以检验。因此如何改革学业考试,使其合理地对学习产出进行客观评价,并涵盖课程的所有学习成果,充分体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个性化成长和多样化发展,对OBE工程教育模式教学改革及持续改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OBE工程教育模式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工程教育学业考试改革策略

OBE理念下的工程教育学业考试的目的是通过设计与安排,在客观地测试出学生对传授内容掌握程度的基础上检验学生的能力提升,在既定、统一的培养目标达成的基础上体现学生的个性发展,这就要求教师精心设计学业考试方式和内容,将学生的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探索全过程、多元化的“学习产出”课程考核模式。

(一)依据检验能力提升需要确定学业考试方式

OBE强调由培养目标出发反向设计教学,这就要求课程考核能够充分体现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成果,体现个性化成长和多样化发展,提高学生解决开放式问题的能力。因此需设计全过程、多元化的考核环节,体现学生的多种能力提升。以某高校2016年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某专业课为例,该课程支撑专业毕业能力中的两项目标:“具有扎实的机械工程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知识,并能将其用于解决材料成型实际问题”和“具有综合运用学科理论和技术手段分析并解决材料成型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将课程目标细化分解为培养学生16个方面的能力,其课程考核包括6个部分,分别为出勤、作业、讨论课、项目、实验和结课考试,各环节所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分别为5%、5%、5%、10%、10%和60%。其课程目标及考评方式对应情况见表1。为全面客观的检验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该课程贯彻了全过程监控的理念进行学业考试与评价,将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由传统的终结性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

表1 某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某专业课课程目标与考评方式对应表

序号	能力	考评方式
1	锻造工艺的现状、前沿及发展趋势	结课考试
2	使学生了解锻造常用材料	结课考试
3	使学生能够理解加热规范,认识加热过程中常见缺陷及其产生机理和避免方法;了解锻件冷却和热处理方法	结课考试
4	使学生了解大锻件生产工艺	结课考试、讨论课
5	了解锻造生产中的相关标准	结课考试、讨论课
6	正确认识锻造生产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结课考试、讨论课
7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调研的基本方法	讨论课、三级项目
8	掌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讨论课、三级项目
9	使学生初步掌握自由锻工艺和锤上模锻工艺的制订及相关模具的设计方法	讨论课、三级项目
10	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知识进行实际锻件锻造工艺的制定	讨论课、三级项目
11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平时作业、结课考试、讨论课、三级项目
12	学生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讨论课、三级项目
13	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平时作业、讨论课、三级项目、实验
14	使学生初步具备进行实验的能力	实验
15	使学生初步具备实验数据分析和解释的能力	实验
16	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计算机三维建模能力	三级项目

数据来源:该大学教学存档资料整理而成。

与传统学业考试中“一卷定胜负”的模式不同,OBE理念下的工程教育教学考试需要将体现学生能力提升的所有教学环节纳入考评体系,进行形式多样的全过程考核,充分发挥各种考核形式的长处,达到最佳化的考核效果。正如泰勒等“进步主义”教育学家们所提出的:仅以课程或学业结束时的考试作为测评学生的依据不科学,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应以过程性的观察为主来进行评价,并且在评价中不断指导学生,校正学习方向和方法,已求达到学

习的目标。^[3]过程性评价主要优势有:一能“以考促学”,有利于促使学生抓紧平时的时间学习,减轻期末“考前突击”的压力;二有利于教师了解教学效果,诊断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调整;三是有利于在学生中形成以能力为主的学习导向,切实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依据“以生为本”的理念强化考试设计

OBE“以生为本”,强调人人都能成功。所有学生都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功,但不一定同时或采用相同方法。而且,成功是成功之母,即成功学习会促进更成功的学习。^[4]因而相较于传统的比较性评价,达成性评价更适用于OBE理念下的工程教育学业考试。在OBE工程教育模式中,由于存在“毕业要求”这样一个相对客观、稳定的“标准”,所以在对课程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时,应该严格按照依据毕业要求分解的教学目标进行解释。这样的考评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通过考评了解自己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而且削弱了学生之间的竞争性,有利于培养学习基础不同的各类学生的自主性、计划性和自信心,尤其是在需要协同合作的教学环节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在操作层面,工程教育领域涉及大量的实验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环节,但这些课程或环节的评价相比于笔试试卷的评价复杂一些,而对这些课程或环节的评价是认定毕业要求是否达成的基础,也是持续改进的依据,因而又显得十分重要。因而需要教师及教学团队强化考前设计,依照教学目标针对考核项目科学地编制各项考核方式的评分标准,例如,如表2是上述课程中讨论课的评分标准。量表可以让教师在进行评价是有据可循,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准确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对教学进行及时修正。

类似的评分标准也适用于闭卷考试中的主观题和开卷考试等。OBE强调能力本位和知识整合,因此在考评过程中,除了必要的基础性内容外,应减少以再现书本知识为主的考试内容,并在内容中增加与工程实例相关的试题,使学生从“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使学生从书本走到现实。题目的设计应能够给学生提供探索的机会和可能,加强学生对知识

表2 某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某专业课讨论课评分标准

能力	考察点	占比 %	优 5	良 4	中 3	差 2-0
掌握锻造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并能应用材料学、力学及金属塑性成形原理的芝士对锻造过程中坯料与工(模)具的受力及变形状态进行表述和解释	参考资料参阅;问题的归纳总结	30	参考文献5篇及以上,相关度高;问题归纳总结恰当	参考文献4篇及以上,相关度较高;问题归纳总结恰当	参考文献3篇及以上,相关度一般;对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参考文献不足3篇,相关度一般;未进行归纳总结
能够就锻造工艺问题进行陈述发言,清晰表达研究或设计的具体思想、思路、方案、所彩玉的措施和效果等,并能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PPT讲解 提问交流	40 30	陈述的逻辑性强;问题表达清晰;结论准确适当	陈述的逻辑性较强;问题表达清晰;结论适当	陈述的逻辑尚可;问题表达基本清晰;结论基本适当	陈述的逻辑性不足;问题表达不够清晰;结论不当或没有结论
			回答问题正确;能够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正确;基本能够说服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基本正确;基本能够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回答问题不够正确;无法说服对方的观点

数据来源:该大学教学存档资料整理而成。

的理解、注重学生思维的考察,特别是对创造性思维的考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分析、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以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促进考后反馈与持续改进

课程考核分析报告(试卷分析报告)或是高校比较常见的教学文件,是教师在考试后对考试的指导思想、难易度、区分度、学生成绩等进行客观评价的环节,教师可以据此掌握学生学习效果,分析试卷的合理性,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但是,目前很多高校并不重视考后反馈与持续改进,考核分析报告形式化现象较为严重,要么沦为无人问津的存档材料,要么是为了应对校方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检查临时拼凑,对日后的改革鲜有作用。

OBE理念下的工程教育认证以课程的考核材料作为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及评估学习产出的依据,并建立一种具有“评价-反馈-改进”反复循环特征

的持续改进机制。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促使教师重视分析试卷质量和学生成绩,评估考核内容是否符合课程目标的基本要求,是否符合学生的能力提升的要求,了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真实情况,发现教学和课程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进今后的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学生反馈机制,在考试后安排时间听取学生对教学和考试的意见,与学生平等、真诚地交流,不仅有助于教学的持续改进,也是学业考试改革走向科学化、人性化的有效措施。

三、工程教育学业考试改革的保障机制

上述基于OBE工程教育理念的学业考试模式对教师的教学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课程目标分解和课程考核方法选择,增加平时的测试和试后的反馈,制定更多的课程考核文件。这些如若仅凭借教师个人的职业道德与奉献精神势必难以长久,因此,必须加强教师及管理培训,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学业考试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才能保障学业考试改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加强教师及考试管理人员学业评价理念及技术的培训。理念更新是教育改革的先导,技术提升是教育改革的保障。一线教师是实施学业考试改革的主体,而精干的考试管理队伍,是有效发挥并不断优化考试功能的必要条件。OBE工程教育模式是我国顺应国际工程教育改革及工程教育认证发展趋势进行的探索与再创新的产物,至今不过短短几年发展历程。因此,为顺利推进OBE工程教育模式改革,高校领导和教学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教师及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学习OBE相关理论,更新教师及管理人员考试观念,将考试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把学生能力提升作为评价的主要内容,重视考试对学生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同时探索全过程、多元化的考核模式,完善考试技术,研究考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讨论提高教学质量、推进考试改革的措施,从而有效提高考试及教学质量。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优化考试管理。考试作为高校常规性工作,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考试管理制度。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考试和评价改革很难顺利推广并取得成效。推行OBE模式的考试改革,增加考试灵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

考试管理的难度,这就需要学校健全和完善考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课程考核的组织、命题、监考、阅卷、归档、反馈都应做出明确的规定,使考试管理有章可循。此外,学校还应建立考试研究激励机制,如通过教改立项的形式支持教师开展课程及专业层面的考试评价改革研究及实践探索、提高教师课程考试与评价环节的工作量绩效等,在制度层面上为OBE模式的课程考试和评价改革营造有利环境。

第三,推进考试与评价工作的二级管理。传统意义上的考试管理权掌握在学校的教务部门,有学者指出,过分细致的考试管理模式是“大一统”集权思维的典型表现,对于考试的统一规范化要求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院系自主管理考试的内在积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师虽有考试改革的想法却“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尴尬。^[5]OBE考核模式具有开放式和灵活性等特点,需要配以更具弹性的考试管理体制。这恰好符合了我国高校近年来纷纷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的大趋势。学业考试权限的适度下放,由院系自行组织与管理学业考试的部分事务,如灵活确定考核形式、开放试卷管理等,学校管理层只需在宏观层面进行协调、指导、监督等即可,这样可以缩短管理跨度,充分调动院级管理层推进考试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学校考试管理整体的质量和效率。

四、OBE工程教育学业考试改革的影响及前景

中国是工业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也是工程教育大国。据统计,2014年我国开设本、专科工科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合计2890所,本、专科专业布点数合计39593个,本、专科层次工程教育毕业生人数为2587874人,在校生规模达到9740995人,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38.2%。^[6]OBE工程教育模式和《华盛顿协议》毕业生能力要求,是国际工程教育大力推崇并践行的先进理念和权威标准,正在深刻影响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截止2014年,涉及17个工科专业类139所高校的495个专业通过参加工程教育认证,构建OBE专业教育模式。近年来共有近900余所高校4000余名教师参与培训、研讨和交流,OBE教育理念越来越广泛地被认同和实施。^[7]

学业考试改革是OBE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既是OBE学习产出的重要评估手段,也是教学活动的环节之一。OBE模式的学业考试有效抑制了传统考试“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顽疾,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考试结果反馈还可推动相关课程教学改进。我国建设工程教育强国,就需要引进国际标准,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推动更多工科高校和专业实施OBE工程教育模式及相应的学业考试模式,提升工程人才培养质量。

总之,考试和评价方法对高校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学习效果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实施OBE模式的工程教育学业考试改革,建立“以生为本”的全过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有助于促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实现从重视理论学习向重视能力培养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主体、教师主导”转变,进一步促进高等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此外,OBE工程教育模式下的高校学业考试改革不是简单

的在学业考试环节植入OBE的某个要素,而是需要学校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以全体学生对评价标准的达成为中心,进一步在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科学、有效的课程考试与评价方法,不断完善考试管理制度,以保障考试改革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 [1]李志义等.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导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
- [2]顾佩华等.基于“学习产出”(OBE)的工程教育模式——汕头大学的实践与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
- [3]美国评价学生的7项标准[N].中国科技报,2001(2).
- [4]李志义.对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之一:我们应该坚持和强化什么[J].中国大学教学,2016(11).
- [5]党亭军.从学业考试看大学考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J].考试研究,2012(1).
- [6][7]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摘要)[N].中国教育报,2016-4-8.

(责任编辑:郑芳)

从考试的导向性谈音乐教师的选拔机制

——以厦门地区小学音乐教师招聘为例

高燕真

摘要:随社会发展和对教师人才选拔的需求,如何甄别选拔真正优秀的音乐教师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通过对本地区招聘程序和面试项目的分析,从教学水平、学生学情、学校需求角度全面分析教师招聘的导向性问题,提出完善选拔、优化选拔机制的策略,做到因德而教、因特求艺、专中取全。

关键词:招聘;音乐教师;选拔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各行各业对教师职业素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对教师素质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艺术教育发展的迅猛的今天,音乐教师成为承担各区、各校艺术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具体实施者,选拔优秀的音乐人才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势在必行。

一、基本现状分析

几年来,厦门市新教师招聘工作总体上做到了规范、公平、细致。参加音乐教师招聘的考生,首先需要参加由福建省教育厅委托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的笔试,并依据招聘岗位计划数的1:3比例获得进入下一轮面试的资格。随后,参加由厦门市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综合技能测试,测试合格者进入下一轮的课堂教学(片段教学)测试。考生通过三关的综合考核,根据三次考试总分的40%、30%、30%权重进行排名,最终选择优秀音乐人才加入音乐教师队伍。

当前,音乐教师队伍需要的是综合性人才,其应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专业技能水平。从厦门地区对音乐教师招聘的面试项目的设置看,专业综合技能测试项目设定自选项目表演(30%)、指挥项目(25%)、自弹自唱(25%)、即兴弹奏(20%)四个技能专项测试考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从测试内容角度看,在自选表演项目中,综合权衡了各大院校艺术生培养的专业特点,允许考生从器乐、声乐、舞蹈三个项目中,选择自己专长的技能进行测试,其目的在于全方位了解考生的专业特长,给考生充分展示个人专业技能的平台;在测试项目二的指挥项目中,考生需根据现场提供的合唱曲目,在规定的三分钟时间里,完成熟悉合唱谱一分钟后,随及模拟合唱现场,视唱声部旋律并根据正确的基本指挥图式进行视唱指挥。其目的在于考察考生基本音准、节奏、乐感、识谱能力以及考生对合唱作品的个人理解与音乐感受分析能力;在测试项目三自

作者简介:高燕真,女,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音乐教研员、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厦门361000)

弹自唱项目中,考生则选择从厦门地区所使用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随机抽取一首歌曲作为自弹自唱的歌曲。考生需根据歌曲风格特点,自行设计前奏,按照谱子规定的调号和音乐情绪,编配合适的钢琴伴奏织体,有感情地进行自弹自唱。其目的在于促使考生提前熟悉教材,考察其演奏及演唱水平;在测试项目四的即兴弹奏中,考生需要根据现场提供的一个小片段乐谱,为主旋律设计和声与伴奏织体,随机即兴使用带主题旋律的伴奏织体进行弹奏。设置该项目重在检测考生的综合音乐能力、即兴演奏水平及应变能力。经过综合专业技能测试后,考生需再进行第二项面试测试。考生依据现场随机抽取的教材,经过半小时的准备后进行十五分钟的片段教学。其意义在于促使考生提前熟悉和了解教材,关注有效进行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通过笔试与面试相结合、层层选拔的方式,厦门市吸纳了专业性强、综合能力好的音乐专业优秀考生加入音乐教师队伍。

从测试内容分值权重比的角度看,在综合知识笔试测试方面,由福建省统一组织的笔试测试,涵盖了对考生教育综合知识和学科音乐技能知识两个方面的考核,并在对文化基础知识的掌握上,从教育综合知识占40%、音乐专业知识占总分60%的权重分值比例上看,突显了对学科专业知识的倾斜;在专业技能测试方面上,近年来,厦门音乐考生均需参加专业技能考试,在技能考试的设置项目上设置了个人专业项目考试、合唱指挥、自弹自唱、即兴演奏四个专业项目测试,分值权重分别为30%、25%、25%和20%。从设置的分值权重上看,测试在关注考生专业项目、专业特点的同时,更注重考察考生的综合音乐能力,从四个专业测试项目看,测试突出了对考生钢琴演奏及即兴的要求,以及对考生综合能力的测试及临场应变能力的考察。

二、从师生教学情况看教师招聘导向性问题

(一)从教学水平层面分析

以厦门地区近三年调查情况为例(不含各大高校自主招生和舞蹈专业单招),2016年厦门市招考的小学音乐教师24名,其中声乐专业6名、钢琴专业14名;2015年招考入编音乐教师17名,其声乐专业4名、钢琴专业10名;2014年招考入编音乐教师40名,其中

声乐专业教师8名、钢琴专业31名。从近三年参加教师招聘入职的教师的发展情况看,绝大多数新入职教师工作态度认真,但在实际教学班听课、视导等反馈中发现,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示范性演唱的少,表达不精确,没能很好地表达歌曲情感,在表现领域歌唱教学中,无法正确示范、指导、纠正学生歌唱存在的问题,影响学生整体的歌唱水平。

(二)从学生学情层面分析

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内容中,课程教学分为“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四大教学领域。四大领域都涉及表现与表达即歌唱。它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又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人声乐器。准确歌唱既是人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一种音乐能力,同时又是一种最自然的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对学生歌唱的培养,不仅可以培养其敏锐的听觉,又可以在歌唱中感受和体验各种音乐要素,培养审美意识。一个不能“准确”歌唱的人,一定无法正确地诠释音乐作品。因此,教师的准确范唱对学生的表现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音乐教学中存在部分非声乐专业音乐老师过分依赖信息技术而忽视自身范唱的问题。在歌唱时教师无法正确演唱、示范、指导学生准确歌唱,造成多数学生在歌唱中出现音准偏差、没有节奏感、恒拍感,直接影响了学生歌曲情绪、情感的表达。综观全国各地市音乐基础教学,学生在演唱中缺乏情感表达,甚至在表达正确的音准概念上都存在着问题。可见,音乐教师的个人音乐素养、音准和演唱能力对学生歌唱能力的培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从学校教育层面分析

以2015年厦门地区小学音乐教师招聘项目为例,有自选项目表演(30%)、指挥项目(25%)、自弹自唱(25%)、即兴弹奏(20%)四个技能专项测试项目。四个项目中,使用钢琴弹奏专业技巧涉及三个项目,占测试项目的75%。显而易见这对学键盘的考生具有优势,而对于声乐、舞蹈或其它乐器专业的考生而言,优势比例较小。以2015年招考入选面试人员比例看,在自选表演项目看,键盘专业考生居多,约占总考生的71%,这样的专业设置不利于吸纳声乐专业考生,或者说是影响了综合性人才加入音乐

教师队伍。

在实际调研和教学视导中,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社团活动,这看似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但当我们让其中一位学生来尝试用人声表达音乐的时候,却出现了音准、节奏偏差、甚至毫无情感表达歌唱的现象,这不得不让音乐教育工作者们冷静地去反思,在音乐教学中是否忽视了最基础、最根本的音乐能力的培养。教师自身的专业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部分以某专业技能招聘进来的名校优秀毕业生,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施展自身的专业技能而遗憾离开音乐教学岗位。我们也看到某些学校为追求特色校建设,将国家、省颁课程中,每周2课的音乐课挪用其中1课时开展舞蹈、形体或乐器特色课程。长期以来,将影响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音乐能力的发展。

三、对完善选拔机制的建议

学生发展首先要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引领,面对当前音乐基础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吸纳优秀人才加入音乐教师队伍,实现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是值得我们思量的。随着社会对艺术活动的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特别对义务阶段的音乐教师而言,除了充分发挥自身特长优势,做好音乐课堂教学之外,还需要承担学校兴趣小组、社团活动、学校特色项目的建设。

(一)提前适应介入,因德而教

教师是特殊的职业群体,选择合适的优秀人才,是提升整个音乐教师队伍的前提条件。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应为人师表,具有高尚师德,富有爱心与责任心的同时还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较高的教育教学能力等。国外的教师招聘工作中,不仅关注对应聘者学历等相关文化素养方面的考评,还关注应聘者的道德素养、个人修养。教师除了具备基本的学科、教育知识外,还应具备对所从事的音乐教育的内心认同和价值精神追求等专业情意。我们在重视智力因素的同时,应该要关注人的非智力因素发展。

在德国,要求教师应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经过一年以上的教育见习或教育实习且每周上课课时达12小时,在实习考核合格后方有资格参加教师资格考

试,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的教育实践能力,以及在实践中运用教育理论的能力。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考察应聘者的非智力因素及品德。应聘者应在考前,提前一年到相关学校基层单位实习,熟悉了解所要从事的职业,提前适应和介入相关的教育教学工作,对自己是否能胜任音乐教师这一职业做出基本的自我判断。其次,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在招聘遴选时,要求应聘者提交一份在校实习报告,报告中应说明实习时间,参加学校教育教学任教学科和学段,并附上学校对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的综合意见,从基层学校的角度评价应聘者是否具备相应的教育教产品品质及教育教学能力。

(二)优化测试层级,因特求艺

近几年,厦门地区招聘的教师大多是依据学校的需求数进行分配,有的区域为体现公平性,选择以抽签方式决定新教师的去向,这样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教育公平,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何充分发挥音乐教师特殊的专业特长,更好地适应学校教育发展的需求,应是区域选拔分配人才时需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优化测试层级,增加区域所在学校的考核选择机制,由区域组织相关学校领导、教育教学专家、行政人员等,依据学校音乐教育教学的特色召开供需见面会,真正实现人才需求与实际基层学校需求之间的相互匹配。各需求学校可在区域范围内组织技能和学科测试之后的面试中,采用答辩等形式来综合考察音乐教师对学校的期待值,对未来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个人建议和思考,以及综合了解该教师音乐专业特长,对学校艺术教育社团建设等的想法,依据学校发展和教师自身专业特长,全方位、科学合理地综合考虑,选择相应的适宜人才受聘该校承担音乐教育教学工作。

对于特殊人才则应关注其技能与专业水平的考察。艺术人才不同于其他领域人才,模式化的选拔机制势必会打击艺术者的天赋。音乐教师队伍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实践性专业人才,应根据艺术教育独特的规则,优化选拔方式。

近年来,参加厦门市音乐教师招聘考试的应聘者大多数是通过“2A+4B”“(40a+60b)40+(30c+25d+25e+20f)30+30g”的考试模式来全方位综合考核考

生的学科素养和教学能力。其中“2A”为参加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的全省“教育综合基本知识测试”考试和“学科专业知识”考试。“4B”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自选项目表演、指挥项目、自弹自唱、即兴弹奏这四个项目的“学科专业技能测试”考试项目。(40a+60b)40代表全省的笔试测试项目,其中“a”为教育综合考试占笔试总分的40%;“b”为学科专业知识考试占笔试总分的60%。(30c+25d+25e+20f)30+30g代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面试考试项目,其中“c”为自选项目表演,占技能面试总分的30%;“d”为指挥项目,占技能面试总分的25%;“e”为自弹自唱,占技能面试总分的25%;“f”为即兴弹奏,占技能面试总分的20%;“g”为面试项目的片段教学测试,占面试项目总分的30%。这样既可以在统一专业笔试和面试测试中,熟悉和考察应聘者的知识结构水平,体现公平性,又能实现根据地方性的教育人才特殊性需求,在专业技能测试中,全方位了解应聘者的教育教学专业技能及潜能。

(三)优化面试项目,专中取全

面试具有直观性和综合性,使用单位能在特定的时间里通过观察、交流、展示等方式,对应聘者进行综合性评判。当前我们所需要的是复合型艺术教育专业教师,这就决定了面试内容应全方位考察、应聘者是否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是否胜任基础教育阶段音乐教育以及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需求。

1.面试前置,公平合理。在对新入职音乐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专业水平高、实践性强的考生在第一关的教育综合类笔试考试项目中无法顺利取得面试资格,而部分专业技术水平一般的考生,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顺利通过笔试参加了面试,在竞争对手不激烈的情况下,也可顺利通过面试进入音乐教师队伍。音乐学科的学科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专业性及实践性比理论性更为重要。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考试顺序,即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对应聘者进行选拔,严格遵照相关部门的招聘程序,形成“面试优选人才,笔试确定结果”的招聘原则,这样既可以确保真正具有音乐专业技能和教学专长、教学潜质的应聘者不被拒之门外,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面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个人受视觉、情感、关系等人为因

素影响客观公平评价的现象,体现优秀人才选拔机制的合理、科学和选拔制度的公开、公平、公正。

2.项目增加,综合权衡。以2016年招聘为例,厦门市招聘小学音乐教师的面试技能项目共四项,分为自选项目表演(占技能面试总分的30%)、指挥项目(占技能面试总分的25%)、自弹自唱(占技能面试总分的25%)、即兴弹奏(占技能面试总分的20%)。从技能面试项目内容设定上具有合理性,其项目设置针对学生自身专业特色设置了“自选项目”,可充分展示考生的音乐专业特长。在四个专业考试项目中,钢琴专业的学生在3个项目考试中均可发挥钢琴专业的优势,甚至可通过钢琴技巧掩饰唱歌方面的缺憾,对钢琴专业学生而言,考试项目的设置无疑占有隐性的优势。而对于声乐或器乐、舞蹈专业的考生而言,除自选项目表演项目外,涉及钢琴演奏的均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影响,有的声乐专业的考生,虽然在声乐演唱有优势,由于钢琴伴奏水平受限,而影响了演唱水平的发挥。当然,音乐教师的技能应该是全方位且综合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专业技术顶级人才,而是在演唱、演奏、指挥、示唱等方面均有一定水平的综合性人才。

义务教育阶段,唱歌教学是小学音乐教学最基础的教学方式,教师的演唱引领示范尤其重要,准确的示唱、情感的正确表达、适时的演唱方式调整,都是一名音乐教师所应具备和必备的首要条件。缺少演唱这一音乐教师必要的首要条件,教师便无法在课堂上做正确的示唱,去适时发现、调整学生演唱的音准、音色,指导学生使用正确和自然的演唱方式,长久下去,势必影响学生正确演唱的能力培养。因此,建议适时优化面试中的技能考试项目,调整保留原有自选项目和合唱指挥项目,调整分值权重为30%和20%,将原先的即兴弹奏20%和自弹自唱25%两个项目,合二为一改为自弹自唱25%,新增演唱项目25%。这样的项目调整有利突出对每位考生演唱水平的测试,综合评价考生钢琴伴奏、专业专长、合唱指挥、示唱示谱等综合专业能力。

(责任编辑:郑芳)

● 高等教育研究——覃红霞主持

省域民族农村地区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生态调查*

——以河北为例

冯用军

摘要: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是践行国家“双创”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通过高级人力资源输入“精准扶贫”加快民族农村地区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手段。河北民族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种类全、人口多、分布广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引导和鼓励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是破解“就业难”“发展艰”“三农困”等问题,推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科学编制问卷和访谈提纲并予实施,力图掌握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女大学生创业情况,解析其状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出优化对策建议,并为类似省域推进女大学生返乡“双创”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生存状态

促进就业是安国之策,推动创业是强国之方,以就业带动创业之兴,以创业纾解就业之困,城市病、找工难、史上更难就业季等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推上了自主创业之路。众所周知,经过近20年的外延式扩张,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1] 创业是新型的就业(创业1.0),是传统就业的2.0版。在知识经济社会和“互联网+”时代,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加之妇女学兴起,当代女大学生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自信,主动担负起创业的时代使命。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女性是第一资源,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成效事关教育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更是破解“就业难”“发展艰”“三农困”等问题的希望。近年来,在

全员奔向“中国梦”的大环境中,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先后多次莅临河北作出重要指示,河北省市县乡纷纷出台了创业优惠政策和扶持举措,燕赵大地掀起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创业热潮,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成为时代预流,也有部分女大学生返回民族农村地区创业成功。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是指返回河北乡/镇级民族行政区内创业的女大学毕业生。在返乡创业成为化解高校女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新途径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新问题,主要表现在返乡创业女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返乡意愿、乡村认同、事业发展、日常生活、心理预期等方面存在一定偏差,面临生存、适应、成长、情感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有效缓解。

作者简介:冯用军,男,四川资阳人,唐山师院副教授,博士,北师大博士后,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评价、教育历史与文化、教育经济与管理(唐山 063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生存状态研究”(项目编号:HB15JY00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津冀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生存状态研究”(项目编号:15CSH033)、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5A01)的研究成果。

一、问卷编制与检验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既是摆在燕赵儿女面前新的进京赶考,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河北是亟需奋起直追大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民族工作大省,引导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是一条绿色道路,如何衡量她们的生存状态,则是一道亟需解答的科学难题。

(一)调查问卷项目编制

国内外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问卷、大学生创业情况调查问卷甚多,但多元智能文献检索发现并未有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情况调查问卷,采用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权威方法并利用SPSS、DPS等专业分析软件,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成果的基础上专门研发了《省域民族农村地区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情况调查问卷》(A Provincial Questionnair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ing Home Graduates in Ethnic Rural Regions,PQER),问卷总计包括五个部分,开发了110个题目,其中101题为单选题、2题为排序题、6题为多选项、1题为开放题目(不列入问卷科学指标检验)。

(二)施测对象信息

1.试测对象。本研究的被试为河北省6个民族自治县、3个民族县的返乡创业女大学生。初测时实测20人,回收问卷18份,有效问卷17份,平均创业年限2.5年;再测时实测10人,回收问卷7份,有效问卷7份,平均创业年限3年;15人参加了第三轮重测,有效问卷15份;20人接受访谈(利用专门设计的《省域民族农村地区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状态访谈提纲》);16人参加《Campbell指数量表》效标检测。

2.施测程序。初测(试测)、再测、重测(效标检测)。被试姓名及创业组织均匿名处理,以保障问卷回答的最大真实性。

(三)分析工具评价

运用等距原则设计的PQER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就业基本情况(了解创业前的就业经历)、创业基本情况、创业保障体系调查四个子问卷,分别由16个、27个、35个和32个题项组成,四部分调查结果进行关联分析。

(四)数据处理软件

原始数据处理、分析均使用SPSS23.0、DPS v16.05。

(五)问卷科学指标检验

1.影响性因子(表1)

表1 特征值及其贡献率

因子	原始特征值			平方载荷的提取总和		
	特征根	方差贡献	累积贡献	特征根	方差贡献	累积贡献率
1	15.50	64.60	64.60	15.50	64.60	64.61
2	2.60	11.00	75.53	2.60	11.00	75.52
3	1.70	7.00	82.50	1.70	7.00	82.49

2、验证性因素(表2)。

表2 验证性因素探析拟合度检验结果

指标	Chi ² /df	RMR	NFI	RMSEA	TLI	CFI	AGFI	RFI	IFI
全部题目	2.297	0.043	0.823	0.052	0.875	0.821	0.846	0.798	0.809

3、区分度(表3)。

表3 题目区分度检验结果

(限于篇幅,仅列举37个题目)

题目	Cc	题目	Cc								
1	0.64	7	0.42	13	0.58	19	0.63	25	0.87	34	0.61
2	0.75	8	0.86	14	0.68	20	0.43	26	0.59	35	0.60
3	0.72	9	0.74	15	0.89	21	0.59	28	0.76	36	0.56
4	0.83	10	0.88	16	0.61	22	0.44	30	0.57	37	0.87
5	0.69	11	0.56	17	0.60	23	0.53	32	0.81
6	0.43	12	0.63	18	0.79	24	0.63	33	0.49

4、信度和效度(表4、表5)。

表4 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

总问卷	子问卷1	子问卷2	子问卷3
0.89	0.86	0.64	0.80

表5 问卷的重测信度

总问卷	子问卷1	子问卷2	子问卷3
0.78	0.73	0.55	0.76

表4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表5显示,整个问卷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较好;在效度上,通过统计16人所做的《Campbell指数量表》,计算出它和问卷的相关系数为0.724($p < 0.01$),说明两者相关度非常显著,再结合影响性因子和验证性因素探析的结果,可以确定该问卷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概况

考虑到河北人口综合、分布、增长、家庭、性别、城乡、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等特征,PQER的调查对象主要以河北省统计局《2015年河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人口的市域分布和民族分布为基础进行随机简单抽样。

从2016年7月开始至12月截止,课题组采用多路径不重复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方法选定施测对象,总计正式发放问卷80份,回收78份,回收率97.50%,有效问卷75份,有效率96.15%;12人接受访谈。利用SPSS23.0和DPS16.05进行原始数据处理和分析,显示问卷 α 系数($\alpha=0.89$)、重测信度($r=0.78$)和结构效度($v=0.72$)均较理想,可初步确定问卷在内容和时间序列上稳定性较好、一致性较高(表6)。

表6 问卷基础信息统计(未清洗数据)

指标	N/样本	ES/有效	IS/无效	M/男	F/女	乡镇	农村	已婚	未婚	α 系数	信度	效度
数值/人	80	75	5	0	75	50	25	30	45	0.89	0.78	0.72
%	100	93.75	6.25	0.00	100.00	66.67	33.33	40.00	60.00			
指标/岁	<23	23-26	27-30	>30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省内	省外	211	非211
数值/人	9	32	28	6	26	40	8	1	70	5	6	69
%	12	42.67	37.33	8	34.67	53.33	10.67	1.33	93.33	6.67	8	92

说明:采用四舍五入法和百分数,个别数据略有细微出入,下同。

国家提出河北定位“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以来,河北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机遇、“2022年冬奥会”契机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全省上下尤其是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石家庄、唐山、沧州、秦皇岛、邯郸、廊坊、张家口、承德8个市,抢抓“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东部北方起点建设机遇,努力从廊道、口岸、产业、平台建设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提升改革开放水平、层次和质量,不断把区位优势、资源等优势转化为大开放格局中的比较竞争优势,加之河北“十三五”规划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力争闯出一条从黑色(京南)转向绿色(京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所以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女大学生创业比较集中在环京津城市群、国门城市群和历史文化名城。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这些城市多是被调查对象的家乡,反映出河北“家乡宝”文化观念厚重。可以预见,随着国家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工程的推进,为新农村建设提速和土地政策调整注入巨大正能量,^②河北民族农村地区将成为返乡女大学生的创业热土。

表7 调查对象的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	人数	比例%	学科	人数	比例%	学科	人数	比例%
哲学	3	4.00	文学	5	6.67	农学	9	12.00
经济学	6	8.00	历史学	3	4.00	医学	3	4.00
管理学	8	10.67	理学	8	10.67	法学	6	8.00
教育学	8	10.67	工学	10	13.33	艺术学	5	6.67
军事学	1	1.33						

在全民创业时代,可以说任何一门学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机会去追逐自己的创业梦,就像这些学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能找到相应工作一样。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女大学生创业的学科专业分布情况与当年高校在冀录取的情况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农学等招生规模较大的学科及其下属专业,由于近年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史上最难就业季”一季接着一季,其毕业生创业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表7),这可能与河北是特色农牧、旅游文创、健康休闲、矿冶加工等产业大省有关,部分学科专业具有先天创业优势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创业需要一定启动资金。调查和访谈显示,父母属于就业型还是创业型对女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还是创业有较大影响,被

表8 调查对象的父母创业及年收入情况

父母是否有创业		人数	比例%	父母收入	小于1万	1-5万	5.01-10万	10.01-20万	20万以上
是	34	45.33	人数	11	42	13	7	2	
否	41	54.67	比例%	14.67	56.00	17.33	9.33	2.67	

调查对象中45.33%的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父母曾创业或拥有公司、父母年收入在5万以上的占29.33%(表8)。河北整体属于中国经济较发达省区,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产业“创造”的GDP占比较大,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优先转型发展的省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在中国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可适度支撑女大学生返乡创业。

表9 调查对象父母的职业

父亲职业	人数	比例%	母亲职业	人数	比例%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7	9.33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4	5.33
专业技术人员	8	10.67	专业技术人员	7	9.3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1	14.6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4	18.67
商业、服务业人员	17	22.67	商业、服务业人员	21	28.00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14	18.67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16	21.3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13	17.3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8	10.67
军人	2	2.66	军人	1	1.33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3	4.00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4	5.33

中国悠久的人治历史和乡土文化,使得“人情”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内涵的社会生活要素,尤其是在河北。在创业方面,返乡女大学生除了必要的学历、学识、学养和品质外,父母职业和良好社会关系往往是很好助力。调查和访谈显示,父母从事一线工作的返乡女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的比例更高,父母为组织负责人、军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的返乡女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的比例更高(表9),她们拥有更强大的核心就业竞争力。

(二)调查对象创业生态

创业是知易行难的不确定性决策行为,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创业的结局无法预料。中国特别是京津冀严控雾霾,河北逐年淘汰钢铁、水泥、陶瓷、玻璃等过剩落后产能,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创业应运而

生,返乡创业女大学生对创业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凤凰涅槃过程,就业不易,创业更难。

表10 对创业的最初理解

选项	人数	比例%
开办企业	43	57.33
有份事业	19	25.33
开发项目	9	12.00
其他	4	5.33

创业是过程、行为、形态等的集合体,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体。调查显示,57.33%的返乡女大学生认为创业就是“开办企业”,注册一家公司即可、25.33%的认为创业就是“有份事业”,与合伙人共事、12.00%的认为创业就是开发项目,如将一项发明专利产业化商业化、5.33%的认为创业“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自己当老板”等(表10)。



图1 采取的创业路径

随着国家“双创”政策落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剧增,投身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女大学生创业者会走不同的创业道路。调查显示,生存型创业者(创一代)更偏好自己创业,这一比例为18.53%、赚钱型创业者更偏好合伙创业,这一比例是54.4%,一起投资担风险赚钱、主动型创业者(创二代)更喜好家庭创业,比例为27.07%(图1),她们返乡创业大多接手的是中小微家族企业,这反映出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某些困境,如不容易壮大、壮大后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比例偏低、富不过二代等。

返乡女大学生对创业的理解会影响其创业方式。调查显示,42.67%的返乡女大学生选择开办公司、16.00%的选择加盟连锁公司、16.00%的选择开

表11 首选的创业方式

选项	人数	比例%
创办公司	32	42.67
加盟连锁公司	12	16.00
搞科技研发转化	8	10.67
开网店或微店	12	16.00
开小铺子或摆地摊	6	8.00
参加创业大赛	4	5.33
其他	1	1.33

网店或微店、10.67%的选择搞科技研发转化、8.00%的选择开小铺子或摆地摊、5.33%的选择参加创业大赛(表11)。“练摊”是创业的开始,考察石家庄、唐山等地大学城夜市发现,以卖服装、玩具为主,有的女大学生“练摊”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有的是为将来创业积累经验,也有随大流的“练摊”女大学生,但这些都“练摊”亟待规范和引导,也反过来说明政府和高校等的“双创”政策措施落地速度和成效有待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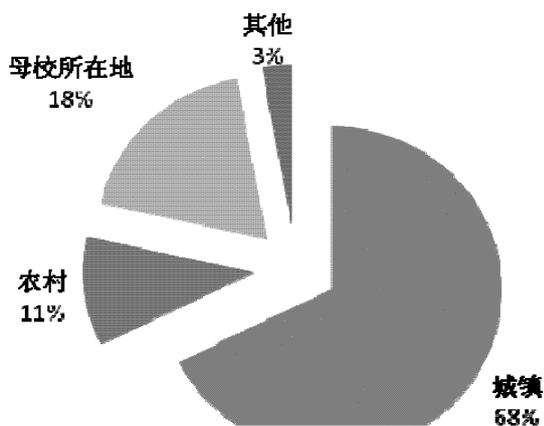


图2 首选创业目的地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循环发展的巨大障碍,主要表现为城市“马太效应”和城乡剪刀差,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和待遇模式,以及附着在户口上的其它问题(异地高考、医疗、交通、购房等),至今都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影响了返乡女大学生的创业目的地选择,毕竟城乡在教育、医疗、交通、发展机会、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差距太大,女大学生

返乡创业选择余地不大。调查显示,68%的返乡大学生首选城镇创业、18%的首选母校所在地创业、11%的选择农村创业、3%的选择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地创业(图2)。

表12 创业初始资金来源及额度(万元)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政府创业专项基金	4	5.33	风险投资	3	4.00	其他	3	4.00
小额优惠贷款	7	9.33	父母亲友的资助	34	45.33			
商业银行贷款	9	12.00	个人储蓄	15	20.00			
0.5	5	6.67	5.1-10	17	22.67	100.1-200	1	0.33
0.6-1	10	13.33	10.1-20	9	12.00	200.1-500	1	0.33
1.1-2.0	13	17.33	20.1-50	2	2.67	500.1-	0	0.00
2.1-5	16	21.33	50.1-100	1	1.33			

创业与就业的最大不同是前者的收益和未来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后者的收益和结果基本是可以预期的。从前可知,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家庭富裕、资金实力雄厚者寥寥无几,绝大部分家庭及其返乡女大学毕业生都处于脱贫致富奔小康状态。调查显示,45.33%的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初始创业资金来自父母亲友资助、20.00%来自个人储蓄、26.66%来自政府创业专项基金及银行贷款、4.00%来自风险投资或天使资金,还有来自捐赠、典当(抵押)、信用支付、智力投资等,占4.00%。河北民族农村地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初始创业投资额度偏低、全省1亿小额担保贷款看得见吃不着。调查发现,22.67%的创业者在5.1-10万元区间、21.33%的在2.1-5万元之间、30.66%的在0.6-2.0万元区间、12%的在10.1-20万元之间,超过20万元的仅占总被调查者的4.66%,其中2位受访者首轮创业投资超过100万元(表12)。

创业并非易事,返乡女大学生有时往往有好的项目、创意、技术、专利等但缺资金、场地、团队等,或者创业手续繁多、获取扶持基金困难、场地租借费太贵等。调查显示,29.6%的返乡女大学生最需要政府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22.67%的最需要政府提供免费创业园区或者象征性成本创业孵化器、20.53%的需要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服务机构,提供360°创业服务、18.13%的需要科技创业基金“输血”,启动创业程序“造血”、7.6%的希望政府加强对女大学生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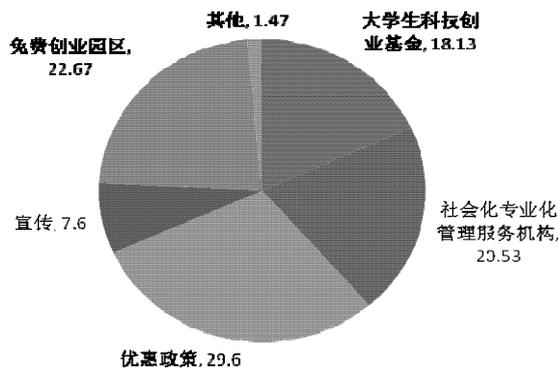


图3 大学生创业最需要的政府扶持

的宣传,改变乡村群众的落后观念,创业既非高大上的事情,也并非低人一等,还有1.47%的认为政府应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大力扶持特色农业产销、濒危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地理标志产品营销、创意工艺伴手礼产品等方面的创业(图3)。通过后期访谈也发现,有接近70%的返乡大学生不太清楚国家给大学生提供的创业优化政策和资金帮扶措施,对政府方面的创业保障机制表示满意的并不多,真正能申请到政府口或代表政府口的第三方中介的扶持项目不多,能拿到“种子创业基金”的则更少。

表13 自主创业素质及障碍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强烈的挑战精神	18	24.00	扎实的专业基础	15	20.00	良好的社会关系	16	21.33
出色的沟通及交际能力	12	16.00	团队管理及协调能力	13	17.33	其他	1	1.33
没有好的创业项目	7	9.33	缺乏社会关系	14	18.67	精力不足	3	4.00
资金不足	14	18.67	亲朋反对	9	12.00	难组建优秀的创业团队	12	16.00
经验不够	8	10.67	面对风险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6	8.00	其他	2	2.67

创业不是简单地说有个创意、情怀、技术、团队等就可以,创业还需要创业者拥有核心素养和核心竞争力。调查和访谈显示,24.00%的调查对象认为女大学生自主创业最应具备的是强烈的挑战精神,就是敢为天下先、第一个吃螃蟹的气势;20.00%的认为最应具备的是扎实的专业基础,如财经知识;21.33%的认为最应具备的是良好的社会关系,“拼一族”存在即是合理;17.33%的被调查者认为最应具备的是团队管理及协调能力,要有比较一致的创业理念和目标;16.00%的认为出色的沟通及交际能力非常重要;1.33%的认为最应具备的包括形象气

质、文本撰写、信息处理、执行力等核心能力(表13)。关于创业障碍的调查显示,18.67%的返乡女大学生认为最大的创业障碍是缺乏够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亲朋好友中缺失掌权掌钱有话语权者;18.67%的认为是资金不足,希望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免息或贴息资金;16.00%的认为是很难组建一支优秀的创业团队;12.00%的认为是来自亲朋的反对,特别是来自父母或另一半的反对,他们更希望子女进政府或国企;10.67%的认为是经验不够、阅历不足,读大学期间“练摊”是有必要的;9.33%的认为是没有好的创业项目;8.00%的返乡大学生认为最大障碍是面对风险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这也是一些风投大咖认为“85后”、特别是“90后”、“00后”不适合创业的重要由头;创业是精气神、人财物的全面比拼,有返乡女大学生认为精力不足以创业,占比4.00%。

表14 自主创业帮助最大的校园活动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创业比赛、社团活动	15	20.00	创业相关课程	14	18.67	学校及政府提供的专业咨询	11	14.67
实习及兼职	23	30.67	成功人士的校园演讲	10	13.33	其他	2	2.67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站”或“就业/创业训练基地”,但在全球化创业时代,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改革。调查和访谈显示,30.67%的返乡大学生认为实习及兼职对自主创业帮助最大,可以培养创业核心素质;20.00%的认为创业比赛、社团活动的帮助最大,可让人熟悉创业基本流程,训练组织、协调、沟通等核心能力;18.67%的认为大学提供的创业相关课程帮助最大,可全方位提供创业所需的专业核心知识;14.67%的认为高校及政府提供的就业咨询帮助最大,可了解到最权威的创业信息、政策和措施;13.33%的认为成功人士的校园演讲帮助最大,他们现身说法,经验可资借鉴、教训带来警惕;2.67%的认为高校的创业文化、创业型大学定位、校园创业空间等也能提供许多帮助(表14)。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在我国,“80后”大学生基本属于“信息1代”,他们相比前辈们而言,更喜欢从网络、新媒体等渠道或平台获得信息,所以“80后”数代(“90后”、“00后”等)也是“互联网+1

表15 创业项目所属行业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电子商务类	19	25.33	数码产品类	8	10.67	机械制造类	2	2.67
软件开发类	4	5.33	贸易类	5	6.67	信息技术类	8	10.67
食品类	10	13.33	服装服饰类	3	4.00	酒店服务类	2	2.67
养殖种植类	3	4.00	教育培训类	10	13.33	其他	1	1.33

代”，他们表现出“超自我中心主义”，喜欢标新立异，被称为“风险中的一代”。^[3]调查及访谈发现，25.33%的返乡女大学生创业首选低投入的电子商务类，该行业只要电脑或智能终端、网络和服务等；13.33%的选择了食品类，河北美食众多，如保定白运章包子、河间驴肉火烧、唐山烙馍等；13.33%的选择了教育培训类，以教育培训机构为主；10.67%的选择了信息技术类，如网吧、话吧、电子维修店等；10.67%的选择数码产品类，包括卖电脑、相机、手机等(表15)。总体而言，女大学生返乡创业选择第一、二产业的比例较低，选择服务业或流通业的较多，容易挖到“第一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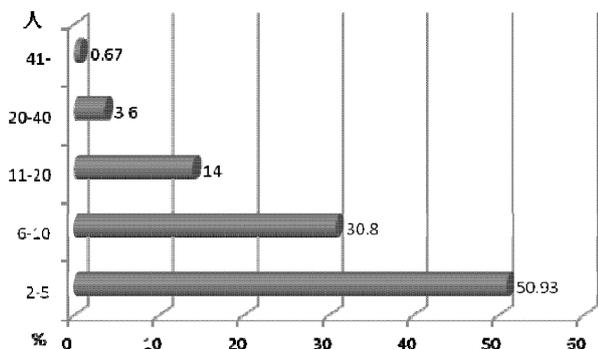


图4 创业时团队人数

创业团队是由少数具有互补专业技能且心怀梦想的创业者组成，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创业目标并遵守一个能使他们彼此担负责任的协约，共同为达成高品质的结果而努力的协同创新体，如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好的创业团队可以事半功倍，如刘邦团队，差的创业团队往往事倍功半，如项羽团队。在“互联网+”时代，凭借个人力量是无法建立伟大公司的，选择了正确的团队，就是完成了80%的工作，这是很多风险投行投资企业时的经验之谈。适切的创业团队需要具备五大要素：职位所需的技能、

此前供职创业公司的经验、与团队其他成员相适应的个性、与团队其他成员共同的目标、远大的抱负。调查显示，50.93%的返乡女大学生创业时团队为2-5人、30.80%的为6-10人、14%的为11-20人、人数超过40人的不到1%(图4)。创业团队多少人最合适，并没有标准答案，要视创业项目情况而定，创业成功后要妥善安置创业元老。

表16 创业时的年龄、学历(位)及工作年限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年	人数	比例%
23岁以下	3	4.00	专科	18	24.00	0	13	17.33
23-26岁	16	21.33	本科	48	64.00	1-2	32	42.67
27-30岁	33	44.00	硕士	7	9.33	3-5	25	33.33
31-35岁	22	29.33	博士	2	2.67	6-10	4	5.33
36+	1	1.33				11+	1	1.33

自古英雄出少年，创业更多是年轻人的世界，以时间换空间。调查显示，44.00%的返乡女大学生处于27-30岁区间的黄金年龄，是可以相对稳健地开拓事业的最佳创业期、29.22%的处于31-35岁区间的紫金年龄，基本熬过了冲动型创业期，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思考核心发展事宜、21.33%的处于23-26岁区间的黑铁年龄，基本处于草创阶段、1.33%的在36岁以上的钻石年龄，很多是工作与创业交替、4.00%的处于23以下的青铜年龄，刚开始烧钱创业。权威研究发现，对于自主创业大学生而言，23-35岁是最佳创业年龄段，^[4]很少有刚出身社会就直接创业的那种血性冲动，也很少有老成世故的畏首畏尾情绪。64.00%的返乡女大学生创业初始学历为本科，且绝大部分毕业于非“211”工程高校、24.00%的为专科、9.33%的为研究生，博士毕业返乡创业的比例仅有2.67%。访谈显示，也有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返乡创办特色工艺品店、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返乡创办教育培训机构，还有“海归”回到家乡张家口开客栈等，创业不分出身，工作不分贵贱。在关于创业时工作年限的调查中，42.67%的返乡女大学生工作1-2年后开始创业、33.33%的工作3-5年后创业、17.33%的毕业即创业，只有1.33%的工作11年后才创业(表16)。

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调查显示，45.2%的返乡女大学生的创业项目盈亏持平，29.20%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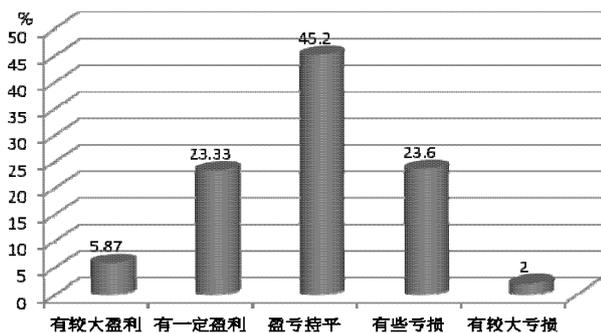


图5 创业项目的经济效益

(微利/薄利), 25.6%亏损(图5)。访谈发现, 创业项目亏损原因有盈利周期较长、选择不当、财务管理知识不足、风控不力, 也有创业者自身的心理性格因素, 如餐饮行业的创业者没能管控好亲朋与顾客的分界线, 这些教训值得后来创业者警惕。

表17 本地区对创业行为的态度

题目	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稍微不同意	不好说	稍微同意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乡土文化鼓励创业创新	2.53	20.13	34.40	18.67	19.60	4.27	0.40
多数人对于创业失败者具有宽容心	6.00	23.47	40.00	14.40	12.43	3.33	0.27
父母教导孩子时常以成功商人或企业家为榜样	12.27	33.47	46.13	2.00	3.87	1.60	0.67
乡民具有崇尚艰苦奋斗、勇于冒险的精神	1.73	3.60	11.07	26.13	51.73	4.67	1.07
地域文化中包含崇商重企的理念	1.20	31.47	50.93	8.93	5.47	1.60	0.40
周围的人都很尊重自主创业者	0.93	12.93	25.73	27.87	21.07	9.87	1.60

我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地区商圈, 商帮文化影响至今。河北老仗帮虽有上千年历史, 但并未跻身中国商帮主流, 重商文化并非冀文化的核心。调查显示, 91.87%的返乡女大学生并不认同“父母教导孩子时常以成功商人或企业家为榜样”、83.6%的认为所在地区文化中并不包含崇商重企的理念、57.06%的认为所在地区文化不鼓励创业创新(表17), 而且在河北部分民族农村地区, 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常被认为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之举, 通常的说辞是“大学白念了”(反面教材), 老百姓对创业者或创业失败者包容心不够。

三、优化对策与建议

乡土社会是立国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局。^[5]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冲击下, 45°东轴线改革开放产生了超级“虹吸现象”和“马太效应”, 华夏农业文明未能有效完成自

我转型, 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和死亡,^[6]相比大城市的欣欣向荣, 农村农业农民的活力在相对锐减。城市过度富足与农村相对衰败形成鲜明对比, 各类优质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国家中心城市, 农村农民农业很少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和共享到发展成果, “三农问题”至今还是我国的“头号问题”, “三农政策”至今还是我国的“1号政策”,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问题亟待破解。河北各方应通力协作, 让更多女大学生毕业后愿意来燕赵大地创业继续“赶考行”, 再造环境青山绿水、人民生活富足的美丽乡土中国。

(一) 构建政学研产协同发展的女大学生返乡创业教育模式

根据河北乡情民意、高校就业创业情况和企业运行状态, 遵循产学研一体化思想, 构建基于政学研产协同发展理念的城乡融合、通专结合的返乡创业教育模式。该创业教育模式可借助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返乡创业能力提升工程(政府), 利用高校(学校)、科研院所(研究机构)和企业(产业)的创客空间, 对具有初步返乡创业计划的女大学生进行培训, 培训重点是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知识、返乡创业技能、返乡创业素养和女性学知识。为提高返乡创业教育的成效, 必须构建符合女大学生身心特征的返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和返乡创业执行体系。政府主管就业工作的公务员、高校负责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科研机构负责成果转化的技术人员和企业里创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共同承担创业教育课程, 既有“正餐”, 也有“加餐”。^[7]针对返乡创业实践体系, 可利用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引入中粮、阿里巴巴等大集团介入教育过程并设立农村创业风险基金, 校政企通力合作打造女大学创客空间和创业园, 高校提供创业女大学生、企业提供创业模拟工场、政府为参与高校和企业提供资金或替代优惠, 让大学生模拟“三农”创业项目(农村淘宝)操作流程, 切实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英人物。

(二) 优化激励女大学生到民族农村地区创业的综合环境

创业需要情怀、需要行动, 也需要良好、宽松、包

容的舆论环境。女大学生返乡创业作为一种新型就业现象,由于“女大学”这个特殊的符号标签,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遍及方方面面,要取得全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普遍认同还有很早的一段路要走。“山窝窝飞出金凤凰”至今仍是农村形容“女大学生”的标准用法,由于长期的“铁饭碗”思想、“跳出农门”观念等在民族农村地区还比较根深蒂固,使得很多父母不希望或反对“天之骄子”们回乡创业,父母的不支持言行非常容易影响女大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美丽的乡村是一幅七巧的图画,返乡创业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首先政府要更加努力让创新创业成为主流价值观,通过“负面清单”计划监督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让更多创业正能量进入社会大众,形成全民知道创业、关心创业、理解创业、参与创业的政治环境。当然,政府要有“进京赶考”的态度,坚持“两个务必”不动摇,努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创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大学要更加合理利用一切平台和管道,向大学生全方位多样化立体渗透“双创”理念,特别是在“入学季”、“毕业季”让校园360°无死角充盈“双创”元素,特别是有计划、成定制邀请创业成功的校友返校现身说法、榜样示范,营造支持、赞赏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教育环境。家长要积极转变观念,树立平常心 and 大学生是普通劳动者的观念,充分认识到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就是“回娘家”,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何况在雾霾堵城与大美乡村之间,“乡约”“乡音”“乡亲”更显得难能可贵,从而为下一个“‘老干妈’陶华碧”的诞生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

(三) 引导河北民族农村地区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农”牌

新鲜空气、纯净水源、绿色生态食品、原汁原味民俗文化、邻里友好人际关系等,这些在民族农村地区俯拾皆是的平常之物,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却是稀缺之品,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充斥耳目的是“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下的川流不息。虽然相对而言,中国城市靓丽多彩,中国农村满目苍夷,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主要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

通、金融等公共事业均等化),依靠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中国城市相比中国乡村的绝对优势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巨大消耗基础之上,维系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从长远来看,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农村。女大学生返乡创业首先要发自内心的爱农村、爱农业、爱农民、爱土地、爱作物、爱生态,其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农村电商契机,依托民族农村地区特色产品、特色服务、特色文化等发展农村电商、乡土淘宝。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包括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支持农产品电商平台和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等多个方面。^[8]《乡村爱情》是一部演绎大学生返乡创业酸甜苦辣咸的国民喜剧,这部大IP启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要时刻关注农村当下比如“生态农村与创意农林渔牧业”、“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综合服务”、“村民选举与乡村自治”、“乡镇企业与小微企业”等诸多热点问题和现实矛盾,从中找到创业的灵感,早日让民族民俗文化、绿色生态食品、健康休闲养老服务、新鲜空气山泉、满蒙特色伴手礼等统统成为河北籍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品牌项目。

(四) 打造多样化“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创业河北、幸福中国。为充分利用京津冀一体化中北京天津产业转移机遇,进一步促进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承办、河北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协办年度“河北省毕业生创业市场”,打通返乡创业女大学生“识伯乐”、“找婆家”的“瓶颈”。同时,建议在有关部委指导下,由京津冀三地党政部门主办,相关厅委承办,13个城市、130所高校、1300家大型企业联合轮流协办(建议政校企组合)“京津冀‘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含首届女性创业者大赛)”及其高层圆桌论坛,参赛者包括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含返乡大学生),打通政府(创业主管)、风投(创业资金)、高校(创业来源)、社会(创业环境)、企业(创业形式)之间的“创业瓶颈”,架起人流、

物流、资金流、创意流、科技流、信息流之间的“创业桥梁”，并作为河北继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路径和载体，力争每年9月举办一届，为敢于肩负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主动作为、积极作为、有效作为的在冀高校大学生和河北籍返乡大学生持续展示自身创新创业教育成效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借鉴“乌镇模式”打造河北版“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大会”（正定），培育全球大学生创业模范、唱响河北大学生创业品牌。

综上所述，“十二五”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显著增强。“十三五”时期，推动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成为落实国家《“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的重要举措，^[9]应籍此创建河北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开展“创业河北”、“创业中国”行动，创造一切可能让返乡女大学生觉得现在是来河北创业的最好机会。创业有未来，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想创业又有好的项目，在河北一定能找到适合你发展的最佳空间。另外，河北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不仅应该帮助返乡创业女大学生解决更多实际困难，还应积极关注她们的生存、心理和情感状态。其实，在城镇或农村创业，各有利弊，城镇配套比较齐全，生活品质相对良好，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创业机会相对偏少、农村各方面发展相对滞后，很多配套不完善，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都缺乏，生活质量相对清苦，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创业机会相对较多，对于有远见的返乡女大学生而言，随着互联网+普惠互助金融在农村的推广和“农村大学生创业园”的增加，农村创业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同时，返乡创业女大

学生要不断“修身养性”提升核心素养避免边缘化和被边缘化，主动融入河北民族农村地区，在那里扎根成长、立地创业、幸福生活、恋恋不舍，让皇家文化、红色文化、和合文化、根脉文化、包容文化助推返乡创业潮，创业、创意、创新，成才、成家、成业，共创“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冯用军.后大众化阶段社会阶层对高教入学机会的影响——以辈出率为中心[J].现代教育管理,2010(9):9—13.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Z].国办发〔2016〕84号,2016-11-29.
- [3]彭国胜.风险中的一代:青年失业的现状、影响及对策[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9.
- [4]冯用军,赵德国.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2015)[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91.
- [5]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局与评判[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1):11.
- [6]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5.
- [7]蒋肖斌.“985”高校探索就业“校企合作”新模式[N].中国青年报,2016-3-12(3版).
-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2017-2-8).
- [9]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的通知[Z].国发〔2017〕10号,2017-1-26.

(责任编辑:郑芳)

大学场域内五种权力观的提出、阐释与意义*

张 森

摘 要:文章在梳理各种大学权力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场域内应存在五种权力主体的主张,并对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内涵以及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学生权力缘何成为权力主体进行了阐释与说明,进而论证了五种权力观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大学场域;权力观;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学生权力

大学权力的构成是大学治理的前提与强力支撑,如果能够从整体上分析构成大学的权力主体状况与整体架构体系,便能找出大学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及对策。就目前已发表的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只是集中于大学某一层面的权力运行探讨,未能从整体视角上对大学场域内存在的每项权力进行辨别、概括与总结,为此,本文借助管理学的权力理论,通过考察大学内部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对大学权力构成、权力性质与作用等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试图建立起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与表达方式。

一、大学五种权力观的提出

一直以来,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高校内部就存在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种权力表现形式,很多学者也指出我们大学内部权力的博弈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与争执。但在近来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又意识到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分化、组合和冲突也异常复杂多变,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形式。此时,二元权力观难以概括出大学场域内全部权力构成情况,大学场域中存在着权力主体

扩充、分化之势。为此,大学组织要想增强活力与提高效能,需要从大学场域内部全方位地引导、促进多元权力主体的形成和运行,从而平衡大学权力格局,促进大学均衡发展。

根据大学内部团体利益的差别,国内外学者陆续提出了三元、四元、五元及多元权力观和权力论。那么相对而言,哪种权力观较为科学和合理呢?笔者认为高校五种权力观应该较为全面地概括和体现了内部各群体的需求与表达,较为恰当与合理。“在对大学权力结构进行分析时,不能忽视大学权力结构中的各种权力的实际存在,不能忽视任何一种构成部分。”^①大学的核心职责不是科学研究,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围绕“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这一核心目标,进一步分解为谁施教、谁受教、谁负责、谁管理、谁保障与谁监督等诸多问题。如此就将“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工作分解成庞大的问题体系,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和任务,大学内部成员演变成五个主要相关利益群体:行政管理群体、专业教学群体、政治保障群体、社会支持群体和需要

作者简介:张森,男,河北省吴桥人,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权力与大学治理(石家庄 050061)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4JY052)的研究成果。

受教育的学生群体。在大学中每一种主体或每一类群体都存在着发挥功能的领域,同时也存在着利益需求,而权力在资源分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忽视他们的权力,也就无视和不能保障他们正当的利益需求,制度设计如果不能满足多方面的要求必然会引发不满与冲突。五种权力主体论不仅融合了以往学者的分类与主张,而且概括归纳了高校的主要群体,因而,这种分类比较适合于大学组织特性的要求和突出显示了大学各类群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所以这种分类实际上能够容易概括、代表和满足大学在运行管理中各种群体的教育主张和利益需求。

对于五种权力观中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除了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一些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外,几乎没有异议。而对于另外三种权力: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学生权力,他们的本质、归属等问题还存在诸多争议的地方。一般来讲,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否并无争议,只是称呼与视角不同,但是对于社会权力是否属于大学内部权力的范围却存在颇多争议,多数文章在论述大学场域内部权力的时候将社会权力或市场权力作为外部权力而剔除。再者,就是政党权力是否具有普世性,即当今世界高校中是否普遍存在着政党权力还有很大分歧?如在陈玉琨、戚业国等学者的观点中,外国与中国的权力主体结构是分开论述的,政治权力并未列入国外权力结构中被考察。^[2]三是学生权力,即学生主体是否拥有权力,学生权利和权力怎样区分?这些问题需要 we 进行较为详细的探究。

二、五种权力观的阐释

由于文化教育传统、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高校管理体系中的权力主体结构、表现形式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每种权力又或强或弱地存在于各国教育体制之中,通过对不同权力本质、内涵的分析与挖掘,将有助于我们准确了解各种权力的作用与功能并构建合理的权力结构框架。

(一)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在中国也被称为政党权力或党委权力,是由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引申出来的,毫无疑问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存在两个权力

中心,即党委书记和校长,并相应存在着以党委书记为首的政治权力系统和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根据这个理解,大学党委除了支持校长依法、独立开展校务管理工作外,其主要职责是侧重于政治层面的领导,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针、组织建设等方面提供权威指导,在学校重要人事、重大决策和重大战略目标、战略规划制定方面把好关,保证和监督大学沿着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与前进。至于学科发展、人才引进、课程改革、科研计划等具体办学方略及其运行实施,则应交由以校长为首的行政团队完成。

为何把政治权力分裂出来,政治或政党权力是中国特有的权力么?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学是否也存在这种政治权力?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里没有和我国一样的党委配套机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治权力不发挥作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的调控能力只是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其实,大学的政治权力主要是指国家意识形态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左右学校办学发展的政治方向、组织路线、重大发展举措,符合统治者意愿的一种政治力量。在欧洲中世纪符合统治者意愿的政治权力是为上层贵族服务的宗教神学意识,无论是谁只要违背了神学的要求,就有可能被政治权力所左右、所限制。布鲁诺因赞同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于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科学家伽利略因天文观察证明了哥白尼学说而两次受审于宗教裁判所,这些都表现出政治权力的存在。

进入20世纪之后,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在西方国家,曾几何时政治权力表现得十分强大,一度成为学术自由的最大威胁。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曾要求大学教授宣誓对国家的忠诚。50年代,麦卡锡主义更是把美国反共浪潮推向顶峰,一场旨在清除共产主义思想威胁的运动在美国开展起来。为防止共产主义学说在大学讲坛上传播与渗透,州议会要求教师以“忠诚宣誓”的方式宣布他们在政治上的可靠,同时,教师从业和聘用的资格并非由专业同行来确定,而是由政治人物制定标准并加以决定,此时的美国,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

成为大学教师是否能够被录用的决定因素。如果大学教师和学校管理当局拒绝在“忠诚宣誓书”上签署自己的承诺,不理睬州政府和董事会提出的资格审查要求,将会遭受巨大的压力和惩罚,对教师来讲将处于被怀疑、被防范,随时被解聘的境地,对大学而言则意味着将会被疏远、被冷落,财政拨款被削减的局面。面对重压,到50年代末期,美国有32个州要求教师进行“忠诚宣誓”。“美国的大学已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组成部分,发挥着现代意义上的教会的职责,通过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护正统的社会秩序和对国家的忠诚。”^[3]可见,在西方大学中虽然没有一套类似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机构,但对大学的意识控制还是十分严格的。

(二)行政权力

尽管学校党委在大学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但具体事务的管理则需要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团队去贯彻执行。同党委获得权力的方式一样,行政权力也是扎根于上级职能部门正规权力的委托与授予,而且通过“科层制”的行政组织系统去延伸控制能力,突出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领导体系,在保证大学政令统一、有条不紊的工作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行政职能部门依然存在机构设置繁多、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效率不高,包得过多、运行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受“官本位”唯我独尊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行政人员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权力的主体所应尽的义务,以为作为管理者就是高人一等,没有意识到转变学校行政机关职能,树立“管理就是服务”思想理念的重要性。同时由于事务主义、自身经历和工作环境的影响,行政人员没有体会到知识增长逻辑与行政事务处理原则的不同,往往以行政命令、惩治不服、注重秩序等思维和方式处理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原本学校内部活动的主体教师与学生,却经常成为行政人员执行工作任务的对象,致使教师与学生不能享受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与思想自由。为此,要想恢复大学自由探究的本质属性,需要进一步调整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结构,确立大学行政管理者服从服务于学术权力的

观念,遏制行政权力的自我延伸与膨胀,赋予校内外各界人士更多地参与校务管理的机会与权力。

(三)学术权力

在改革开放之前行政规划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基本可以忽略,学术自由权也未能在大学学者中盛行。而中国学者引入“学术权力”概念,意图在于消解来自大学内部的膨胀式行政权力,改变以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大学管理尤其是学术事务的管理中基本无权的状况,避免行政权力在学术事务管理中无视学术发展独特规律情况的发生,使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拥有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力和决定权力。除此之外,高校作为传承知识、探究学术的阵地,学术权力也只有让学术人员或学术组织控制和掌握才能更好地履行高校的职责。大学教学、科研等活动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相关事务,如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知识、如何传授等等。这些事务的确定和处理就需要学术人员的介入,而不是管理人员的插手,显然,只有把这些事务交给最专业最具学术水平的群体,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力和决策结果。

再者,“学术权力”应带有普遍性和包容性,为所有大学教师群体所享有,而非个别群体特别是‘大牌教授’所掌控。“教授治校”在传统意义上,其权力主体内涵界定比较明确,指的是正教授群体,而现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权力实施主体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不是严格按照职称来划分的,不仅包括具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也包括讲师、助教在内的低级职称的教学科研人员。可见,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教授”并非局限于职称或职务认定上的教授,而是指道德和学术都能胜任的真正从事学术科研的群体,它更多是学术权威地位的象征和体现。只要青年学者、低级职称的群体能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就能够在学术事务中发表一定的言论和思想表述。同时,一些学术组织包括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也应吸纳青年教师参与。这样“学术权力”才具有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四)社会权力

社会的力量在大学围墙之外,那么就会产生疑问,社会权力到底是属于大学场域内的权力还是游

离于大学外部的权力?如果属于大学场域内的权力,那么在大学平时运作时其是否形影相随?很多学者在论述社会权力时都把大学与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权力属于外部权力,主要代表的是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主张虽有助于确定大学与外部系统之间的权力边界,但也造成大学与社会之间交互和联系并不紧密的状况,限制并影响着大学权力结构的重构与深度融合。那么如何正确认识社会权力的属性,这就涉及到,如何从大学场域这一视角上看待社会权力的归属问题?其实,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意指由各种位置所构成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空间或网络,如教育场域、经济场域和法律场域等。^[4]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场域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一个开放的和争夺的空间,这一空间包含着潜在的和活跃的各种力量,它们为了维护或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而相互争夺。^[5]在现代科学技术急剧发展的时代,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逐渐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这就要求大学与社会之间不断增强彼此之间的了解、交叉和融合,增强大学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教学内容与教学水平符合社会对人才和科技的需求。随着高校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能量互换活动的频繁,大学与社会的隔阂与藩篱正在消失,社会力量逐渐全方位地介入到高等教育和教学领域。

在美国,为与本土社会文化和经济现状相适合,美国大学的董事会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大学在实用主义指导下与外界社会交流较为频繁,虽然后来政府为保障大学经费来源的稳定加强了对大学的资助,但私立大学奉行自主办学方针,民间团体、工商界人士和社区是私立非营利高校的直接掌舵人。“由校外人员组成的董事会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来指导大学的长远规划与发展,其主要职责是确定本校的大政方针,选举校长,根据校长举荐任命教授和行政官员,审批长期规划,处理学校的财政等有关重大事宜。”^[6]可见,以社会权力为重要体现的董事会不仅成为美国大学权力中的一员,反而有些成为主宰大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学为了加强与社会外界的联系,在大学

内部成立了董事会。不可否认,现阶段的我国董事会进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关系没有理顺,董事会的约束力和权威性较弱。即便如此,但董事会所代表的校外力量毕竟参与到了学校的管理层面,对我国公办大学筹措办学经费、提高经营能力、加强与社会互动、扩大公共影响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总的来说,虽然大学的权力组合模式较为多样,但纵观世界高校,校级管理决策机构基本上形成了校长(行政管理机构)——教授会(审议)——包括外界人士在内的董事会(督导)分权制衡的权力模式。可见,以董事会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权力已成为学校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内在推动力量。

(五)学生权力

如果我们论述高校学生应具有很多权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一旦说高校学生拥有很多权力,这是引起质疑的。那么“学生权力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学生作为权力主体是否拥有某些优势社会价值?是否对权力客体具有惩罚权?”^[7]面对这些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分析、探讨并试图给出合理解答。

1. 学生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区别。当前,国内学者在论述学生权力时并没有注意区分权力与权利二者的本质内涵,常把二者概念相混淆。如把学校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学生知识需求等情况看成是学生权力,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学生权利的表述。尽管在内涵上,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有相似和相通的地方,但实际上,二者的实质涵义是不相同的。权利是指自然人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能与享受的利益,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拥有权利的人本身并没有惩罚或制裁他人的力量,其自身权益的维护只能通过社会的道德或法律来实现。而“权力是权力主体拥有优势社会价值而自然产生的对他人的制约力或影响力,”^[8]具有支配性和不可违抗性,如果权力客体不按照或者违背权利主体的意愿和指示行事,它将会受到命令发布者的惩罚或制裁。由此可见,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权力主体因为拥有某种优势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使得权力客体不得不依赖和服从他,权力主体具有对客体的支配能力。那么处于弱势方的学生,由于学校垄断着知识的供给,其对学校存在着严重的依

赖关系,但是否说明学生对学校一点制约和支配能力都没有吗?我们需要厘清学生拥有哪些显著的资源优势、价值优势对客体造成制约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论证学生作为权力实施的主体地位是否可以成立,以及这种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决策和大学内部权力运行路径的重构。

2. 学生权力的资源优势。学生权力的来源,不是来自专业知识占有方面的优势,也不是来自上级组织机构合法的授予,其来源和具有的影响力较为复杂和多元。首先,是资源性权力。学生自身就是资源,蕴含着一种权力的制约力量。学校组织要发展要运行需要大量的学生资源,如果缺乏学生资源,学校就不能生存。而学生素质越高,则意味着其越是学校必不可少或难以得到的资源个体,其资源属性也就越明显。在当今优质生源日益稀少且被重视的情况下,如果学生不选择某所高校或抛弃这所学校,从社会声望和社会认可角度来讲,是以自身投票的方式对这所学校办学质量的否定。其次,是团体或组织带来的权力。处于相对分散地位的学生个体对其他群体的制约、反作用力相对来讲比较微小,为了扩大影响和引发重视,学生权力一般都集中起来通过学生团体组织来行使,如校学生会、青年会等。这些组织站在学生立场上,代表学生群体反映对学校发展和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在增强学校与学生之间了解与改进学校工作等方面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国家法律的赋予或政府的让予。随着民主程度加深,政府意识到让学生参与学校相关事务管理与评议,这是学校民主办学和尊重学生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为此,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在学校董事会或评议会等决策机构,学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列席参加,具有参与提名和选举校长、表决规划纲要等诸多层面的权力。最后,成本分担的理论与实践不仅阐明了学生权力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也说明了学生权力具有制约能力的资源优势所在。“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大学生所缴纳的学杂费在高校办学经费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学生的学杂费已占公立高校办学经费的40%左右,在私立、民办高校学杂费几乎是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9]由此可见,高等教育

的公共服务属性逐渐淡化,而私人物品属性正在加强,从市场交易理论看,学生和家長成为办学的出资者和知识产品的购买者,而高校教师与行政人员则是提供者和服务者,师生地位与关系逆转,出资回报理论对扩大和加强学生权力提出了强烈的诉求和呼唤。

三、大学五种权力观的作用与意义

在中国传统教育集权的环境中,面对学术权力受到挤压,行政权力被滥用的境况,五种权力观的提出具有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打破党政权力垄断独大,管理体制僵化,而且对于实现权力运行多中心化,促进大学均衡发展都有现实的促进作用。

(一) 有利于促进大学均衡发展

融合论认为每种权力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如果没有局限性,那么另一方权力就无出现的必要,而一方权力的局限性恰恰造就了另一方权力合理存在土壤,其权力固有的不足和局限会得到另一种权力的补充和辅助。在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大学要健康运行必须有行政权力作为保证,但是当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时,会导致高教事业行政色彩和官本位思想进一步强化,阻碍学术权力、学生权力、社会权力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发挥。而当高校学术权力过于凸显时,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处于散漫无组织纪律的状态,同时也会把学校带回“象牙塔”的真空中,看不到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与需求。同样,“市场权力过于集中时,会导致高校的‘无政府’状态,出现各种市场‘寻租’行为,使高校发展偏离原本作为高深学问的本质轨道,迷失方向。”^[10]而学生由于自身经验和认识水平的制约,参与高校管理时往往带有冲动的理想色彩,在某些时候也需要其他人员的现实引导。所以高校每一团体“作为特定教育主体在渴望正当权力时,应该想到其他教育主体对权力的需要,自己单方面‘非法’的使用权力,就是遮蔽、剥夺相关主体的合法权力,自己要有效行使权力,就要尊重他人有否定自己不合法行使权力的权力。”^[11]否则,作为教育主体的任何一方都会丧失主体地位。而高等学校五种权力主体观的提出则有利于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监督,在平等互助的环境里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和表达方

式,进而促使大学均衡发展。

(二)有利于促进大学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大学要想避免或者改变目前某一种权力独大、独断专行的格局,那就必须改变学校内部权力设置结构,赋予大学场域内每一群体都有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权力,同时每个主体都有自身立场和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只有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使决策更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科学性。为此,大学管理上不仅需要对学校民主会议的参与成员、表决流程、协调原则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和合适的解释,而且还应对高校各个群体所拥有权力的大小进行合理的分配、平衡和协调,以期达到各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如果某个群体权力缺位或者在实际运行得不到保障,必然导致各种权力缺乏相互制衡和监督,从而易于引发强势政治、行政权力的泛滥和教师、学生等利益被侵害等现象,进而,教师和学生群体当家做主、主动参与管理的愿望就会落空。而五种权力主体观则避免了权力运行单一、决策片面的弊端,使权力能在多种主体之间分配、迁移,使学校决策方案、章程确定、制度改进都能体现各方代表的要求,进而起到平衡制约、相互监督的作用。如此久之,大学组织无形中就会形成与造就一种全员参与、民主讨论、相互促进的文化氛围与交流平台,大学事务会逐渐摆脱绝对权威中心的掌控,在尊重职工意见的环境和理念指导下运行,从而有利于激发全校教职工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与减少内部管理的磨擦和损耗,提升大学的决策水平与管理效能。

(三)有利于超越大学组织科层制的桎梏

科层制度无疑保证了行政效率,为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工作提供了服务与保障。但是科层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为科层制强调等级服从,组织成员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个性和创造性易于受到压抑,学术研究所珍视的勇于探索与不惧风险精神易于受到伤害。五种权力观把每个主体都提到平等的地位,在决策过程中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展开一种平等的对话,进行充分的意志表达。这里大学机关管理人员不再作为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而是利益共同体中平等的参与成员,高度专业化的

教师和民主参与意识强的学生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考核方式等领域获得了话语权和自主权,不同利益主体的合法权利得到兼顾,主体间更倾向于一种平等协商的关系。这样,为实现知识再生产、再传播的专业团队易于抛开政治强力因素的掣肘,成员在平等自愿的背景下对某一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学术原创性得到了最大保护。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寄希望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官员出面组建科研团队和永久性机构的做法,并不是一种适合知识增长逻辑的明智选择。在此,并非主张取消“科层制”,使大学处于“无组织”的状态,而是说不要过分倚重或夸大官僚科层体制的力量和作用。大学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要求超越科层制,实际情况也表明只有突破了等级森严的分层体系,才有利于破除大学内部的“行政本位”思想,使得决策中心向知识存在的方向转移,有利于建立起大学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 [1]张启鹏.我国大学权力结构的研究现状与提高策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
- [2]陈玉琨,戚业国.论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权力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1999(3).
- [3]李子江.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迁与发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7.
- [4]赵运林.大学场域中的权力形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3).
- [5]于忠海.合法性与再生产: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反思——布迪厄场域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09(5).
- [6]王超.西方大学的权力模式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42.
- [7]吴洪富.大学内部权力重构的路径与策略[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8(2).
- [8]林荣日.论高校内部权力[J].现代大学教育,2005(2).
- [9]曹薇.大学内部学生权力探析[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
- [10]阎飞龙.高等教育评价制度中的权力及其分配[J].教育研究,2012(4).
- [11]李福华.对高等学校学生权力的探讨——学生主体地位的政治学视角[J].教师教育研究,2004(3).

(责任编辑:郑芳)

全人教育理念下理工类高校通识课程研究*

王艺霖 李俊鹏

摘要:现代大学将通识课程作为全人教育的重要手段,对于理工类高校而言,意义尤甚。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传统理工类高校的通识课程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理工类高校应处理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课程的开设应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整合有限教育资源,加强通识核心课程建设,全面提高通识课程质量;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通识课程改革,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关键词:通识教育;理工类高校;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所谓全人教育,就是在健全学生人格的基础上,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个体所蕴藏的潜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的释放。简言之,全人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的“全人”。而通识教育,是指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全体学生范围内所普遍进行的关于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等内容的传授、个性品质的训练、公民意识的熏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所必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1]。它来自于学科互动和知识的整合,因此能够给学生提供丰富知识背景和广阔的理论视野,进而帮助学生实现人格完善。可以说,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目标实现的手段与途径。当前,国内各高校对于全人教育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通识教育的实践也有不同程度的探索,但是考察各高校通识教育的开展,理工类高校由于在通识教育方面存在学科、师资基础较为薄弱等问题,严重制

约了通识教育的发展,教育效果普遍弱于综合类高校。因此,理工类高校如要提高整体人才培养质量,必须根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一、通识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52所高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旨在通过文化知识、文化活动等形式,开阔学生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培养大学生成为“四有”人才。但是当时的这种文化素质教育一般是作为专业教育的有益补充,从内涵和外延来看与现在的通识教育都有很大不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各高校越来越意识到通识教育在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从教育理念到课程设计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但是通识教育也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存在,影响了通识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是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很多高校特

作者简介:王艺霖,女,四川绵阳人,西南交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研究(成都 611756);李俊鹏,男,辽宁丹东人,西南交通大学助教、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研究(成都 611756)。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立项项目(项目编号:CJF17035)研究成果之一。

别是理工类院校的通识教育并没有与专业教育取得平等的地位,通识教育没有成为全人教育的有效手段,而仅仅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是在专业课之外扩大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一种“甜点”。

二是通识课程学分不足。我国理工类专业的培养方案一般包括160-190个学分,大多由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大类与专业基础课程、专业与专业方向等模块课程组成,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一般为40个学分左右,但是其中思政类、军事类、外语类和体育类等课程就占约30个学分,学生真正可选的通识课学分只有6-16个学分,学分不足导致通识教育的目标难以完成。

三是对通识课程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理解不深。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课程仍以知识传授为主,并没有把课程所属学科的基础学术训练作为凝结课程的根本和纽带,因此任课教师常常困惑于是否应按照培养专业学生的方式上课,还是像选修课一样普及基础知识,课程的难易程度极难把握。

四是任课教师激励不足。虽然通识课程对于本科生是必修科目,事关全校各个教学单位,但是具体由哪个单位开设、由哪个老师开设无法明确规定,通识课程很容易成为教师自主自发承担的课程。同时由于单一教学单位都无法独立承担所有通识课,所以通识课程的组织一般都由学校教务部门负责,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往往不会得到各教学单位的支持和肯定。

五是课程质量参差不齐。通识课程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最初为了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大多数学校都是在短时间内开设了大量的通识课程,虽然经过层层筛选和把关,但是由于课程建设时间较短,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式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同时,由于课程数量众多,教务部门对课程的管理和监控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在课程质量保障方面也有很多不足。

二、通识课程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为了解理工类高校通识课程建设情况,解决通识课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针对通识教育的认识、通识课程设置与选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过程、学习效果等五个方面,设计了单选及多选题30个,以随堂

问卷的形式进行了抽样调查。

本次调查先后发放问卷4000份,累计回收3328份,其中有效问卷3179份,有效率为79.5%。被调查对象为大一学生,其中约78%为理工科学生,其他学科学生约占22%。

三、调查结果与主要问题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分析,可以从“对通识教育的认识”、“课程选修”、“教学过程”、“学习情况”、“学习效果”五个方面了解通识课程建设情况。

(一)对通识教育的认识

通识教育的根本并不在于知识形式意义上的一般教育,而更在于以何种方式去追求知识,也就是在不同知识领域中超越专门化知识诉求,而达至对整全性的追求^[2]。通识教育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理工类高校学生来说还比较陌生,大多数学生无法理解通识教育的意义,68%的学生表示“听说过,但了解不多”,26%的学生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一现象同样也存在于综合性大学,据某综合性大学调查显示,47.6%的同学表示不是很清楚什么是通识教育,37.92%的同学认为不知道、不了解什么是通识教育^[3]。但是经过大一学年通识课程教育之后,理工类高校学生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普遍提高,有68.8%的学生反映“通识教育有利于专业发展”,63.7%的学生认为,通识课程能够帮助其“了解其他学科知识,满足求知欲望”,说明通识教育已经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课程选修

通识教育涉及众多学科,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理工类高校学生认为他们选择通识课程的首要出发点是“兴趣”(68.7%),“历史、文化与人文情怀”(47.8%)和“艺术体验与审美修养”(47.4%)类课程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但是,调查也显示,希望在本科阶段选修三门以上通识课的学生仅占18.2%,希望少于三门的学生却达到了46.9%,反映出学生并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接受通识教育。

(三)教学过程

通过调查了解,大多数通识课程任课教师对提升课程教学质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83.5%的教

师开展过课堂研讨,87.4%的课程有写作或实践作业,75.4%的课程有课外阅读作业。同时,任课教师的付出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78.9%的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方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81.1%的学生对任课教师“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但是学生也普遍反映“通识课程的难度/挑战度”不高,认为“一般”和“比较容易”的学生达到74.6%,认为通识课程需要提高“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的学生为53.9%。

(四)学习情况

学习过程调查包括了课内学习及课外学习等几个方面。从调查问卷反映情况看,理工类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问题比较多。45%的学生有过缺勤情况,缺勤的主要原因为“遇到更重要的事”(67.6%),反映了学生重视程度不足。而综合性大学的缺勤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某综合性大学“课程进行到第三次课左右逃课的人数增多”^[4],许多教师只能采用点到的形式维持学生到课率。同时,理工类高校学生对于通识课程学习的投入度也不高。调查显示,在课堂上,64%的学生是“选择性听讲”,认为自己能够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仅有20.8%。在课外学习方面,有42%的学生课外没有学习活动,33%的学生每周投入的学习时间不足0.5小时。此外,有40.5%的学生在上课前有过没有完成学习任务的经历,其中8%的学生经常不完成学习任务。

(五)学习效果

总的来看,理工类高校学生对通识课程的学习效果较为满意,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学生达到了59.6%,而对自己学习投入度“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学生也达到53.5%,一方面说明了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生对于通识课程的自我期望值不高。关于通识课程的作用,30.3%的人认为对于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作用“比较大”,但是47.8%的人认为作用“一般”,说明通识课程对于部分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作用不大,没有达成明显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目的。

四、原因分析

纵观通识课程存在的各种问题,其原因纷繁复杂,但大体可从学校、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和分析。

(一)理工类高校的通识教育受制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

回顾理工类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虽然和国内其他综合类高校的起步时间相近,陆续开展了大类培养和通识教育,但是受制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和人才培养传统,理工类高校注重专业教育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通识教育仅仅作为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同时,通识课程基本被设置为选修课,课程质量普遍不高。后来随着对通识教育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入,各校纷纷重构通识教育体系,并将通识教育作为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理工类高校普遍担心通识课程会挤占专业课程学分,造成专业教育质量下降,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也存在着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的思想。

另一方面,对于多数理工类高校来说,有限的教育资源也严重制约了通识教育的发展。通识课程需要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课,对师资数量和水平、教室容量和数量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理工类高校缺少人文社科类学科支撑及师资储备,造成通识课程授课质量不高。同时在师资与教室不足的情况下,学校为满足庞大的学生选课需求,往往以大班授课为主,教师开展的很多教学方法尝试都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并且通识课程大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错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这也成为学生不重视通识课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任课教师受制于知识结构和教学经验的制约

目前的通识课程任课教师大多是在专业教育的熏陶下成才起来的,自身并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他们对通识教育理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同时,部分任课教师对通识课程的知识储备不足,知识结构较为单一,缺少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使得课程建设无法达到“通识”的要求。同时很多学校由于缺少通识课程相关学科的支撑,教师仅凭自身兴趣进行探索与研究,很难建立起促进通识课程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识课程的开设,既需要任课教师努力提高理论水平,也需要他们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根据调查显示,通识课程任课教师大多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进行了课堂研讨、课外阅读、写作训练等多种教学尝试,学生对于教师们的付出也较为认可,但是从学生学习效果等方面来看,目前的通识课程还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要求。并且大多数学校通识课程的建设标准和评价标准都表述的较为模糊甚至缺失,教师也无法清晰地了解通识课程建设的方向和应达到的水平。

(三)学生受制于认知程度和认知偏差的制约

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后,对通识教育的概念知之甚少,调查问卷中“了解不多”和“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学生比例高达94%就说明了这一现状,而且很多学校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以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并没有向学生解释清楚,或者解释也仅停留在概念辨析上,无法和实际课程相呼应,导致学生不能从课程学习中体会到通识教育能够“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5]。同时,理工类高校的通识课程学分普遍设置较少,并且大多数课程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使得学生很容易将通识课程与其他选修课相混淆,大多数学生只是把通识课当成专业课外培养兴趣、扩大知识面的课程,这种认知的偏差造成了学生对于通识课程的轻视,使得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投入不足,这一点可以从调查问卷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来。

五、建议与对策

通识教育在国内的发展时间较短,缺少较为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各个学校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对于理工类高校而言,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下,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通识教育模式。

(一)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课程的开设应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争论一直是高校撇不开的话题,但是如果从工程专业认证的角度来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其实并不是一对矛盾体。工程专业认证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产出导向(Outcome),也就是说教什么不是根本目的,学生能够学到什么、获得什么能力才是高等教育追

求的目标。在这种工程专业认证思想的指引下,人才培养首先需要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并将这些目标转换成具体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要与这些知识、能力与素质一一对应。通识课程作为培养方案的重要内容,也需要与这些知识、能力、素质对应起来,成为达成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有效手段。

“华盛顿协议”对毕业生素质提出了12条标准,包括“在工程科学知识、问题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与发展、信息检索与调研、现代工具的应用、个人工作及在团体中工作、交流能力、职业道德、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工程与金融领域的管理、终身学习、在工程实践中相关的责任等12个方面”^[6]。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根据“华盛顿协议”,将毕业要求修订完善到现行的12条^[7]。

这些要求的达成与实现,不仅需要通识教育作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2015版)

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研究
使用现代工具	工程与社会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
个人和团队	沟通
项目管理	终身学习

为基础,同时也需要经过专业教育的培养,缺一不可。所以通识课程的开设应以专业认证要求为指引,并将其作为自身在培养方案中存在的根本依据。

(二)加强通识核心课程建设,全面提高通识课程质量

理工类高校通识课程建设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提高通识课程质量。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需要学校整合优质资源,构建通识核心课程。之所以称之为核心课程,一是希望这类课程能够成为培养学生通识知识、能力、素质的基础和核心,二是希望它们能够给其他课程当作模板和标杆。通识核心课程的开设,既有利于集中优质师资开出高水平课程,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选课需

求。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通识核心课程首先应做好顶层规划,按学科构建大类模块,明确模块所属课程;其次要狠抓课程内容建设,注重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并重,鼓励学生阅读原典原著,通过课程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第三要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鼓励教师紧跟时代潮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探索多种新型教学模式;第四要加强课程质量跟踪监控,建立完善的课程评价机制。

鉴于理工类高校大多仍将理工学科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战略,也不想将资源过多投入到其他学科建设中去,那么理工类高校通识课程的任课教师就应该着重从现有师资中筛选和培养,通过教师能力提高和组建课程教学团队等多种手段,使他们成为通识课程授课的主力军;在此基础上,根据通识核心课程的需要,可适度引进高水平师资力量,使他们成为通识核心课程的领军人物,并通过他们带动其他通识课程质量整体提高。

(三)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近年来传统的以知识讲授为主的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学生学习效率也不高。美国学者L·迪·芬克认为,这是由于教师并没有为学生创造出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造成的,“许多大学教师似乎没有将超越理解—记忆型学习的教学目标纳入其教学”,“大多数教师似乎不明白除了他们一直沿用的讲解和主题讨论外,还有哪些教学活动可供使用”^[8]。通识课程作为启迪智慧、开发潜能的重要手段,更不应该陷入知识讲授的窠臼。

那么,如何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呢?美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查克林和加姆森在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提出了本科教育阶段

有效教学七项原则,即鼓励学生与教师接触、鼓励学生间的合作、鼓励主动学习、及时反馈、强调主动学习、表达高期望、尊重多才多艺和多种学习方法^[9]。这些原则对通识课程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遵照这七项原则,可以使通识课程的教学范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教学的重心不再是教,而应该是学;教学的目标不是传授了多少知识,而是是否实现了教学效果;教师也不再是具体知识的讲解者,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领路人,等等。这一范式的转变,促进了“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达成,对提高通识课程质量,培养学生通识知识、能力与素质,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王益宇.论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出发点[J].中国高教研究,2008(10):84-85.
- [2]刘铁芳.大学通识教育的意蕴及其可能性[J].高等教育研究,2012(7):1-5.
- [3][4]陈蕊.综合性大学本科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现状的调查研究[5]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5.
- [6]王玲,雷环.《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的工程教育认证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5):88-92.
- [7]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印发《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15版)》的通知[EB/OL].2015-3-10,http://cn.ceeaa.org.cn/news.php?news_id=133.
- [8][美]L·迪·芬克.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M].胡美馨,刘颖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vii.
- [9]张继华.美国大学教育七条原则与我国大学教学质量[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5):75-77.

(责任编辑:郑芳)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观评析

程 伟

摘 要: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是高等教育学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通过历史梳理和现实观察,以高深学问为逻辑基点,提出高等教育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两种主要哲学。布氏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并不完整,其观点从根本上忽视了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本源基础,即人的发展需要,客观上可能造成高等教育忽视人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还容易导致片面的理性主义思潮泛化。为此,须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作为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本源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弥补布氏的理论缺陷,在现实中才能真正避免高等教育陷入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合法性

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是高等教育学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美国当代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这本著名学术专著中,对该问题作过深入的哲学思考,其观点备受我国学术界重视。据研究,被引用次数位居全书八个主题之首^[1]。可见该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布氏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在某些方面存有缺陷。因此,有必要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作一解读和评析。

一、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的解读

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cy),按照中文语义,即高等教育存在的正当性或合理性。换言之,就是高等教育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是以满足历史时期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合法地位的”。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先后呈现出获得各自合法地位的不同方式。中世纪的大学由于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专业(Profession)工作的期望而

获得了合法地位。文艺复兴后的大学是以人文主义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这里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英国式的大学是以发展自由教育观念作为合法地位确立的依据;二是德国式的大学是以科学研究作为合法地位确立的依据;三是美国的“赠地”大学是将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作为合法性的依据。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历史上获取合法性的依据和方式,虽然在同时期、不同国家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尽相同,但是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则继承了上述传统。^[2]

但问题是,社会和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是多样的,那么大学能否满足所有这些不同的需要,什么样的需要是人们的永恒需要,即什么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对此,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不同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逐渐激化。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

作者简介:程伟,男,河南商水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天津300354)

战争和少数民族学生争取人权运动等社会问题,使得美国社会和职业界开始对高等教育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大学的一些做法产生怀疑,高等教育出现了“合法性的危机”和“本体危机”。面对美国高等教育各种危机,布鲁贝克开始思考高等教育本体功能及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布氏认为高等教育不同于低层次教育,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关注的主题不同。高等教育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是区别与低层次教育和其他教育类型的关键。布氏甚至认为所谓“高深学问”,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只是程度的不同,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由于过于突出,以至于高等教育接近一种不同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性质。^[3]这就是说,布氏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性,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初等和中等以及各种类型教育的主要依据,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逻辑基点。故此,布氏在《高等教育哲学》第一章一开始就从大学传递、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入手,认为大学的首要职能是完成上述任务。大学确立它的合法地位也主要在于对高深学问的追求,只不过是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坚持追求真理的原则还是坚持社会需求的原则,这就存在确立大学地位的两种主要途径,即有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很大程度上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另一种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5]。

以认识论作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人,趋向于把知识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其内在动机的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比如,美国数学家维布伦(Veblen)就认为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以闲逸的好奇追求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了,人们越来越强调精确的验证和探究知识。这就要求在追求知识时,要绝对忠实客观事实,并且尽力排除所有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影响,达到德国大学所称为的价值自由(wertfreiheit)。以政治论作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人,认为探讨深奥知识不能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的深远影响。因为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高等教育还需要在理解和解决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方面发

挥作用。因此,大学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必然受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那么当大学卷入社会日常生活的时候,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确定目标,怎样行使权力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按照胡克(Hook)的观点,高等教育自然就具有了政治性。^[6]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具有政治性,并将之作为确定合法地位的基础用不着大惊小怪,他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些伟大教育哲学家都是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看待的。^[7]

由上述分析可知,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为逻辑基点,认为高等教育探讨深奥知识满足了人们探究真理的需要和为社会(国家或民族)发展服务的需要,此两种需要即所谓的认识论和政治论是高等教育合法化存在的主要哲学基础。

二、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的评析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的论断,是在诸多高等教育哲学流派观点基础上高度抽象后的概括与总结。可以说是目前对此问题论述最为深入系统者。他的观点无疑为我们认识和分析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对当前高等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发展仍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布氏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就其论断而言,并不能涵盖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合法性。这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因素的存在,即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存在的本源性基础——人的发展需要,只考虑到高等教育通过研究高深学问来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和为社会和国家发展服务的需要。由此也无法解释美国20世纪60年和70年代出现高等教育“本体性危机”和“合法危机”的现象。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导言中开篇便讲到,美国高等教育最近数十年一直处在“艰难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少数民族学生多次发生人权运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学生对大学为军事工业联合体服务发出质疑;一些学生基于反对越南战争的需要,提出大学应该放弃政治中立的态度,采取反战的立场;还有一些学生基于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问题,提出诸如“谁应该进入大

学,多少人进入大学”等非常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从未发生过,以往“学生们对伙食、住宿等问题曾有多次抱怨,但是在最近数十年中,学生集中抨击的是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这些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在越南战争时期被学生而不是教授首先提出,使当时的人们普遍感到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合法性。^[8]

从上述对大学的各种指摘和抱怨中,可以看出更多是学生对大学的不满,抱怨更多的是大学过多参与和服务性事务以及对政治中立的态度,而对学生自身的多种需要没有满足,以至于出现了霍奇金森(H.I.Hodgkinson)、布洛依(M.B.Bloy)和霍夫曼(S.Hoffman)所指出的高等教育“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问题。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还主要在于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学生发展的需要。这恰是布鲁贝克所忽视的,他主要看到了高等教育通过高深知识的探究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以及由此服务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即注重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在高等教育合法存在中的作用,由此可能导致两点不良后果。

其一,容易导致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向上崇尚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从而忽视人本位。我们知道大学首先是一个育人机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说过,大学中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目的应该是为塑造整全的人服务的,是为了实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9]因此高等教育首先要面向人,应以活生生的人为其唯一出发点,教育必须是人本位的,而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观则是强调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即强调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两种基本职能,而忽视或没有充分重视大学人才培养的职能。实际上是忽视了人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与作用,显得过于重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文化功能了,所以说其论断具有片面性。

其二,容易导致片面的理性主义思潮泛化。布鲁贝克所确定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实质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把科学理性和实用理性作为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然而,正如当时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合法存

在的政治论和认识论都局限于理性观念的范围之内,而没有涉及通过感觉、心灵或精神去探讨真理的非理性方法。”^[10]虽然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谈到非理性在探讨真理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这些并不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哲学基础。他这种观点显然容易在高等教育实践中造成忽视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发展、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客观上会造成人文教育被放在次要位置。“世界范围内人文教育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完整地把握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理性成了唯一和全部”。^[11]

那么为什么布鲁贝克会忽视高等教育合法存在本源基础,即人发展的需要呢?这主要源于他片面地夸大了高等教育的独特性,认为高等教育处于教育体系的最上层,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以至于它成为一种与初等和中等教育不同性质的教育类型,由此将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定位于探究高深的学问^[12],没有认识到一切类型和层次的教育其本体功能都是对人的作用,教育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都在于培养人,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如果忽视教育的人本位的价值取向,那么大学就和一般的非教育机构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完全有可能被其它机构所替代。英国教育家纽曼(J.H.Newman)在论述大学的目的是时早就指出:“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13]诚然纽曼的观点或许有些绝对化了,不过从侧面说明了教育的本体功能的重要性。其实布鲁贝克也没有完全不重视人,而是说他所重视的是人求知的需要,并没有关注到人的心灵、精神和身体等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说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不是无效的,而是说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是不完全有效的,因为他忽略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区别于到目前为止任何非教育机构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正是因为坚持其存在的本源基础,满足了人的发展需要,即哈佛大学前校长洛威尔说是“人们的永恒需要”,大学的存在时间才得以超过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才能“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经受得住了

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14]。

三、结语与启示

综上所述,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为逻辑基点,将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主要归结于满足人们探究知识并服务于社会(国家或民族)的需要,客观地讲,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并不完整,无法涵盖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合法性,因为他从根本上忽视了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本源基础,即人的发展需要,客观上可能会造成忽视人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不过通过对布氏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的解读与评析,从中可以得出两点有益的启示。第一,高等教育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己任,以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不断探求真理和有价值的知识得出“不受价值影响”(value-free)的结论,并以此对现代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发挥作用,仍然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哲学基础,也是今天的高等教育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对我们今天高等教育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合法存在的本源基础根本在于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因此,在现实中高等教育应努力满足人的发展特别是学生的发展需要,把学生放在高等教育的中心位置,大学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如此,高等教育才可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大学才可能永久合法地存在和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 [1]宋娜娜.汉语语境中的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于CSSCI(1998-2010年)论文引用的解读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12(5):21.
- [2][3][5]Brubacher,J.S.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M].London:Jossey-Bass Limited,1982.3-4,2-3,12-13.
- [4][7][8][10][14]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9,14-15,1-2,28,30.
- [6]Hook,S.Heresy,Yes:conspiracy,No[M].New York:Day. 1953.170.
- [9]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想[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2.
- [11]李福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新探——兼评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12):27.
- [12]张晓冬,梁亚琴.为大学探究“高深学问”的本体功能辩护——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写作目的及其分析框架解析[J].煤炭高等教育,2011(9):16.
- [13]Newnen,J.H.C.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27.3.

(责任编辑:郑芳)

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分析

——基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数据

童顺平

摘要:使用“引证分析法”基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2016年数据,可对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学术影响力进行全面检视。检索、分析结果表明,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比前4年表现好,出现了一批影响力较高的基金、作者、机构、地域和研究主题。但是存在学术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学科内部,对其他学科影响较小等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引证分析法;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界出现了一种良好现象,即每年都有研究者或机构采用一定研究方法或借助一定研究工具,对过去一年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和评述。2016年也不例外。《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1]基于18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3434篇论文,对2016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从院校分布情况、作者队伍情况、或基金支助情况、研究热点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周详、刘植萌、刘乙江^[2]以《2016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选定的18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3434篇论文为统计依据,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行动者从个体、活跃作者比较分析、硕博士和博士后发文、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崔鹤、王丹^[3]基于2016年18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合著文献分析,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个体、机构及地域科研合作情况进行了研究;别敦荣、王严淞^[4]以CiteSpace

为分析工具对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及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综述。应该说,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把握和反思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状况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囿于研究方法和工具,这些研究可以对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某方面或某几方面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很难对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学术影响力^①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本文使用“引证分析法”基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2016年数据检索分析,试图对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学术影响力进行全面检视。

二、本文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引证分析法”。“引证分析法”(Citation Analysis)又称为“引文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中用于分析学术研究影响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所谓“引证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与被

作者简介:童顺平,男,甘肃礼县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台湾高等教育(厦门 361005)

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5]由于受制于某些影响因素,不可否认“引证分析法”在分析学术影响力时会表现出一定的非人为的局限性,但是该方法广泛应用于学科、机构、作者、期刊、区域等学术研究影响力的评价中,总体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用来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

本文分析工具是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有关数据分析器。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是“中国知网”的重要服务产品之一,于2015年3月正式对外发布,是以“CNKI”源数据库文献的参考文献和注释等为信息对象建立的具有特殊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文献类型全面,引文数据链接正确率不低于99.97%,随带有“学科分析器”“作者分析器”“机构分析器”“期刊分析器”“基金分析器”“地域分析器”“出版社分析器”等7个数据分析器,能全面、有效、便捷地对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有关数据做出检索。

为保持分析的原汁原味性,本文使用引证分析法时主要采用的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有关数据分析器中的数据和图表。本文检索路径与条件为:进入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先选择“高级检索”,再选择“数据分析器”进入“学科分析器”;一级学科设置为“社会科学Ⅱ辑”,二级学科设置为“高等教育”,出版时间设置为2016年,期刊库设为“全部期刊”;根据需要选择左侧标签进行分析便可得本文数据、图表。检索日期为:2017年5月3日。

三、高等教育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分析

(一)高等教育发文量与被引用情况

由图1可知,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总共发表论文139955篇,其中基金文献61890篇,基金文献占发文总数的44.22%。由表1可知,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文献总共被引量为231424次,篇均被引量为1.65;2015年高等教育发文量为137039篇,基金发文量为56921篇,被引量为162480次,基金文献占发文总数的41.53%,篇均被引量为1.18;2014年高等教育发文量为128884篇,基金发文量为49630篇,被引量为95017次,基金文献占发文总数的38.50%,篇均被引量为0.73;2013年高等教育发文量为118532篇,基金发

量为41777篇,被引量为44446次,基金文献占发文总数的35.24%,篇均被引量为0.37;2012年高等教育发文量为99990篇,基金发文量为31130篇,被引量为7176次,基金文献占发文总数的31.31%,篇均被引量为0.07。比较而言,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基金文献占发文总数之比、篇均被引量均比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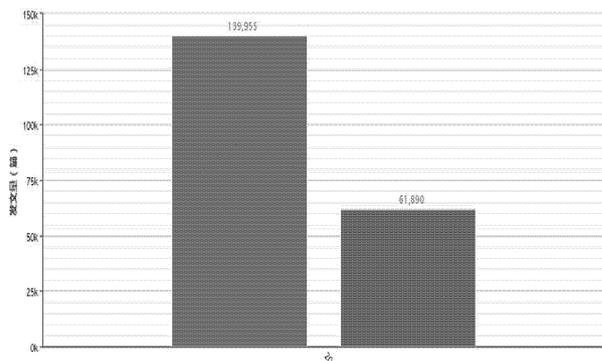


图1 高等教育研究发文量(蓝色)和基金文献量(红色)

表1 2012-2016年高等教育基金
发文量、发文量与被引量

序号	年	基金发文量	发文量	被引量
1	2016	61890	139955	231424
2	2015	56921	137039	162480
3	2014	49630	128884	95017
4	2013	41777	118532	44446
5	2012	31130	99990	7176

(二)高等教育引用与被引用学科情况

从图2看,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引用以高等教育学科内引用为主。比较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引用最高的为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引用43250次;其次为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引用36588次;再次为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机应用,引用17900次。引用较多的还有职业教育、音乐舞蹈、新闻与传媒、数学等。这说明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受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机应用等的影响最大。

从图3看,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高等教育本身,被引频次达15568次,说明高等教育研究“圈内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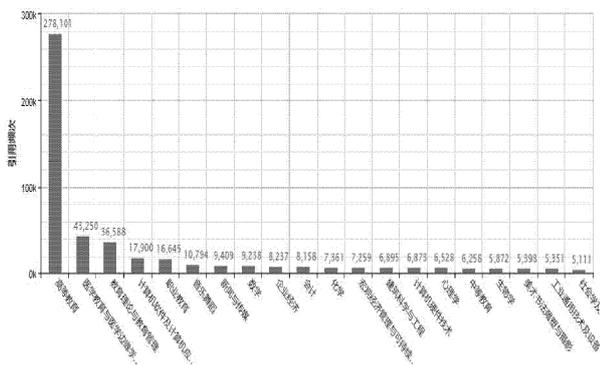


图2 高等教育研究引用学科排名(部分)

占绝大部分。就学科外部而言,高等教育被引频次最多的是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被引频次为2447次;其次是职业教育,被引频次为1976次;再次是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被引频次为1027次。但是,将图3与图2对比可以发现,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引用其他学科文献的频次都大于这些学科引用高等教育研究文献的频次,这说明高等教育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比这些学科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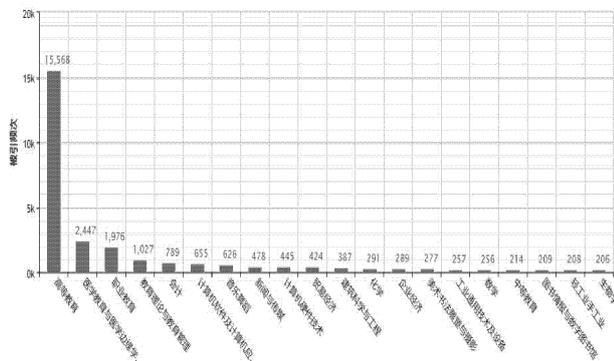


图3 高等教育文献被引用学科排名(部分)

(三) 高等教育研究基金发文与被引情况

从图4看,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学科基金发文量位列三甲,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文1485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发文1056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学科基金发文812篇。此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发文量为567篇,居第4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发文量为103篇,居第10位;国家留学基金发文量为81篇,居第12位。总体而言,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家级基金项目仍为“主要力量”。省级基金

项目中发文表现最佳的为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学科基金,其次为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再次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陕西省教委基金、浙江省教委科研基金发文表现也较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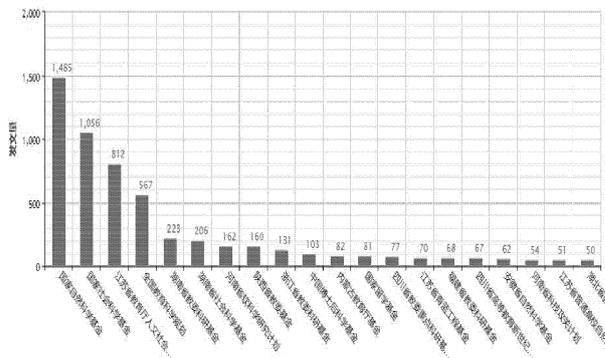


图4 高等教育基金文献发文排名(部分)

从图5看,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文献被引频次为327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献被引频次为299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文献被引频次为155次,分别位列三甲。省级基金项目被引频次最高的是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学科基金,其次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再次为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就被引居前的基金篇均被引频次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0.28,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为0.27,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学科基金为0.15,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为0.25,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为0.27,湖南省教委科研为0.14,比较而言,表现较佳的国家级基金项目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地方基金项目为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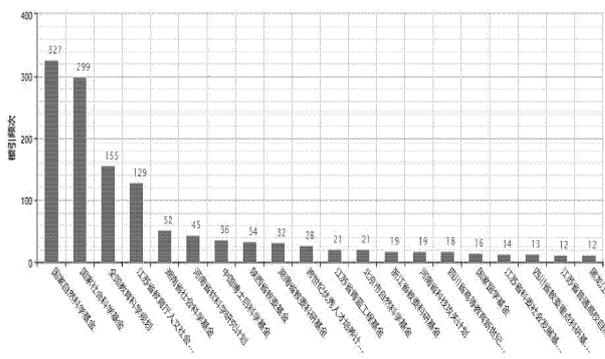


图5 高等教育基金文献被引排名(部分)

(四) 高等教育研究作者发文量与被引情况

从图6看,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发文最多的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唐博、桂林理工大学梁军,两人均发文21篇;其次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刘声超,发文18篇;再次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康晓丹、绥化学院梁广东、哈尔滨商业大学孙岩,三人均发文17篇。此外,长春工程学院石蕊、教育部张力玮、塔里木大学王宪磊、北京林业大学铁铮发文也较多,均达16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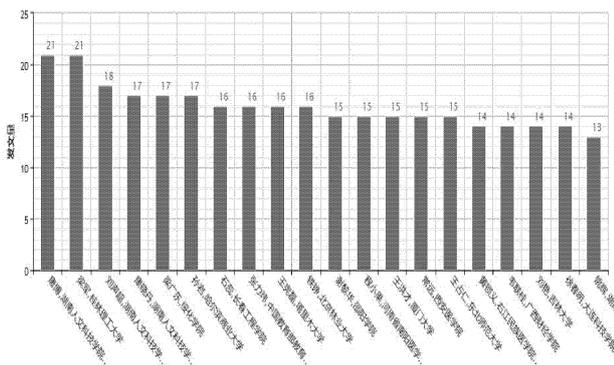


图6 高等教育作者发文排名(部分)

从图7看,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被引量最高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光礼,被引量达54次;其次是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占仁,被引量达47次;再次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姜朝晖,被引量达44次。此外,西安交通大学郝凯冰、郭菊娥、张旭被引量也较高,分别达37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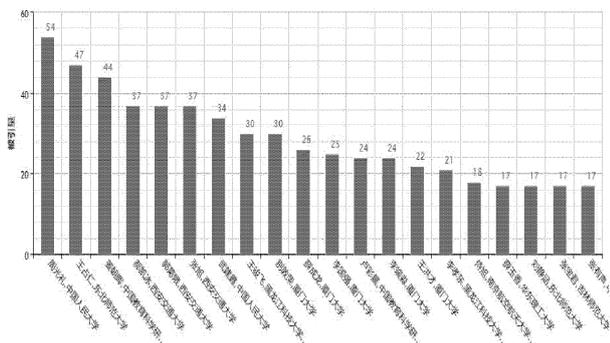


图7 高等教育研究作者被引排名(部分)

(五)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文与被引情况

从图8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吉林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发文量位列三甲,其中吉林大学发文

794篇,武汉大学发文631篇,郑州大学发文536篇。此外,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苏州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发文也较多,均在400篇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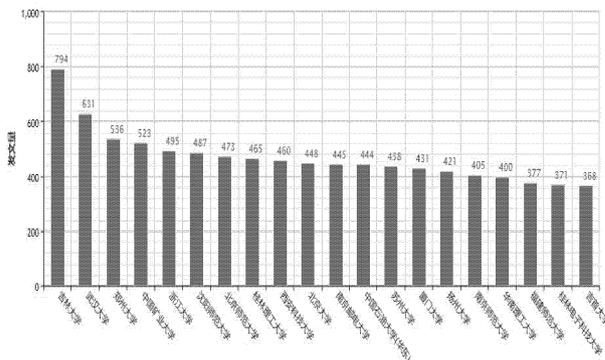


图8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文量排名(部分)

从图9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厦门大学,被引频次为229次;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被引频次为159次;再次为吉林大学,被引频次为153次。此外,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被引频次也较高,均在100次以上。就被引前十机构篇均被引频次而言,厦门大学为0.53,中国人民大学(发文量是279篇)为0.56,吉林大学为0.19,东北师范大学(发文量是342篇)为0.39,武汉大学为0.21,北京大学为0.28,北京师范大学为0.23,中国矿业大学为0.20,北京理工大学(发文量是302篇)为0.34,浙江大学为0.20,相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表现为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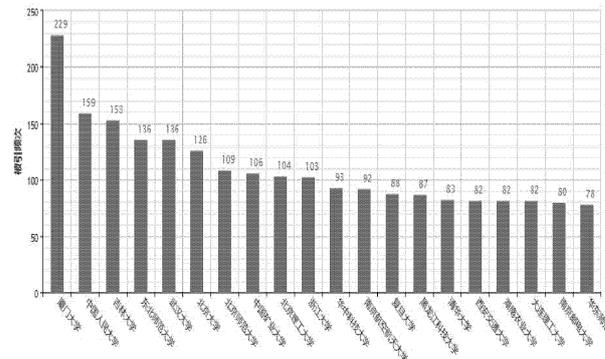


图9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引排名(部分)

(六)地域发文量与被引情况

从图11看,从高等教育研究地域看,江苏发文11902篇,雄踞榜首;北京发文7675篇,居第二位;辽宁发文7130篇,居第三位。此外,河南、湖南、广东、陕西、湖北、吉林等发文也较多,均在5000篇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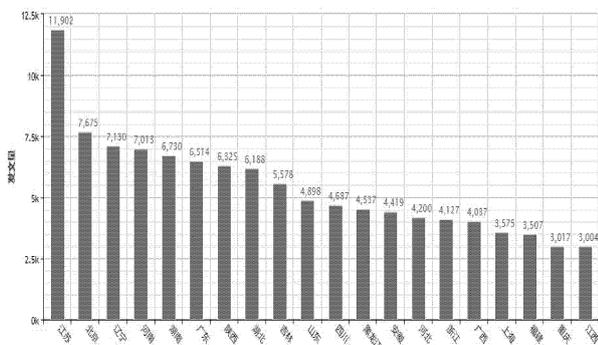


图10 高等教育地域发文排名(部分)

从图12看,高等教育研究地域被引频次最高的是江苏,被引频次为1848次;其次是北京,被引频次为1826次;再次为辽宁,被引频次为1164次。此外,广东、河南、湖南、湖北等被引频次也较高,均在1000次以上。就被引居前地域篇均被引频次而言,江苏为0.15,北京为0.23,辽宁为0.16,广东为0.17,河南为0.15,湖南为0.16,湖北为0.16,相比较北京表现较为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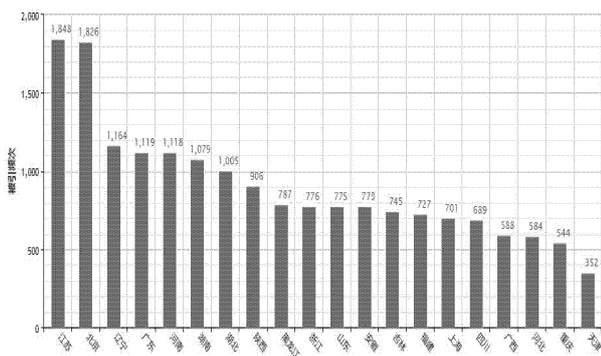


图11 高等教育地域被引排名(部分)

(七)高等教育H指数

H指数是分析学术影响力的一种评价指标,200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家J.E.Hirsch提出。Hirsch将h指数定义为:“一个科学家的分值为h,当且仅当在他/她发表的 N_p 篇论文中

有h篇论文每篇获得了不少于h次的引文数,科学家剩下的 (N_p-h) 篇论文中每篇论文的引文数都小于h次”。^[6]通俗地说,所谓H指数就是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频次的交叉点。“h指数的初衷是为了衡量研究者的个人学术成就,但h指数并非只限于评价个人,也可以评价一个科研团队、一种学科或一所大学、一种学术期刊、一个地区或国家等群体。”^[7]毋庸置疑,h指数也是用于分析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的有效评价指标。

从图13看,2016年高等教育H指数为13,即在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中至多有13篇论文被至少引用了13次,换言之,就是说有13篇论文(见表2)在2016年影响力较为突出,被至少引用了13次。这13篇论文中,张旭、郭菊娥、郝凯冰三人刊发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论文《高等教育“供给侧”综合改革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姜朝晖刊发于《重庆高教研究》的论文《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影响力最大,被引频次为40次;周光礼、武建鑫刊发于《中国高教研究》的论文《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次之,被引频次为25次;薛成龙、卢彩晨、李端森三人刊发于《中国高教研究》的论文《“十二五”期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回顾与思考——基于〈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的分析》再次之,被引频次为24次。从表2还可知,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主题为“供给侧改革”、“创新创业”、“一流学科”、“互联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其中,“供给侧改革”、“创新创业”与“一流学科”可以说是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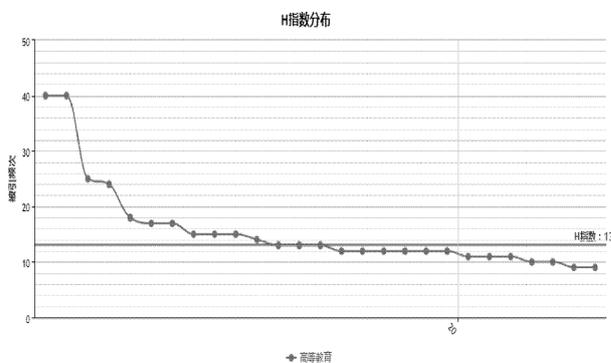


图12 高等教育H指数

表2 2016年高等教育H指数论文题目

序号	题 名	被引频次
1	高等教育“供给侧”综合改革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40
2	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	40
3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	25
4	“十二五”期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回顾与思考——基于《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的分析	24
5	从供给侧改革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思路	18
6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微载体探究	17
7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研究	17
8	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	15
9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成效、问题与展望	15
10	众创背景下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15
11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	14
1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慕课热”以后的“冷思考”	13
13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校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研究	13

四、结论

综观上述检索与分析,我们可以如下基本结论:

1.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比前4年表现好,出现了一批影响力较高的基金、作者、机构、地域和研究主题。

2.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学科内部,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

[1]《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2016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基于18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统计[J].中国高教研究,2017(4):30.

[2]周详,刘植萌,刘乙江.行动者的异动:2016年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与机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4):37.

[3]崔鹤,王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个体、机构及地域科研合作情况研究——基于2016年18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合著文献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4):48.

[4]别敦荣,王严淞.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述评[J].高校教育管理,2017(2):107.

[5]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九)第九讲文献信息引证规律和引文分析法[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3):236.

[6][7]Hirsch JE.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5 (46):16569、16572.

(责任编辑:郑芳)

近代教育家盛宣怀师范教育思想探析

吴洪成 王雪迪

摘要: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高度重视新式人才的培养,认为培养新型师资为兴学之要。他首创近代师范教育机构,在教师培养的目标、内容、组织管理及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创见的主张。从而使其师范教育思想在时代先进性的同时,具有较高的教育学术研究价值,并对当代教师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盛宣怀;近代教育家;近代教育;师范教育;南洋公学师范院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蓀,号愚斋,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学以致用为主旨为取向,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1865年,后为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1897年,后为上海交通大学)两所著名学校,均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排头兵。前者是中国近代早期高等教育的代表,后者将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融为一体,率先实施了近代三级学制,并培养了中国近代基础教育的新型师资,成为我国早期学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教师问题始终是盛宣怀办学活动中所关注的重要论题,也因此包涵了其丰富的师范教育思想。本文拟对此加以初步探讨,以弥补学界有关论述的薄弱,并有助于加深近代师范教育理论的认识。

一、倡导师范教育

盛宣怀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源于他的人才思想,但最重要的根源还在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对教育改革的强烈诉求。在创办洋务实业之时,正值国家受辱、外族入侵、民族危机严峻的历史关头,所经历的

近代社会深创巨变使他越来越认识到人才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关键。而想要培养社会亟需的新式人才,创办新式学堂,就必须从建立师范教育入手,从而奠定了其师范教育思想的现实基础。

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大抵都带有救亡图存的色彩,强烈的政治诉求使教育赋有了富国强兵的历史使命。盛宣怀作为当时清政府官僚资本体系下的实业家,同时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实践者,其教育思想是在不断探索稳定社会秩序、求强求富的道路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他主张教育自强论,认为中国要想实现求强求富的目标,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广兴学校。“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法”;⁽¹⁾“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²⁾又多次提出“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不难于集资,难于得人”⁽³⁾等人才救国思想。

人才的培养必赖于学堂的普兴。盛宣怀清晰地意识到西方的强盛源于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自强万端非人莫任”所以“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⁴⁾“学校

作者简介:吴洪成,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教育学原理(保定 071002);王雪迪,女,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保定 071002)

为人才之所出,人才为富强之本源。”⁽⁵⁾他更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其根本在于重视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方,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几十余年,灿然大备。”而中国的教育依然仅限于诗词歌赋之中,缺乏对新式人才的培养意识及任用机制,“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掣长补短,断乎不能。”因此,他呼吁建立新式学校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而“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⁶⁾盛宣怀对本国新型实用人才的培养有一种惟恐迟暮而影响战略全局的急切心情。培育新型人才,兴办新式学堂,必然对师资的需求量极大,这也决定了师范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盛宣怀又从对我国传统教育不重视师资养成,缺乏教育方法,以致教育效果低下的角度阐述了创办师范教育、培育新型师资的重要性:“中国民间子弟读书,往往至十四五岁,文理尤不能通顺,皆由教不得法,故学亦无效。此等子弟虽入中学,仍须从事小学功夫,久费年力,岁不我与,欲求深造,常苦老大。”⁽⁷⁾传统教育模式耗时久且成效差,常常是事倍功半,不管是从培养时间上还是人才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建立近代新式教育体制,培育新型师资。故此他提出“师道立则善人多,故学堂必探源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学程必植基于小学。”⁽⁸⁾的教育论断。也就是说学必有师,只有创办师范教育,培养新型师资,才能使新式学堂名副其实,进而达到培养新式人才的目的。在19世纪末师范教育仍处在萌芽阶段的状况下,盛宣怀能够初步建构师范教育的概念,并从教育的根源上论述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足见他在教育领域的高瞻远瞩。盛宣怀的师范教育思想可谓近代师范教育的宝贵资源,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

倡导师范教育为数不多的领头人之一。

二、首创师范教育机构

基于上述师范教育作用的基本认识,盛宣怀参照西方列强、日本的教育制度,并充分考虑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于1897年在南洋公学内率先成立师范院和相当于附属小学性质的外院,着手造就新型师资,并且从初等教育入手,循序渐进培养人才。南洋公学师范院学制为3年,招收学生40名,为外院、中院甚至上院培养师资。南洋公学师范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教育机构,标志着现代早期师范教育的发端。

南洋公学师范院在其教学程度、师范特性和管理等方面与后来的师范学校相比,无疑具有着诸多的不足,但作为中国第一所师范教育机构,它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南洋公学的发展而言,师范院的设立的目的就是为外、中两院,乃至上院培养师资,“上中两院之教习,皆出于师范院,则驾轻就熟,轨辙不虑其纷歧”。⁽⁹⁾也就是说,师范院培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充当了南洋公学的教师,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洋公学办学过程中师资紧缺的问题。而如果进一步从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办学活动,有效地将近代教育家如梁启超、张之洞及张謇等人重视师范教育以及开设师范学堂的思想付诸实践。由此而实现了建立本国师范教育的初步尝试,使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发生了从观念走向实践的飞跃。南洋公学师范院作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领头兵,为清末后继出现的一批师范学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南洋公学师范院自1897年成立至1903年停办的6年间,共计培养师范生100余人。从这所教育工作“母机”摇篮中走出来的国内首批毕业生是中国最早一批专学近代教师专业人才。他们与同时期其它师范学堂、留学归国学生及教会学校毕业生等从事教育职业者一道,构成近代早期学科专业具有新知识与能力素养的新型师资队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国20世纪清末“兴学”热潮中对合格师资的迫切需求,或作为民国以后学校师资的后备力量而发挥作用。据文献记载: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师范生“或充京师大学堂教员,或在北洋、广东办理学务外交,其余

分赴江苏、浙江、山东、云南充当教员者，不一而足。”^[10]多数师范生都专心于教育事业，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新式教育的具体活动中，成为开创清末民初教育的急先锋。其中成就突出者，如南洋中学（1896年—至今，原名育材书塾，后改名为南洋中学，校址为上海市城厢大东门，是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的主持者王植善，上海务本女塾（创办于1902年，校址为上海小南门，现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前身）的创始人吴馨，开创近代学堂音乐教育先河的沈庆鸿，民国年间两度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以及被誉为江苏近代教育开拓者的沈庆鸿等，^[11]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有力推动者，对我国近代新教育的推广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师范教育的教学与管理

盛宣怀关于师范教育教学与管理的主张是与其整体教育思想及实践联系的，很难截然分开，但其中所呈现的师范教育专业化设想及尝试具有鲜明的个性，并蕴含积极意义。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

盛宣怀突破了传统价值体系中道本器末的观念，主张大力推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为此，他十分重视新式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人才的质量要求方面突出实用性标准，即“学以致用为本”^[12]。创办学堂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提供实用型、专业化人才，并且一直努力将这一价值取向落实到办学实践中去。注重实际、学以致用教学目标在南洋公学师范院办学活动均有所体现。例如，在教学安排上，他要求教师要与时俱进，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及时掌握具有时代性的课程教材，并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掌握基本理论基础外，还要进行操作练习，以便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在师范生的培养过程中，更注重各个环节的教学，为学生提供教学实习的条件。为此，将外院学堂设置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令师范院的学生分班教习，以锻炼其实际教学能力。

盛宣怀将师范教育视为近代社会的专业教育门类之一。作为从事人才培养与训练的专业工作者的教师，必须通过师范教育的专业化成长阶段。为此，就应该依据实用技术目标的要求改革传统教学内

容。因为教学内容体现着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而传统师资培养的教育机构如书院、官学等以经史子集为主的教学内容已经不再符合当时教师培养的目标要求，要想培养新型专业教师，满足教育转型与发展的需要，必须增加西学课程的比例。当然，这也不仅体现在师范教育领域，而属于近代教育的总体特征。换言之，盛宣怀并不是职业性的师范教育家，而是以高等教育为中心，涵盖了普通教育的近代教育家。以这样的身份和角色论述教育问题必然是整体的，而非孤立的。师范教育只是其教育思想及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与其他方面的教育问题探讨连成一体。

盛宣怀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提出，在各省设立新式学堂，“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13]从这些科目中，我们能够看出近代学堂教学内容与传统学堂教师教学内容的区别，旧式私塾、书院及官学学习的都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等传统典籍，而新式学堂的课程则主要以西方语言文字、自然科学、技术工艺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科目为主。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中大大增加了西学的比例，打破了传统教育中课程封闭化的局面，使学校教学课程逐步与世界接轨，使学生能接触到更多世界先进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促进了学校课程的早期现代化。

在盛宣怀创办的学校中，影响最深远的应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然而随着他教育实践的不断丰富以及对教育现实认识的不断加深，在创办南洋公学之时，就有了和北洋大学堂不同的学校定位。北洋大学堂的课程主要以“西艺”为主，而南洋公学则突出“西艺”的同时，兼重“西政”。对于“政学人才”的关注，集中反映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与艺兼。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臣今设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意，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14]可见，南洋公学是仿照法国国政学堂课程方案，在自然科学学科基础上，开设“内政、外交、理财”等专业课程。这就极大地拓展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在

学科专业教师培养问题上也有助于,克服洋务派“艺术”至上的培养技师模式。

盛宣怀将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认为学生在有了一定知识基础后可以专攻一门,从而对所学专业精益求精,这样将来毕业后在针对性职业服务的同时,能够提高其社会适用性,并且在满足工作职员、专家或管理者个性化需求的过程中,拥有人生的丰富性,增进幸福体验。作为造就新式师资预备力量的专门场所,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基本的科学技术内容、人文政治政科学知识技能,而且还要“视西国专门学校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15],即学习教育教学专业知识。在教学中,尤其强调目标导向及管理督促的严格要求:“延订华洋教习,教以中西各学,要于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16]。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培养知识渊博且具备良好教育教学能力的新型教师人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维新运动是师范教育起步阶段,此时的师范教育极度不发达,南洋公学师范院得以开设专门的师范课程,着重培养师范生的专业素养,这对日后师范教育的发展无疑发挥了表率作用。

(二)“中体西用”的办学原则

盛宣怀一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创办新式教育的总原则。他将建立新式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看作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但又一直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应有地位。这显然是近代调和新旧、融合中西教育文化政策——“中体西用”方针在教育家身上的反映。他在《筹集商捐南洋公学折》中指出,“通晓西文”而“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柢”者和“致力中学”,“迷于章句咕啐之迂途”^[17]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理想之才。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他认为洋务派办学对中学的课程功能缺乏认同,导致成效不显,授人以柄,甚至倍遭垢责。“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18]如果没有坚实的“中学”根底,是难以将西学顺利而切实地运用于中国社会的。以此为戒,造就人才必须“导其源”“正其基”,^[19]做到“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20],使其既有厚重的国学基础,又对西方先进技术及科学知识有所建树。这一思想

在师资选聘、教学安排及学生培养等各个环节均有体现。

盛宣怀聘用教师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对西学有一定的造诣,如他聘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教育家张焕纶作为中文总教习,在张焕纶的主持下,南洋公学的中文、经史、舆地等课程都获得了相当的重视。在教师队伍的构成方面,采用了中西教师相互搭配的方法,以保证每一个年级都是中西学教师兼具,如在《南洋公学章程》第九章中,关于教习人员名额的分布情况如下:南洋公学总理一员,华总教习一员,洋总教习一员。师范院并外院洋教习二名,华人西文西学教习二名,汉教习二名。中院华人洋文教习四名,洋文帮教习四名,汉教习四名。上院专门洋教习四名,华人洋教习四名,汉教习四名。^[21]从上述师资配备的情况来看,上院、中院及师范院的师资配备都是汉教习与洋教习并存,从而保证教学内容上的中西兼顾。在学生培养方面,《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学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其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习。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22]也就是说,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师资培养是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学习西艺和西政知识,以培养新型实用型教师专业人才。

(三)教学组织与教学考核

盛宣怀在近代学制和学校考核制度上同样有许多先见之举。他主张办学要循序渐进,不能躐等。洋务学堂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校设置无序,所以导致人才培养难以见到成效。西方学校之所以能够培养大量人才,是因为“学堂之等,入学之年,课程之序,与夫农工商兵莫不有学。”^[23]于是提出培养人才应该效仿西方的学校制度,将中小学作为学校系统的基础阶段,然后再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他仿照西方近代学制体系,在其创办的新式学堂中采用分班教学、分科教学、年级制与升级制统一的近代办学组织形式。《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师范院高材生四十名,外院生四班一百二十名,中院生四班一百

二十名,上院生四班一百二十名。”^[24]师范院学制3年,初设学额40人;外院、中院、上院学制均为4年,三院各设4班,每班30人,采取逐年升班的方式,由此形成外院、中院、上院为系列的三级学制。“外院生至第一班递升中院第四班;中院生至第一班递升上院第四班;上中下三院学生皆岁升一班。”^[25]南洋公学所设外院、中院、上院均采用上述年级制。南洋公学建立起我国最早分层设学且各级学校间相互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师范院与上述三院构成并行、相对独立的类型结构,其程度介于中、上院之间,相当于近现代学制中与高低前后衔接纵向系统互为支撑的横向教育类型,在学制上具有本质上的创新。中国近代学校制度体系正式颁布于1902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使我国近代教育在学制上有了系统规范,而盛宣怀在此之前已经已经将三级学制应用到其办学实践中,可见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南洋公学实施的三级学制以及横向的师范教育所构成的结构也极具示范价值,为1902年和1904年颁布的两次全国性学制提供了正规教育办学形式的成功实例。

盛宣怀凭借多次考察国外学校的经验,充分意识到近代化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考核制度的改革势必需要新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与之相适应。他在人事行政上主张革新旧制,改变洋务学堂人员繁杂的弊端,“向来学堂有会办、提调、监督各名目,今拟一概删除,藉省开销而杜纷杂。”^[26]他参照西方学校的管理模式,对原有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整,在其开办的学堂中设置了督办、总理、监院、总教习等管理职务,督办负责统筹全堂事务,总办、总教习分别掌管学堂行政和教学事务。在总理与总教习人选方面,盛宣怀也有严格要求,必须要选择“深通西学、体用兼备,”的人来担任,“方不致有名无实”,^[27]从而使管理人员的能力有所保证。盛宣怀在南洋公学中增设文秘、会计、图书管理员、校医、杂役等职位,职权明晰,人员精简,已初具现代学校管理模式的雏形。这些教职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有利于将教师从繁杂的事务中分离出来,专心于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师范院作为南洋公学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上述组织管理改革措施的作用影响,同时也从中体现师范教育组织管理的现代观念取向。

教学考核是教学评估的重要内容,其意义不仅在于诊断、反馈,更是目标达成的有效手段。师范教育要培养新型、合格师资,加强教学考核及其标准尤为必要。盛宣怀所设计南洋公学的方案明确规定:学生“每三月小试,总理与总教习以所业面试之。周年大试,督办招商电报两局之员会同江海关道员亲视之。”^[28]而且考试的标准也颇为严格,这在师范院中更为突出。他在南洋公学的有关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师范生的分级等级标准。师范学生分五层格,也即五个等级。从第一层至第五层分别为:“白据”、“绿据”、“黄据”、“紫据”、“红据”,每个等级各有一定标准。与之相应的每一层格的要求为:“第一层之格(要求),曰:学有门径,材堪造就,质成敦实,趣绝卑陋,志慕远大,性近和平。第二层之格,曰:勤学海劳,抚字而烦碎,就范围,通商量,先公后私。第三层之格,曰:善诱掖密,稽查有条理,解操纵,能应变。第四层之格,曰:无畛域计较,无争,无忌,无骄矜,无吝啬,无客气,无火气。第五层之格,曰:性厚才精,学广识通,行正度大,心虚气静。”^[29]新考入的师范生给“白据”试读,学习两个月后合格者换“白据”为“蓝据”,以后每达到一个层次便会授予相应的“绿据”、“黄据”、“紫据”、“红据”,师范生达到了第五层格才能充当教习。

师范生的分级标准和严格的考核制度一脉相承,体现了盛宣怀对师范生质量规格的严肃态度,也体现了他对教师素质的充分重视。而且规定“学生未卒业之日,均不应学堂外各项考试”^[30],使得学生从科举考试的桎梏中彻底解脱出来,减少学生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使其能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业学习。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考核标准在制度上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有利于学生掌握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为中国近代化发展培养所需的学科专业师资。

四、教师的培养模式

盛宣怀认为要想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的局面,培育新式人才,单单依靠从国外引进师资是不够的,他看到在洋务学堂在聘请外籍教师方面显露出了许多弊端,除了语言、经济方面的问题外,国家教育的主权和尊严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侵犯。国家自立首先

需要人才辈出,而人才培养的长久之计在于培养本国教师。“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应该“急起直追”,优先发展。”^[31]他主张多种教师培养方式并举,为中国近现代教师培养模式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一)开办师范院:定向型师资培养

师范教育是培养师资的专业教育,也是最有效的师资培养方法。1897年4月,盛宣怀在南洋公学首设师范院,开设师范教育课程,为外院、中院、上院培养明体达用、勤学善诲的新型师资。除了课程培养、组织管理以及教学测评等程序环节或行为措施之外,盛宣怀尤其注重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他要求师范生在就学习期间养成教师的各方面素质,以致毕业后能直接投入实际学校教学及教育的工作。

盛宣怀在开设师范院的同时,创办了相当于附属小学的性质的外院,为师范院的学生提供了实习的场所。南洋公学外院挑选120名学生,根据文化程度分为大、中、小三个班,这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公立小学,也是近代早期新式小学教育的开始。盛宣怀创办外院的目的就是让师范生兼任教职,锻炼其教育教学能力,“令师范生分班教之。比及一年,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32]南洋公学的外院实际就是师范生的实习场所,师范生在教学中获得自我发展,通过自我发展去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教学实习是南洋公学师范院的一大特色。这种定向师资培养对于提高师资养成的有效性及合理导向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有助于构建专业化教师教育体制,促进社会崇尚教师职业的风尚。因此,自清末建构以来,一直是我国教师教育的重要模式。

盛宣怀也特别注重培养师范生的外语阅读及翻译能力,这不仅是现代高等专业教育的特征,更是拓展知识、丰富及更新知识内容的需要。“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33]要想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知西国之为”,而“西国语言文字殊非一蹴可几”,必须依靠译书来使西国书籍得以传播。^[34]所以,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设立译书院,选择图书馆所购的东西各国书籍让学生进行翻译练习,“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他日中上两院俊才,亦可分晷刻轮递,犹可以当

学堂翻译之课,获益犹多。”^[35]这些练习为他们日后进行教材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南洋公学外院的学校课程主要是算术、地理、历史、图画、唱歌等现代课程,中国传统的蒙学教材并不适用于这些新式课程,而外国的小学教材又不适合当时的教学实际,所以师范生参照外国小学的教材,并结合新型学校的实际教学需要,进行小学教科书的编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保证了当时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如师范生朱树人、沈庆鸿等编写的《蒙学课本》、《物算教科书》、《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笔算教科书》等,都是当时很优秀的小学课本,在南洋公学试验后并推广至全国。其中由南洋公学的师范生编写的《蒙学课本》,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自编小学教科书,开创了近代中国自编新式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36]这在中国近代教科书史上的开辟榛莽举措更是教学新旧转型中的重大事件,对近代教学改革具有特殊意义。而从当今校本课程及教案资源的开发建设方面,更无疑是一个极具成功典范的案例,其现代化教学开发价值甚为深远。

(二)出国留学:师资培养的补充

盛宣怀在洋务企业的创办中,积累了不少借鉴西方科学技术的经验,这些经验和理念同样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有所体现。他认为单单靠翻译西国书籍和聘用外国教师,并不能完全掌握西方文化的精华,只有身处西国,学习游历,才能将知识学的透彻。他根据中体西用的思想和注重实践的理念,提出“学生必出洋游历,躬验目治、专门肄习”,才能“窥西学之精”,达到“用其所长补我之短”的目的。^[37]他采取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措施,使学生在国内学堂学有所成之后出国深造。这是对本国师资培养的重要补充,也是构成师资训练的又一模式,一直持续至今,而作为国际教育交流及海外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拓宽了师资培养的范围,也在办学体制上有了继续教育的域外格局。

盛宣怀将这一设想写进了《南洋公学章程》中,其中第八章明确规定:“上院学生毕业后,择其尤异者咨送出洋,照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就学于各国大学堂,以广才识而资大用”。^[38]他利用其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捐资,帮助学生出国深造。如在1898年

南洋公学的6名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此后又有数批学生出国留学。从1898年到1906年八年间,盛宣怀主持派遣到美、英、德、日、比五国的留学生,计有章宗祥、王宠惠、雷奋等58人。^[39]这些留学生归国以后,不少在校任教,成为清末兴学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师资力量。可以肯定的说,留学教育的教师培养模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盛宣怀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注重学用结合,追求实效,其教育实践冲击了传统教育重德轻艺的价值取向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推动新式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在中国新式教育刚刚兴起的阶段,他首开中国师范教育先河,创办师范院,其师范教育思想及办学活动无疑具有一种敢探先路的勇气和远见。尽管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缺少系统完整性,没有创作思想完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理论性文献,但他的师范教育思想是他在开办和管理师范教育过程的实践成果,体现了他对师范生以及师范教育的重视程度,所提出的教师培养模式设想也能对当今教师教育带来一定的启示。上述种种奠定了盛宣怀作为近代教育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教育家的历史地位,无愧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一位于师范教育贡献卓著的前驱者的荣誉称号。

参考文献:

- [1]盛宣怀.致李鸿章函(1877年)[A],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 [2]盛宣怀.致张百熙函(1903年)[A],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 [3][36][39]陈先元,田磊.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9,120-121,32.

- [4][8][9][12][14][16][17][19][20][21][22][24][25][28][29][30][31][32][38]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9,9,10,9,11,10,9,9,10,15,12,12,13,14,13,13,9-10,10,15.

- [5]盛宣怀.请开办矿物学堂折(1899年)[A],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 [6][23][26][27]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2,4,4.

- [7]盛宣怀等.南洋公学纲领(1896年)[A].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 [10]盛宣怀.致瑞方函(1904年)[A].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 [11]欧七斤.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00.

- [13]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5.

- [15]盛宣怀.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6.

- [18]盛宣怀.请设学堂片[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6.

- [33]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编辑诸书纲要折[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0.

- [34][35]盛宣怀.奏陈设立译书院片[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3,23.

- [37]盛宣怀.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A].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8.

(责任编辑:郑芳)